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真的是紅隊嗎？從沈大偉的中國研究論區分紅藍隊學

者之妥適性

Problematizing the Red-Blue Divide in American China Studies

via David Shambaugh's Narratives

研究生：張峻維

Jun-Wei Zhang

指導教授：石之瑜 博士

Dr. Chih-yu Shih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November 2015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審定書

本校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張峻維(學號：M026020014) 所提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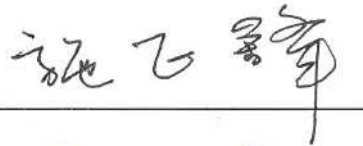
真的是紅隊嗎？

從沈大偉的中國研究論區分紅藍隊學者之妥適性
Problematizing the Red-Blue Divide in American China Studies
via David Shambaugh's Narratives

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4 日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口試，
符合碩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簽章：

召集人 施正鋒



委員 蔡明彥



委員 石之瑜



指導教授 石之瑜



論文謝辭

2006年的秋天，剛成為高中生的我拿到了期中考成績單。那是我求學生涯中所拿過最差的成績。在此之前，我曾經規劃要一路考上大學並取得碩博士學位，但擺在眼前的現實卻打醒了我。我並沒有放棄抵抗，可是無論如何努力，也只是勉強地讓成績提升到能順利畢業。我相信當時包括家人、老師還有同學們應該都認為我沒什麼機會再升學，頂多大學能畢業也就不錯了。漸漸地，我自己也開始這麼想。不過今日我不只大學順利畢業，甚至有機會完成這本碩士論文，這要感謝許許多多人的協助。

我能夠完成這本論文，首先當然感謝指導教授石之瑜老師的教導，透過與石老師的討論，我確立了研究方向，每當撰寫過程中遇到瓶頸或疑問時，石老師總是不厭其煩的提供建議。我也感謝口試委員施正鋒老師和蔡明彥老師對於論文修改的建議，兩位口委的意見讓本論文能更加完善。此外，國棟、彥程、和育慶等同學的協助亦是我能完成學業及論文的重要原因，同時非常感謝臺灣大學的苑柔學姊幫忙尋找一些重要的文獻。謝謝在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這段日子，能遇到這麼多優秀的老師以及出色的同學們。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在文化大學政治系時的老師與同學們。因為在文化政治系的時光，徹底改變我對學習的態度，激發我對求知的熱忱。若沒有在文化的四年，我就不可能有進一步升學的能力及意願。尤其感謝唐欣偉老師和鄭子真老師的教導。另外還謝謝老周、老賴、小楊、子玉、狂魚以及阿瑩等同學的支持。

這一路走來，需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但我不謝天，而是在心裡向每一位我生命中的貴人，一次又一次的道謝。

張峻維寫於新北市

2015.11.12

摘要

「紅隊」或「藍隊」是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的分類，然而紅藍隊的劃分近年已開始遭受質疑。本文就希望藉由整理美國著名紅隊學者沈大偉的中國研究達到認識沈大偉的中國觀和探討以紅藍隊區分學者是否妥當等目的。本文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來解讀沈大偉對中國的觀察。首先分別蒐集沈大偉的研究文獻，接著按照不同議題及時間加以分類，發現沈大偉無論對中國對外關係或內部治理相關議題的看法都隨時間有著不同的變化。這證明了學者即便在同一議題上的立場也可能隨中國改變政策而有所演變，用某時期的論述加以分類並不適當。另外，沈大偉的中國黨政研究所引起爭議還顯示他紅隊學者的身分可能使外界只關注他對中國的肯定而忽略他提出的批判。本文同時比較沈大偉與其他紅隊學者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同陣營學者對同一議題可能相當不同的觀點，即便預測結果相同，推論的過程也有不小差異。綜上所述，本文結論認為紅藍隊分類容易使我們錯誤解讀學者的研究且不足以區分學者。

關鍵詞：沈大偉、紅隊、藍隊、中國問題專家、對外關係、內部治理

Abstract

" Red Team " and " Blue Team " is a popular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American-China experts. However, this Red-Blue division has been questioned in recent yea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conception of China adopted by the leading American China expert, David Shambaugh, who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a member of Red Team. It then critically evaluates the Red-Blue division. This thesis concludes that the impression that Shanbaugh is Red Team does not hold well. Past readers cite his approv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strength but fail to attend to his qualification. This thesis further compares Shambaugh's perspective with other presumably Red Team scholars and traces their different views on same issues. Even where they draw similar conclusions, they rely on different inferential processes.

Keywords : Davis Shambaugh · Red Team · Blue Team · China experts · foreign relations · internal affairs

目錄

論文審定書.....	i
論文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iv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及背景.....	1
第二節 問題意識.....	4
第三節 文獻回顧.....	5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限制.....	15
第五節 章節安排.....	16
第貳章 沈大偉的觀點—中國對外關係.....	18
第一節 中美關係.....	18
第二節 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	31
第三節 中國戰略安全觀.....	38
第參章 沈大偉的觀點—中國內部治理.....	45
第一節 中國黨政.....	45
第二節 中國軍事.....	71

第三節 中國經濟.....	76
第肆章 紅隊學者的比較—沈大偉、藍普頓和謝淑麗.....	82
第一節 藍普頓的研究介紹.....	82
第二節 謝淑麗的研究介紹.....	91
第三節 比較三位紅隊學者的異同.....	96
第伍章 結論.....	107
參考文獻.....	115

圖次

圖 5-1 紅藍隊光譜圖	113
圖 5-2 沈大偉立場變化圖.....	114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出生於 1953 年，他是美國著名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及一位所謂的紅隊學者。沈大偉大學時期就讀於喬治·華盛頓大學並分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密西根大學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在中美建交後他曾以留學生的身分前往中國的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以及北京大學就讀。

目前沈大偉任職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暨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他同時也是著名美國智庫布魯斯金基金會的非常駐研究員。在此之前他曾於 1976 年至 1977 年美國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局擔任分析員。1977 年沈大偉轉任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的分析員，任期至隔年結束。從 1985 年開始直到 1986 年，他任職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亞洲計畫負責人。2002 到 2003 年他短暫回到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擔任研究員。此外上海社會科學院在 2008 年授予沈大偉榮譽教授的職位。同時沈大偉也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到過中國、俄羅斯、香港、台灣、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國。

除了以上經歷外沈大偉也曾任倫敦大學《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主編，現仍是該季刊編輯委員，其他還擔任包括《當代歷史》(*Current History*)、《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戰略研究期刊》(*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以及《中國展望》(*China Perspectives*)等學術刊物的編委。沈大偉亦擔任過美國政府、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福特基金會等機構的顧問，以及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世界經濟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國際研究協會、亞洲協會、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太平洋理事會國際政策和亞洲研究學會等機構的成員。

從上述沈大偉的背景資料可以知道，沈大偉從事中國研究已有相當長的時

間，並且除了是許多中美關係、亞太區域的研究機構成員之外，還負責多個機構的中國及亞太計畫，也擔任許多相關刊物的編委，不難看出他在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研究的領域頗有成就。當然，沈大偉也因此撰寫了大量與中國研究相關的學術文獻。

回顧沈大偉的研究，他常蒐集並頻繁使用中國官方或學術界的文獻做為依據，並在文中表現出他對於中國軍事、政治、經濟、社會還有歷史文化的細微觀察。當中國實力漸長而令歐美國家感到不安之時，沈大偉卻主張美國應該積極和中國合作。比如，他在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一書中便認為，由於中國對國際角色及戰略的定位模糊，因而對國際事務介入有限，軟實力也仍然不足，因此中國的影響力並不若外界的預期。¹可以說就中國的對外關係來說，沈大偉不認為中國已有能力威脅到美國的地位，他反而主張美國和中國應該在政府、軍事層面定期且制度化交流增加互信，以利於中美之間的合作。²

同時，沈大偉也對中國的內部事務，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有長期的研究。他將現有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分為悲觀與樂觀兩大類，前者認為中共終將崩潰，後者則認為中共即便內部問題繁多，但並不會真正影響中共的統治。沈大偉自己則認為中國共產黨看起來確實因為各種問題而有逐漸衰弱的現象，但如同中國各項漸進式的改革，中共也會逐步的適應及解決這些問題。³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沈大偉是較樂觀的。

無論是在中美關係或中國內部問題上，沈大偉的研究對於中國都顯得較為友善，這符合一般對紅隊學者的看法。紅隊(Red Team)或與之相對的藍隊(Blue Team)主要是指美國智庫學者對中、美、台三者關係的兩派主張。冷戰結束以後，國際上已不存在對美國的霸權具有威脅性的國家，但隨著中國的國力快速上升，中國

¹ Shambaugh, Davi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² 沈大偉，2005，〈演進中的亞洲地區體系〉，《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4): 24-25。

³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26-148

被視為美國的潛在敵人，加上台灣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的衝突點，「中國威脅論」因而甚囂塵上。中國威脅論者如 Ross H. Munro 在 1992 年發表文章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其中認為，於沒有外在威脅的情況下，中國的國力將日漸上升，而其軍費的提高則顯示中國將可能對其鄰國造成嚴重的威脅，並主張中美關係將不容樂觀。⁴類似 Munro 的看法的其他中國威脅論者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是「非和平」的，而中美之間的衝突更是可以預見的。持中國威脅論的智庫學者大部分希望推翻中國共產黨並傾向加強台美軍事關係。反之另一派學者則不認同中國會成為威脅，而且反對美國的對台軍售。⁵外界根據他們對中-美-台三角關係的看法所區分的這兩派美國智庫學者，就被分別名之為為反北京或親台的藍隊還有立場親北京的紅隊。⁶這個分類名稱可追溯到《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報導提到 William Triplett 創造了「藍隊」一詞，藉以指稱主張美國對中國採取更強硬態度的人士，並嘲弄那些尋求與北京更緊密合作者為「紅隊」。⁷

二、研究目的：

從紅藍隊的定義來看，沈大偉的主張確實和紅隊比較接近，似乎屬於親北京的立場。但如果仔細深究，他的美國對中政策主張並無法代表他實際上對中國的態度。首先，沈大偉之所以不抱持中國威脅論，部分的理由是因為現在的中國無論從意願或實力方面，都仍缺乏成為取代美國的全球大國的要素，也就是說他是因為不看好中國成為全球大國的可能性而不主張美國採取抑制的對中政策。可見沈大偉的主張並不一定來自於他對中國的好感。再者本研究認為被歸類為紅藍隊

⁴ Ross H. Munro. 1992.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62): 10-16.

⁵ 郭壽旺，2006《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對李登輝總統九五年訪美案例之研究》，台灣：秀威資訊。pp.161

⁶ Cheng-Feng Shih. 2005. "Understanding the Red While Singing the Blue: Reading David Shambaugh by the Line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58-59

⁷ Robert G. Kaiser and Steven Mufson. 2000. "'Blue Team' Draws a Hard Line on Beijing'." February 2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Pcap/2000-02/22/004r-022200-idx.html> (October 15, 2015).

的學者有縱向及橫向的差異。縱向來看，施正鋒即曾提出，沈大偉本是新現實主義者，期待中美兩國成為 21 世紀的兩大支配強權，來穩定國際系統。後來，他因預見中國將成為美國霸權的競爭者，而改走向新自由主義。⁸故本研究認為與其單純的將沈大偉定性為親北京的紅隊學者，不如說他是一名隨著中國自身發展與國際局勢變化而改變政策主張的中國觀察者。換句話說，學者自身的研究立場會隨著時間有所變化。如果橫向來看，本研究也質疑同一陣營的學者之間的主張可能有許多的差異，將之歸為一類充其量是在特定政策上的簡化方式而已。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即認識沈大偉的中國觀。沈大偉作為有名的中國問題權威，其中國相關著作繁多，本研究希望系統化整理並總結他的中國研究，讓讀者能了解沈大偉的中國觀。第二個目的則是想比較同一陣營學者們的主張是否有決定性的差異，並希望藉此重新探討以紅藍隊區分美國智庫學者的妥適性。

第二節 問題意識

依照前一節的看法，本文不贊成將如沈大偉之類的中國問題專家區分為紅隊或藍隊，這樣的二分法似乎是不足的，即使是同一學者本身的立場就可能與時俱進而有所變換，何況同為紅隊或藍隊的學者成員彼此之間，他們的主張和研究必有不同特點。且就算因為其政策主張緩和而被歸類為紅隊學者，他本身的立場是否真的如此親近中國，似乎也是可議的。因而本研究主要欲回應的問題是，單以主張親北京或親台灣為標準來區分美國智庫學者的二分法是否合理？如若不合理，有無更好的分類方式？關於這個問題，其實國內學者郭壽旺還有馬博元都有提出過質疑。郭壽旺認為學者對不同議題的立場可能不一定符合紅隊或藍隊陣營

⁸ Cheng-Feng Shih. 2005. "Understanding the Red While Singing the Blue : Reading David Shambaugh by the Line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67-68.

分類。⁹馬博元則主張紅藍隊在某些議題可能有相同的立場，且陣營學者在某些議題上不一定必然親中或親台。¹⁰

本研究大致同意兩位學者的主張，但正如前述，本研究有兩個與他們不同的看法。首先以前述沈大偉對中美關係的觀察為例，學者即便在同一議題的立場都可能有所變化或甚至發生不一致。另外，本研究認為同一陣營的學者的研究應該也有不少差異。所以本研究透過證明下列兩個推論，來檢證紅藍隊分類是否合理。第一，同一學者在同一議題的立場常是模糊的，有時甚至並不一致。第二，同被歸類為紅隊的學者之間主張必有差異。第一個推論是為了證明政策主張並不能用以衡量該學者對中國的立場，因為此政策主張是隨時可能因為中國與國際局勢的改變而有所修正。本研究將透過研究沈大偉的中國觀來加以證明此點。由於沈大偉對中國的觀察相當廣泛且散見於他的各個著作中，所以為了正確理解沈大偉的中國觀，有必要將沈大偉的研究有系統地加以整理，藉此觀察沈大偉對中國立場的變化。

在將沈大偉的研究有系統整理後，為驗證第二個推論，會把沈大偉與紅隊較著名的其他學者謝淑麗（Susan Shirk）和藍普頓（David Lampton）的研究加以比較，嘗試找出三位紅隊學者之間彼此相同及相異之處，其目的在於說明政策主張類似的學者們仍有些決定性的差異，不應等而視之。最後，則根據驗證兩個推論的結果，嘗試證明現有紅藍隊的分類並不精準，希望能藉此過程找出新的分類。

第三節 文獻回顧

⁹ 郭壽旺，2006《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對李登輝總統九五年訪美案例之研究》，台灣：秀威資訊。pp.161-162

¹⁰ 馬博元，2004，〈外交政策評估研究-美國智庫與我國對美外交〉，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學位論文。p51-52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整理與分析沈大偉的中國研究，釐清他的中國觀並挑戰現今對美國智庫學者的分類標準。而在本研究之前並非沒有討論沈大偉著作的相關文獻，沈大偉長期研究中國，有過多本相關專書與期刊論文，因此對其著作的書評不少，在本節首先將回顧幾篇有關其專書所做的書評。

選擇討論專書書名而非期刊論文的理由是，相較於篇幅較短的期刊論文，專書能更完整體現沈大偉的政策主張與對中認識，所以在回顧這些對沈大偉著作的書評時，除了能對沈大偉的研究有初步的認識，也能明白其他學者是如何解讀沈大偉的研究及其對中立場。本節將把沈大偉的中國研究分為對外關係和內部政治兩類，各選兩本較具代表性的專書並回顧其書評。

沈大研究中國對外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最有名的著作之一，應當是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該書以討論中國的美國觀察者為主，亦即中國的學者是如何認知與了解美國。許多學者都曾為 *Beautiful imperialist* 一書撰寫書評，已故老牌中國通 Lucian W. Pye 就是其中之一。

Pye 認為沈大偉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在於過去的研究只專注於研究中國的一切，並學習中國的事物，卻沒有去思考中國人是如何去看待美國的。但 Pye 同時指出，沈大偉的研究提供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結果，亦即大部分中國的美國觀察者不是很了解美國，而且中國的美國專家中仍有很多人透過馬克思主義來理解美國。不過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比起美國的政治與經濟，中國的美國專家對美國社會比較沒有太負面或片面的描述。這可能是因為抽象的政治、經濟需要透過理論來詮釋，而使用的理論會影響詮釋的結果，但社會狀況卻可以直接觀察和體驗，因而使得這些中國學者更容易客觀理解美國的社會。Pye 最後告訴我們，沈大偉提供了中、美之間將會持續陷在敵意與友善的循環當中的結論，因為兩者的始終難

以真正理解彼此。Pye 認為這導致中國也難以真正的做到現代化，因為那需要他們的美國觀察者更加了解美國。¹¹

從 Pye 對沈大偉的書評來看，沈大偉在 *Beautiful imperialist* 中所表現出來的是對中美關係的悲觀前景，類似的解讀 Donald W. Klein 也曾提出類似的解讀，尤其注意到沈大偉所認為，中國對美國的理解保持扭曲及淺薄。不過當 Klein 提到沈大偉的研究將這些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區分為馬克思主義者、非馬克思主義者和霸權主義者時，他表示至少可以審慎樂觀地認為中國對於美國的認知已在逐步改善。¹²

除了 Pye 和 Klein 以外，現任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教授 Lowell Dittmer 也對沈大偉這本 *Beautiful imperialist* 寫過書評。Dittmer 首先稱讚沈大偉開創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並指出沈大偉的一個核心發現是，當美國經常被指責對中國人權、世界秩序等有誤解時，其實自身也被中國的美國專家們所曲解。Dittmer 提到沈大偉在撰寫美國外交政策的章節時，認為中國的美國觀察家並沒有隨著 1979 年尼克森訪華及中美建交而放棄敵意。在他們眼中，從 60 年代的蘇聯帝國主義還有 80 年代超級強權演變而成來的概念「霸權」，似乎體現在 90 年代的美國。但隨著非馬克思主義的美國觀察家的增加，仍是看到了值得慶幸的趨勢。Dittmer 最後建議，沈大偉或許可以進一步有系統的比較馬克思主義與前馬克思主義時期的美國觀，這有助於將意識形態從文化偏見中抽離。¹³

Ian Wilson 同樣和 Klein 還有 Dittmer 一樣都認為，有鑒於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在中國外交上的影響力，沈大偉的研究所顯示了解美國政治情勢的學者逐漸增加的趨勢，是值得歡迎的。Robert Garson 則認為 *Beautiful imperialist* 的研究所發現非馬克思主義美國觀察者的出現，對中蘇關係的研究相當重要，並反映了中國外交政策的

¹¹ Lucian W. Pye. 1992.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Lucian W. Pye." *The China Quarterly*, (129): 229-231.

¹² Donald W. Klein. 1992.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Donald W. Klein." *Pacific Affairs* 65(3): 401-402.

¹³ Lowell Dittmer I. 1994.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Lowell Dittmer."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57(3): 624-625.

改變。¹⁴

從幾位學者對沈大偉這本Beautiful imperialist所做的書評，大致可以了解沈大偉早期的研究成果，著重在中美彼此的認知，且沈大偉對中美關係的前景並不太樂觀。不過除了Pye以外，其他學者對於中國對美國認知的逐步加深，都還是抱以期待與肯定。

Beautiful imperialist是沈大偉研究中美之間關係的代表作品，雖然成書於1991年，與當今中國國內或國際局勢有點差距，仍是理解沈大偉整個中國觀的重要著作。但如果是針對近年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的研究，在沈大偉的著作中，當屬2013年出版的著作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最為完整，因為本書描述了沈大偉對中國各項外交表現以及內部外交政策討論的觀察。這本書主要論述了今日中國的軟實力尚不足影響國際局勢，且對參與國際事務消極，這些都讓中國充其量只能是一個不完全的強權。這本書同樣引起了西方和中國不少討論。

Fraser Cameron在評論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時，指出沈大偉在該書中認為中國在國際上的存在感變高，但這不會讓中國自動擁有相應的影響力。另外，外交路線的搖擺、內部經濟轉型的問題、軟實力擴張有限等等，導致軍事上預算增加，卻沒有辦法對外有實際作為。最後Cameron總結沈大偉在該書的論點，目前的中國是一個局部強權，是否能成為完全大國，必須要看中國內部未來發展的情況而定。¹⁵

Cameron說明了沈大偉認為現階段的中國內部仍有許多的問題，不論是外交政策的不確定性或經濟發展可能的阻礙，這使得中國現階段無法發展成為一個完全大國的道路。Kerry Brown又為沈大偉的論點做了一點詮釋，他認為沈大偉想在該書提出的問題，其實是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大國？Brown提到過去中國一直是

¹⁴ Robert Garson. 1992.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Robert Gars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68(4): 717.

¹⁵ 參照 Fraser Cameron. 2013. "Book Review: 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 by David Shambaugh, OUP." March 12. http://www.eu-asiacentre.eu/pub_details.php?pub_id=90 (September 11, 2014).

自給自足，因而就算不斷想變成向外發展的國家，仍會感到不安。除此之外Brown也和Cameron一樣認為沈大偉在本書中所要表達的是中國的內部問題讓其並沒有能力去威脅世界，但Brown也提出*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這本書隱約透露的憂慮，即當談到中國的梦想與希望，同時要處理美國的梦魘和恐懼。Brown總結該書，認為*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這本書肯定了中國的活力並對理解中國現況有卓越的貢獻，不過也提醒我們目前想找出中國模式仍有困難。¹⁶

Brown的書評除了點出沈大偉的論點，還補充了一些對該書的詮釋。但上述書評均著重於沈大偉認為中國仍是一個不完全大國這個觀察，Gunjan Singh的書評則指出沈大偉認為，雖然中國仍有許多問題，但隨時間過去，中國仍有機會成為全球大國。Singh認為這時中國的歷史經驗和內部發展對其與國際的互動會有很重要的影響。¹⁷

前述是各國學者對*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這本書的討論，而中國學者又是如何看待這本書呢？許少民在解讀這本書的時候，提到沈大偉認為中國雖然是不完全大國，且對於是否接受現有國際建制仍有爭議，但沈大偉認為中國已然是國際建制的一部份，即使有時會不接受，但總比全然否定要好，因此沈大偉反對抑制中國的策略。¹⁸

許少民也提出一些對該書的批判，首先，他覺得沈大偉可能為了否定中國崛起論，因此就想否定中國興起的基礎，即經濟的成長，進而單以對外援助和對外投資為標準判斷中國經濟影響力不足。其次，許少民認為應將資源與實力分別而視，不是只有軟資源才可以是軟實力的來源，硬資源如資金等也能轉化為軟實力。

¹⁶ 關於 Kerry Brown 的書評請參考 Kerry Brown.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by David Shambaugh." July 4.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books/china-goes-global-the-partial-power-by-david-shambaugh/2005299.article> (September 11, 2014).

¹⁷ Gunjan Singh. 2014. "Book Review: Shambaugh, Davi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Indi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0): 183-185.

¹⁸ 許少民，2013，〈全球參與者、身分困境與全球性大國——評《中國走向全球：羽翼未豐的大國》〉，《國際政治研究》，(3): 180-181。

最後，許少民指出沈大偉的論點帶有西方中心論，因為他認為中國政治菁英自私自利，對於全球治理的觀念有質疑，且不能負擔西方定義的國際責任，故中國自然不能成為全球大國。甚至沈大偉提到中國是一個沒有盟友的國家，且會對往昔待其不好之國家以牙還牙。許少民認為，這是暗指中國非正常國家，而西方有責任讓它融入國際社會，轉為正常國家¹⁹

另外一位中國學者郝衛東在評論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時指出該書有兩個特點。第一，這是沈大偉長期以來中國研究的成果積澱，他蒐集眾多的資料，並將中國在世界各地的行動都寫在該書，讓讀者能以全球化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影響力。第二，沈大偉對各種觀點進行其獨到論述，不同於其他著作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同時從六個不同維度來探討中國崛起的實質與成果。²⁰

以上的書評針對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這本書各自有不同見解，且從不同立場解讀，也有不同的看法。Cameron 和 Brown 基本上都將重點放在中國內部問題繁多導致尚無法成為全球大國，Singh 則強調當這些內部問題解決以後，中國依然會興起，而世界要如何面對。中國大陸的學者中，許少民雖然明白沈大偉不主張對中國採取抑制策略，但仍探測出沈大偉的文章中背後含有對中國不友善意涵，並對沈大偉低估中國影響力，特別是經濟部分的影响力有所批判。反之郝衛東對此並無批判，反而強調該書相較於一味宣傳中國威脅論的著作，更能真正體現中國崛起的實質，大有藉由該書反駁外界視中國為威脅的意思。

沈大偉的兩本著作 *Beautiful imperialist :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和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都屬於中國對外關係的範疇，但沈大偉的中國研究並不僅止於中國之外交，沈大偉對於中國的內部政治情勢，包括人民解放

¹⁹ 許少民，2013，〈全球參與者、身分困境與全球性大國—評《中國走向全球：羽翼未豐的大國》〉，《國際政治研究》，(3): 181-184。

²⁰ 郝衛東，2013，〈走向世界的中國〉，《國外理論動態》，(4): 105。

軍的發展、黨軍關係以及中國共產黨，都有所研究。接下來本節將討論幾篇對沈大偉另外兩本研究中國內部政治的專書書評。

首先是中國的軍事以及黨軍關係的相關研究，沈大偉對此在《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一書有完整體現。他利用該書說明了現今中國軍隊發展進程以及主要戰略觀，並討論到一個外界關注的問題，黨軍關係是否正在產生變化。

Bernard D. Cole曾經評論過《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一書。Cole將沈大偉在該書各章節的論點詳細說明，包括中國國防結構概況、黨軍結構基本沒有發生變化還有軍用與民用逐漸分開等。其他還有沈大偉在科索沃戰爭、波斯灣戰爭後觀察到人民解放軍從中汲取教訓並逐漸進步。沈大偉也注意到中國雖然沒有實質的外在軍事威脅，但始終將美國視為對國家的最嚴重威脅，他並建議美國應加強與中國的考察與交流，以作為讓中國軍事透明化的媒介。Cole認為沈大偉的在軍事研究方面是相當優秀的。²¹

David M. Finkelstein認為這本書涉及了解放軍的軍民關係、命令、訓練、組織、預算與武器系統等非常廣泛的題目，並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文獻。Finkelstein並強調沈大偉在問題的論證上有著非常詳細的說明。²²James Mulvenon則評論他在書中提出一系列的論證，並透過學術研究與實地考察為之辯護，所提供的大量數據也顯示該書對中國軍事的理解相當專業。²³

上述幾位學者都對沈大偉在該書所蒐集大量的資料與專業的數據加以肯定，但中國學者方春生則提到，《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曾受到軍事愛好者的批判，認為沈大偉對中國軍力了解得不夠詳細。²⁴

²¹ Bernard D. Cole. 2003.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Bernard D. Col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7(3): 1004-1006.

²² David M. Finkelstein. 2003.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David M. Finkelste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4): 1230-1232.

²³ James Mulvenon. 2004.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James Mulvenon." *The China Quarterly* (177): 215-216.

²⁴ 方春生，2005，〈一個美國學者眼中的當代中國軍事現代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問題與前景》〉，《當代中國研究》，12(4): 122。

儘管如此，方春生認為該書仍有三個值得參考的看法。第一，關於解放軍的制度，沈大偉認為解放軍已逐漸走向專業化，鄧小平以後的沒有領導人是出身軍隊，黨政軍一體逐漸變為黨政軍功能分離。且隨時代演變，黨的敵人不見得就是社會的敵人，敵人比較可能來自外部，因此沈大偉主張解放軍應國家化，放棄其社會功能。第二、中國對戰略的理解不同於西方，西方戰略指的是軍事與國家安全的關連，但在中國僅是指戰術。方春生指出中國近幾年提出大戰略的概念，卻又直接跳到國際上的大國競爭，而中國軍事始終缺乏國家安全概念，如若能改進此點，將對中國軍事的現代化有相當大的啟示性。第三，中國過度投入不對稱戰爭，而忽略軍事制度的改革。²⁵

總結前述評論，《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確實展現了沈大偉對中國軍事及國防研究的深厚基礎。除了大量的相關數據和資料，咸信他對中國國防與戰略等都有深入探討與了解。

最後本節要討論的是沈大偉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如果要分析或觀察中國內部政治情勢或發布的政策，絕不可能不討論中國共產黨這個中國唯一的執政黨。而《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正是沈大偉對中國共產黨研究的一次整理。該書不僅討論了西方的中國共產黨研究中，存在了對中共未來發展的樂觀派與悲觀派的區別，以及中國本身如何從西方的研究及前共黨國家瓦解的經驗中汲取教訓，還述及中國共產黨的現況與前景，認為中共將進行漸進的改革，並形成一種新的混合式政體。

那其他學者是如何看待沈大偉在這本書中的分析呢？Marc Lanteigne認為沈大偉的這本書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適應力，儘管中共已成功維持其一黨專政地位，但中共並不吝於學習其他國家執政黨的經驗，當然前蘇聯及東歐共黨國家的歷史教訓也是中共所檢討的對象。另外中共也採取加強監督黨和國家的宣傳媒體、提

²⁵ 方春生，2005，〈一個美國學者眼中的當代中國軍事現代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問題與前景》〉，《當代中國研究》，12(4): 122。

出可以同時維護黨的原則和推動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最後Lanteigne指出，沈大偉在本書最重要的結論是駁斥那些認為中國將發生變局或中國共產黨最終將崩潰的論述，但Lanteigne本人對此模稜兩可的指出，儘管中國共產黨是否會崩潰的辯論不會因為這本書結束，但是本書卻正突顯這些討論與研究在中國及中共現代化過程中的貢獻。²⁶

Joseph Fewsmith的評論和Lanteigne相似的是，兩人都提到沈大偉對中共調適能力的重視，但Fewsmith還進一步指出沈大偉注意到中共在重建上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意識形態的修訂，這代表中共一直在深思如何保持政權。不過Fewsmith認為，沈大偉如果除了討論中共從蘇聯等國家中學到的教訓之後，還能再加入對中共歷史與體制發展過程的說明，以及中共的資金來源與經濟情況，將可更好地讓讀者了解中共的運作。但他仍認為這本書對於希望了解中國共產黨的讀者而言是有助益的。²⁷

Eddy U則批評書中的每一篇章讀起來都像獨立作品，他認為書中缺乏一個緊密編織的對話來貫穿這些章節。²⁸ Andrew Mertha對該書有較多批判，Mertha指出沈大偉固然在書中強調了中共吸取東歐及蘇聯共產國家的瓦解經驗、介紹了中國學術研究，以及探索天安門事件等內部事件帶來的經驗，從而能採取有效因應使中共避免同樣的命運，但是他認為沈大偉在章節中過於信任中共的宣傳和組織力量，膨脹了中共在國家層級的控制範圍。他還質疑沈大偉的研究缺乏理論，沒有建立好蘇聯垮台、汲取經驗還有中共重建之間的因果關係。另外，Mertha還質疑沈大偉以中國共產黨現有力量為研究對象，卻只專注於北京而忽略其他地方中共的情況。但在最後，Mertha雖然有諸多批判，仍願意肯定*China's Communist Party*:

²⁶ Marc Lanteigne.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Marc Lanteig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84(5): 691-692.

²⁷ Joseph Fewsmith.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Joseph Fewsmith."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691-692.

²⁸ Eddy U. 2009.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Edd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2): 613-614.

*Atrophy and Adaptation*仍是短時間內最全面描述與討論中國共產黨的著作。²⁹

除了上述評論以外，中國學者弓联兵認為沈大偉在這本書中擺脫意識形態，而從客觀事實出發，基本合理的解釋了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治的變化。沈大偉的研究也對西方重新認識中國有積極的意義。不過他也承認沈大偉對中國現實的認識還有資料蒐集有其侷限性。部分觀點仍值得商榷。³⁰

以上是藉由對沈大偉著作的書評，初步了解其他學者是如何看待沈大偉的著作，幫助本研究能從更多不同的視角來解讀沈大偉的研究。不過這些書評畢竟是針對沈大偉某些單一著作所做的評論，無法達成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整理沈大偉的中國研究。

整理並討論沈大偉文獻也並非沒有，國內學者施正鋒在*Understanding the Red While Singing the Blue: Reading David Shambaugh by the Lines*一文中，試圖整理沈大偉面對中美台關係的立場，並討論了紅藍隊各自陣營的主張。³¹但是和施正鋒的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本研究希望能更全面整理沈大偉的中國研究，不僅是對外關係而已，本研究還希望能挑戰現有紅藍隊的分類。

關於紅藍隊的文獻，台灣學者郭壽旺出版的著作《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就討論到用紅藍隊區分智庫學者的不適當，例如容易影響智庫立場及研究客觀性，此外他還指出，這些美國智庫學者的主張反映的是他們觀察的現象，在不同的兩岸議題上主張可能也不一定相同。因此親共或親台這類說法並不恰當。³²本研究同意郭壽旺的觀點，為學者貼上紅隊或藍隊的標籤，確實可能影響外界對學者做出的研究進行客觀閱讀，例如藍隊學者的文章可能被認為是刻

²⁹ Andrew Mertha. 2009.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Review by: Andrew Mertha." *The China Journal* (62): 174-176.

³⁰ 弓联兵，2011，〈中國共產黨適應性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中國共產黨：萎縮和適應》評述〉，《理論與改革》，(5): 158-160。

³¹ Cheng-Feng Shih. 2005. "Understanding the Red While Singing the Blue: Reading David Shambaugh by the Line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57-76.

³² 郭壽旺，2006《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對李登輝總統九五年訪美案例之研究》，台灣：秀威資訊。pp.161-162

意強調中國的威脅，紅隊學者則是故意忽視中國的威脅。然而本研究有兩個看法與他不同。第一，郭壽旺指出，學者在不同兩岸議題上的主張可能不一致，但本研究探討的並非只是學者在不同議題上的立場不一致，而是主張學者在同個議題的立場都可能隨時間有所變化。第二，郭壽旺主要認為不適當之處是將紅藍隊的差異簡化成親共和親台，但是本研究主張，紅藍隊這樣的二分法本身就不足以為學者加以分類，正如本研究第二個推論：同一陣營學者的主張也可能大有不同。

馬博元的碩士學位論文《外交政策評估研究-美國智庫與我國對美外交》也同樣提到紅藍隊分類的不適之處，他藉由兩方陣營在某些議題的相同主張說明紅藍隊分類的不精確之處，紅藍隊學者在某些議題上也不盡然符合自身陣營立場，並認為紅藍隊分類對公正理解學者研究不利。³³同樣的，馬博元的文章並未討論本文所提出個別學者在同樣議題上立場可能不一致或是同一陣營學者研究可能有所差異等推論。鍾宜錚的碩士學位論文《一個所謂紅隊學者，藍普頓的中國認識》雖然並非以沈大偉為研究對象，但對現有紅藍隊的陣營與分析意圖有詳細的說明³⁴，有助於本研究討論現有紅藍隊分類的情況，不過該論文在注意到紅藍分類未必充分的認識下，最後並未跳脫出既有的紅藍隊框架。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採取歷史文獻分析和文本分析。歷史文獻分析主要有三個功能。第一，藉由歷史文獻了解當時人的想法與動機。第二，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經歷的階段以及每一個階段起作用的是哪些事件。第三，了解當時涉入事件過程的有那些人物、這些人物的背景及立場。³⁵其中第一個功能正符合本研究希望

³³ 馬博元，2004，〈外交政策評估研究-美國智庫與我國對美外交〉，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學位論文。p52

³⁴ 鍾宜錚，2013，〈一個所謂紅隊學者，藍普頓的中國認識〉，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³⁵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市：五南。p99

透過沈大偉的研究來了解他對中國立場的目的。因而本研究首先將會大量檢閱包含學術著作及其他公開評論在內的文章，視之為研究沈大偉關於中國各項論述的歷史文獻，並經由這些歷史文獻找出他的中國觀，接著將之與謝淑麗和藍普頓等紅隊學者的論述加以比較，討論紅隊學者彼此主張之異同。

雖然經由對沈大偉著作所構成的歷史文獻進行分析，可以將沈大偉所主張的美國對中國政策加以整理並和其他學者加以比較。但僅只能夠驗證本研究的第二個推論，紅隊學者之間主張有所差異。若要驗證本研究的第一個推論，同一學者在同一議題的立場並不一致甚至有點模糊，需要更深入了解在這些文獻以及政策主張背後，沈大偉的中國觀是否和其著作所呈現的論點一致，而這可能就不能單靠對歷史文獻分析進行研究。故而本研究在以歷史文獻分析初步整理了沈大偉的中國研究以後，將進一步透過文本分析來討論沈大偉真正的對中國立場。

本研究仍有其限制，由於沈大偉並無從事公開的口述歷史回憶，本研究即僅能透過他的個人背景及經歷來分析其著作及政策主張背後中國認識，以文本分析而言，如能依據深入訪談或口述歷史進行研究便會有所佐證。儘管如此，本研究認為藉由其背景與經歷分析其研究作品背後在中國認識對於本研究討論紅藍隊分類之妥適性仍有重要意義。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第二章主要討論沈大偉有關中國對外關係的研究。在第一節將討論沈大偉的中美關係研究。第二節則以沈大偉對中國及其他國家關係研究為主。第三節說明沈大偉所描述的中國國家安全觀以及戰略思考。

在第三章中，則主要整理沈大偉對中國內部問題的研究，本章第一節將主要整理沈大偉對中國共產黨的制度以及發展。第二節會特別討論沈大偉有關中國人

民解放軍的論述。第三節將以討論沈大偉對中國經濟發展觀察。

本研究第四章所從事的是分析和比較。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本研究主要做的是整理沈大偉的研究，並理解沈大偉的中國觀。但在第四章，本研究將比較沈大偉與其他兩位學者的差異。第一節與第二節都主要是將分別討論藍普頓與謝淑麗近年來對中國的看法。第三節則將分成中國的對外關係及內部事務兩個部份來分別比較三位紅隊學者的論述是否有關鍵的差異。在該章小結則根據前三節的結果，驗證本研究的第二推論，同被歸類為紅隊的學者之間主張也有差異。並綜合討論紅藍隊分類的妥適性。

第五章為本文結論，結論者要歸納前幾章的結果，回應本研究最核心的問題，單以主張抑制或接觸的美國對中政策為標準區分美國學者的二分法是否合理？

第貳章 沈大偉的觀點-中國對外關係

在這一章，本文以整理沈大偉自 1991 年以來有關於中國對外關係的論述與著作為主，將之按照以下三個類別加以討論，包括中美關係、中國戰略安全觀和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如前所述，紅隊與藍隊學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對中國對外關係發展的不同觀點，包括中國的外交路線是否企圖抗拒或改變現有國際建制、中美關係是走向合作或對抗還有兩岸關係等議題。本文既然希望透過沈大偉的中國觀來探討紅藍隊學者分類是否適當，則不可避免的需要藉由整理他的著作重新了解他對於中國對外關係的觀點。

第一節 中美關係

中國興起後將會與美國建立什麼樣的關係？是中國配合現有國際建制並與美國合作又或是與美國衝突甚至發生戰爭來改變現狀？這是當今國際關係學者們都關注的重要議題，更是紅藍隊智庫學者之間的主要差異。另外，談到中美關係又必然不能忽視台灣問題可能對兩國關係產生的影響。所以無論藍隊或紅隊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都對中美關係有相當多的研究，例如謝淑麗（Susan Shirk）就在《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一書中討論中國自身內部政治因素如何影響其外交決定還有與美國的關係。³⁶，沈大偉作為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自然也不例外。本節就旨在整理沈大偉自 1990 年以來對中美關係的研究，並試圖觀察他的觀點之演變。

沈大偉早期著名的中美關係的研究是他在 1991 年出版的著作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這本書主要源自他的博士論文。沈大偉在開頭即說明了進行這個研究的背景，在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於

³⁶ 謝淑麗原著，溫洽溢譯，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

1972年訪問中國之前，由於中共建政及隨後的冷戰開始，讓中美兩國社會的往來出現長達20年的阻隔，在此期間中美兩國僅有軍事上的接觸，例如韓戰或越戰。沈大偉主要想研究的問題就是中國對美國的印象，是否因為1972年中美恢復來往而有所改變。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Beautiful Imperialist* 主要關注的並不是一般中國民眾對美國的認知或印象，而是中國的「美國觀察者」（American Watchers）們的看法，因為沈大偉認為政府與民眾主要透過美國觀察者們認識美國，尤其中國政府在應對美國時必須傾聽這些觀察家們的建議。沈大偉並將中國的美國觀察分成兩類，分別是馬克思主義（Marxist）學派與非馬克思主義（non-Marxist）學派，他並解釋前者使用馬列式的分析與術語來解釋美國，後者則否。沈大偉並認為 *Beautiful Imperialist* 的研究顯示，儘管這些美國觀察者對中國的認識已有所進步，但即便是比較了解美國的非馬克主義學派的分析仍然淺薄甚至嚴重的扭曲。沈大偉指出，儘管自1972年以來雙方的瞭解程度已有所改善，但是中美關係仍存在巨大的認知差距。沈大偉更進一步的主張，如果雙方繼續缺乏對彼此正確的認識，中美關係將會因導向廣泛衝突的潛在可能因素而永遠感到困擾。³⁷中美雙方對彼此的理解不足，讓沈大偉對兩國關係的前景有所憂慮，事實上早在1988年他就曾撰寫 *Anti-Americanism in China* 一文，說明反美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並在1970年以前一直影響了中國對美印象。³⁸*Beautiful Imperialist* 一書則是完整說明了他對中國對美國印象的觀察以及中美關係前景的主張。

在 *Beautiful Imperialist* 一書中，基於認知不正確，沈大偉對中美雙方的前景並不樂觀，甚至認為兩國將因為這種認知不正確而永遠存在衝突的潛在可能。從該書可以看到沈大偉早期對中美關係的悲觀論調。

1995年沈大偉再度發表對中美關係觀察。該年6月7日，時任總統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令中-美-台的關係陷入緊張，沈大偉針對此事撰寫了一篇

³⁷ David Shambaugh. 1991.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³⁸ David Shambaugh. 1988. "Anti-Americanism in Chin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97 (1): 142-156.

題為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New Cold War?* 的文章，詳述了美國的中國政策與目標還有中國的對兩國關係的看法。

沈大偉在文章中提及，中國政府除了向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 (J. Stapleton Roy) 提出抗議外，還採取中止軍事交流的報復措施。另外，中國還利用非官方方式表達不滿。藉由這次事件，沈大偉詳述他對 1995 年時中美關係的觀察。沈大偉認為柯林頓政府執政後，台美關係更加友好。然而沈大偉提到眾議院希望給予台灣更多支持。沈大偉認為視中國的行為與美國國家利益敵對的看法正在眾議院滋長。而關於美國應如何與中國相處，沈大偉認為有三個學派，接觸、對抗和顛覆。沈大偉認為這三派的共同運作方式都是要改變中國的行為，但中國已證明是難以改變的。在中國的方面，沈大偉指出，李登輝的訪美事件破壞了對美合作派與反對派在北京的平衡，目前親美派不是政治正確的選項。中國民族主義和後鄧時期的政治變化也增加中國對美政策的政治不確定性，另外軍方在中國政府也扮演推進民族主義還有不妥協氛圍的領導角色。對中美關係的前景，沈大偉主張除非中國在政治上變得更加自由或美國不再計畫孤立中國並停止改變中國，否則中美關係將有一個冰凍的未來，但他認為兩方改變的機率不大。³⁹

上述內容表明，除了來自中美內部因素外，李登輝的訪美事件更增加兩國對彼此的不信任，尤其中國的親美派更因此退縮。對此，沈大偉認為只有雙方各自改變對彼此政策，才能改善雙方關係，但同時他又主張雙方不太可能改變政策，顯然沈大偉在 1995 年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仍相當悲觀。

2001 年沈大偉發表的「中美戰略關係：從伙伴到競爭對手」一文。該文指出，柯林頓政府希望與中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的常被批評過於幼稚，因為中美兩國仍有許多的戰略分歧。沈大偉認為真正的戰略夥伴必須具有相同的世界觀、戰略利益、政治制度和軍事關係，而中國與美國在這些方面都有所分歧或不那麼密切，他傾向用戰略競爭夥伴來形容中美兩國的關係。沈大偉認為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

³⁹ David Shambaugh. 199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New Cold War?." *Current History* 94 (593): 241-247.

太少，因而難以形成伙伴關係，他將中美關係描述為戰略競爭對手，他並解釋這是一種較為模糊的關係，其中包含衝突、合作與共存。沈大偉進一步說明，中國並沒有意願與力量美國進行全球競爭。不過中國不會容忍美國在亞洲的駐軍。在其他議題上，沈大偉也說明了中美兩國對於國際體系的不同構想，他在文中指出美國意圖建立一個以美國為領導的單極體系，但中國卻主張多極體系，並削弱與限制美國的力量。除此之外，針對人權以及台灣問題上，兩國也多有摩擦。沈大偉認為，兩國的衝突可以預期會伴隨著在亞太地區安全格局、力量均衡和波斯灣的競爭越來越升級，兩國在亞太的交鋒具體表現在台灣問題、美國在亞太的軍事聯盟與駐軍、美日安保條約的強化與防衛方針的擴大還有美國及其盟國部屬在亞太的地區導彈防禦系統和國家導彈防禦系統。不過沈大偉也在文中列出兩國在低階國際安全議題的合作，例如毒品生產、有組織犯罪和境外走私等議題，即使是防止核武器擴散、北韓與南亞核武問題等部分高階安全議題也有合作。因此，他認為中美關係是複雜的且兼具了合作與摩擦。沈大偉建議美國應當與中國建立戰略關係及加強合作，但美國也應正視兩國分歧的存在，並採取正確的對華政策。⁴⁰

從沈大偉在結論對於中美於部分安全領域合作的肯定，以及對兩國採取正確政策的期許來看，他在進入 21 世紀以後對中美關係的悲觀預想已有所改變。雖然如此，沈大偉在文中還是主張中美關係並未進入穩定時期，且衝突與摩擦同時並存，他認為中美進入實質的戰略夥伴的條件仍不足，他認為戰略競爭關係比較適合形容。

同年，沈大偉藉由對相藍欣所發表的文章寫了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相藍欣以英國應對德國崛起時的做法來比較今日的中美關係。他認為當時英國和現今的美國都因錯誤的認知，進行了先發制人策略，不只未取得優勢，反而破壞國際體系平衡還有的和諧。沈大偉認為相藍欣的理論是否完全正確還有討論餘地，但他認為相藍欣的分析有可取之處。相藍欣指出，根據小布希

⁴⁰ 沈大偉，2001，〈中美戰略關係：從夥伴到競爭對手〉，《世界經濟與政治》，(2): 51-57。

政府上任後，美國外交政策正出現一種危險的新單邊主義。沈大偉則認為，相藍欣的觀察大體正確，但是他忽略了在較強硬的新單邊主義一派之外，其實美國外交政策中還有較溫和的、主流的現實主義和國際主義世界觀者來加以平衡。而小布希總統的政策事實上傾向在兩者間擺盪。沈大偉同時提到，美國的中國政策也能看到這兩派的不同，溫和派傾向在一系列功能議題中，結合中國多邊網絡的戰略，於國際組織與中國政府進行全面雙邊接觸的戰術。單邊主義一派傾向新保守主義，強調中美關係中的安全方面，仍持續體現戰略競爭的概念。沈大偉並認為美國的新單邊主義與目前多邊主義趨勢相違背，因而他同意相藍欣主張美國為現狀修正國的論述。不過沈大偉並不認同美國是唯一的現狀修正國，他認為從兩個問題來說，中國也是現狀的修正國，首先中國明確反對聯盟關係，也不符合國際安全聯盟等多邊關係增加的趨勢。其次，中國服從國際規則不代表接受現有國際建制，而且中國在國際事務表現被動。在文章最末，沈大偉指出，中美之間從中蘇漸進和解以後，就一直沒有真正緊密的戰略組成關係。雙方對北韓核問題、波灣戰爭及戰後伊拉克處理問題、人道干預問題還有台灣問題等議題的歧見都仍持續困擾著中美兩國關係。⁴¹

從上述沈大偉對相藍欣的回應，可以整理出沈大偉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或許美國的新單邊主義的確違背了以多邊關係為主流的國際秩序，但中國本身其實未必就接受現有國際秩序。雙方都可算是修正主義國家，而這兩個修正主義國家卻有許多分歧與差異，沈大偉顯然認為中美關係仍將持續不穩定。這樣的看法隨著 2001 年爆發的 911 事件才有所改變。

2001 年末發生的 911 事件是美國本土首次遭到恐怖份子的直接襲擊，該事件掀起了全球反恐戰爭。沈大偉觀察到 911 事件以後，中美關係進入新的穩定期，他並於 2002 年撰文分析了這個新穩定期。在文章開頭沈大偉就表現出他對中美關係的謹慎態度，他先提醒讀者中美之間的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如果從歷史來看，

⁴¹ David Shambaugh. 2001.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43 (3): 25-30.

並無法主張這個新的穩定期會成為常態。沈大偉提到，在 911 事件發生後，中國透過幾個方式協助美國，包括協助起草和通過美國在聯合國大會還有安全理事會的兩個關鍵決議、支持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攻擊決議、透過外交方式說服巴基斯坦支持對塔利班政權的戰爭、與美國分享蓋達組織和塔利班的情報、在反恐方面提出一系列與美國的交流活動、封閉與阿富汗邊界避免恐怖組織轉移至新疆、調查並切斷中國和香港與恐怖組織有關之帳戶、協助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營及阿富汗重建工程。儘管如此，比起其他國家，中國仍在軍事援助上有所保留，例如基於主權因素，中國並不提供領空讓軍隊穿越或軍事基地，也沒有派遣部隊參加在阿富汗的多國軍隊，沈大偉認為中國對於在阿富汗進行軍事行動的不情願，為自身在反恐戰爭中其他方面正面的紀錄留下汗點。另外，中國甚至放棄了參與阿富汗重建的機會，對此沈大偉指出，中國應該主動行動，負起身為世界大國及安理會成員的責任。雖然沈大偉對於中國在反恐行動中的表現並不全然滿意，不過仍肯定中國做出的貢獻，並在該文結論的部分對中美關係前景表達了兩國做為貿易上的重要夥伴，他期許雙方能夠明智的謹慎管理雙邊關係，彼此互相尊重。⁴²

在上文中，沈大偉對中國在 911 事件後主動提供美國協助表示肯定，雖然他仍提到一些不足之處，但是從他在文章最後對兩國謹慎管理關係及相互尊重的期許來看，沈大偉對中美關係的發展已逐漸走向樂觀。隔年沈大偉參加北京「全球戰略背景下的美國與中國」國際研討會時的發言稿再度強調了中美近年的穩定關係，並更詳細的分析穩定的因素，並對如何維持發表了他的意見。

該篇演講稿刊登時題目為《美中關係新穩定：原因與結果》。在該文中，沈大偉指出，中美關係在 2002 年進入了從 1989 年以來最好的情況。沈大偉認為 2002 年中美關係之所以能保持良好的主要原因有三個。首先，中國在戰略上進行重新評估，認為當務之急為保持國內經濟成長以利 2002 年和 2003 年領導層的交接順利進行，另外對台政策的執行順利、911 事件後中國威脅論的式微還有中美在許多

⁴² David Shambaugh. 2002.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Current History* 101 (656): 243-249.

國際和區域事務上取得共識，上述理由令中國在外交上對美國採取寬容態度。其次，小布希政府認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是符合美國利益，且有助於亞太地區的穩定，並達成共識，認真對待中國，不採取忽視、對抗或遏制的策略。但沈大偉也指出，小布希政府同時認為美國應該同樣重視周邊盟友，將對華政策置於美國大亞洲政策的一部分，沈大偉強調，這並非代表遏制政策。最後 911 事件與反恐戰爭的進行，為中美關係的穩定提供適當的環境，中國給予美國的協助雖然跟其他國家相比並不算最多，但仍相當重要，對中美關係的穩定也有相當重要的幫助。除此之外，中美也找到許多在國際事務上的共同利益，例如支持對伊拉克銷毀大規模殺傷武器的最後通牒、反對北韓核武發展、反核武傳播、其他非傳統安全議題、中美軍事交流、中美都支持維護亞洲地區安全以及中國從波斯灣進口石油使美國要保持戰略脈絡暢通更顯艱巨。不過沈大偉指出，這種穩定能否長期維持還必須考慮到台灣問題的發展，像是美台軍售案或台灣高層官員的訪美活動，甚至是當時台北極力爭取的陳水扁總統訪美，都有可能讓中美關係惡化。除了台灣問題，事實上中美之間仍存有許多問題，儘管如此，沈大偉認為，中美之間仍有許多共同利益，尤其是貿易方面，因此如果雙方能夠謹慎處理彼此關係，中美的敵對並非不可避免。⁴³

顯然沈大偉對中美關係的前景已經逐漸改變，雖然他仍認為雙方尚有些嚴重問題，但如果中美都能夠小心處理，中美關係是有可能繼續維持穩定的。這相對於過去對中美關係可能不斷衝突和摩擦的預測來說是相對樂觀的。到了 2004 年左右，隨著沈大偉觀察到亞洲局勢的新變化，他開始針對中美關係在這波改變中可能受到的影響發表評論。從 2004 年開始，沈大偉提出亞洲秩序變動論，在他的演講與文章中認為，亞洲秩序已經因為中國的崛起進入了變動。

沈大偉在 2004-2005 年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冬季刊指出，中國崛起、美國在亞洲的權威及影響力下降還有東南亞國協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⁴³ 沈大偉原著，汪亮譯，2003，〈美中關係新穩定：原因與結果〉，《世界經濟與政治》，(10): 44-48。

Asian Nations) 的成立，都讓亞洲的國際秩序的傳統基礎正在發生變化。沈大偉並提到，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儘管仍非亞洲地區唯一強權，但是其周邊國家正在開始尋求中國的領導，沈大偉認為中國的崛起成為催生亞洲新秩序的動力。⁴⁴

沈大偉於 2005 年的《演進中的亞洲地區體系》一文中，進一步談到促使亞洲體系變動的六個特點。首先，美國所領導的安全體系仍是亞洲主要安全結構。第二，中國的外交更加主動積極，使其鄰國對中國的顧慮降低，更多國家主動和中國改善關係。第三，中美關係屬於一種防範性接觸，既在許多層面事務上實質合作，一方面又互相不信任。第四，中日關係惡化，雙方對彼此的認知消極、不信任。第五，以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東盟地區論壇、上海合作組織以及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為基礎，正形成一個新的規範性安全共同體。第六，全球化背景下，各國關係在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層面相互依存，有助於和平穩定。⁴⁵

顯然沈大偉認為中國的崛起促成亞洲秩序的重建，但是這個變化對於此前在亞洲具有重要影響力及地位的美國有何影響？更重要的是針對本節主旨，這又會對中美關係帶來何種變化？關於這部分，沈大偉 2004 年 9 月於大陸外交學院的演講內容即有說明。

沈大偉將這個問題區分成兩個層次，首先是中國的影響力和美國的亞洲影響力是否必然此消彼長？第二則是，關於亞洲事務，中美究竟是合作還是分歧較多？有關於第一個部分，沈大偉認為現實主義者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往往基於冷戰經驗，認為國際關係是零和遊戲，而沈大偉說明現今的環境與冷戰大不相同，亞洲有足夠空間讓中美各自尋求國家利益，他舉例說明，中韓關係改善與美韓關係惡化並未有直接關係，印度能同時與中美兩國交好，而上海合作組織亦未影響美國在中亞影響力，因此中美之間未必是零和關係。在中美合作與分歧方面，沈大偉指出，中美兩國在大部分層面，包括政治、經濟、反恐及跨國打擊

⁴⁴ David Shambaugh. 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3): 64-99.

⁴⁵ 沈大偉，2005，〈演進中的亞洲地區體系〉，《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4): 24-25。

犯罪等議題上都存有共同利益。台灣問題、緬甸問題中俄關係等議題則較有分歧。關於亞洲事務外交政策，中美兩國則保持一種不確定性，例如相較於 1997 年以前，中國對於美國力量退出亞洲的要求，態度變得較為模糊，不公開討論提出此事。另外，中美兩國儘管都反對北韓擁有核武，但關於應該如何處理，雙方仍有不同看法。沈大偉主張，這個新的亞洲秩序可能有四個模式，包括以美國為車輪軸心，主導亞洲安全事務同時仰賴其亞洲同盟支持的輪轂模式、中美在部分亞洲事務上合作的有限共治模式、由東盟和中國一同建立關於如何處理雙邊關係及區域衝突的國際規範的規範共同體模式、最後則是複合相互依賴模式，即各國間的貨物觀念彼此自由交流，讓國界不再如此重要。⁴⁶

在經歷過小布希時代以後，到了 2009 年歐巴馬政府時期，沈大偉認為中美關係正好處於一個最好的時期。沈大偉提到小布希政府提出的二元政策。首先是勞勃·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的觀點，促進中國成為負責的各國利益攸關方，呼籲中國承擔全球治理的角色與責任，承認中國為一全球行動者，並期待中國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另一方面，有鑒於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以及不確定的戰略意圖，五角大廈認為需要對中國進行防備。歐巴馬基本上繼承了小布希政府的政策，沈大偉認為中美目前存在的大好友善關係，不僅來自於小布希政府時的良好經營，還加上歐巴馬政府的繼承及公眾和兩黨的共識。但他也指出，台灣問題，特別是軍售議題仍然影響著中美關係。在結論的部分，沈大偉表明，沒有比中美關係更需要歐巴馬政府去管理的重要關係，因為中國已成為全球性的行動者，並在許多領域與美國有著一致的利益。沈大偉建議進行中美應合作，以最大程度減少衝突。⁴⁷

2009 年沈大偉對於歐巴馬政府與中國的關係給予高度肯定，認為中美關係延續

⁴⁶ 沈大偉原著，朱杰進譯，2004，〈中國、美國與正在演變中的亞洲秩序〉，《外交學院學報》，(4): 47-50。

⁴⁷ David Shambaugh. 2009. "Early Prospect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Agenda with China." April.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09/04/china-shambaugh> (February 20, 2015).

了小布希政府時代的穩定，但到了 2009 年以後，他觀察到了中國的「異常」變化。沈大偉指出，2009 年以降，中國不斷打擊國內與抨擊國外，中國觀察家們也都對此感到困惑。沈大偉更指，許多觀察家相信中國會越來越難以相處。沈大偉在文中提到，自 2010 年初起，中美關係已經因為 Google 被駭客入侵事件、對台軍售、美國抱怨人民幣實力還有中國反對美國對伊朗進行進一步的制裁等事件影響而日漸緊張，中美都正準備進行一系列的報復關稅和反傾銷稅。沈大偉指出，美國並非唯一和美國相處有所問題的國家。對此，沈大偉列出各種解釋，有認為中國這個崛起力量顯露出了意圖挑戰現狀的真面目，亦有觀點認為這是由於 2012 年中國正準備面臨領導過渡的關係，也有認為中國外交政策中的現實主義者贏得主導權。沈大偉自己只在結論引用中國傳統認為虎年國家會動盪的說法，評斷 2009 年以來是動盪的一年。⁴⁸雖然 2010 年中美進入不穩定的狀態，但沈大偉對此只陳列出他觀察到的情況，並未有所評論他似乎仍在觀察當中。

到了 2011 年，沈大偉認為相較於 2010 年，2011 年的中美關係再度進入穩定時期，這主要歸功於 1 月胡錦濤對華盛頓國事訪問，還有同年 5 月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AED）以及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Joe" Biden, Jr.）與海軍上將馬倫（Michael Mullen）的訪問。2011 年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沈大偉則認為該會議顯示中美正進入實質合作。另外，這次會議也反映了雙邊關係制度化的提升。總結而言，沈大偉認為中美關係在 2011 年不僅得到改善與穩定，而且得到了「新動力」，但他也提醒，中美關係在過去常在良好關係過後就發生了緊張與摩擦，雙方尚未找到穩定的平衡關係前觀察中美關係必須謹慎樂觀。另外沈大偉也在同篇文章指出，中國正由全球行動者邁向全球性大國，必將影響美國在全球的利益，兩國關係具有競爭性也是必然的，這將為雙方帶來不信任感。沈大偉認為不應追求中美的完全合作，而要接受雙方關係存在競爭性，他並提出兩個 I，分別是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和制度

⁴⁸ David Shambaugh. 2010. "The Year China Showed its Claws." February 16.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0/02/16-china-shambaugh> (February 15, 2015).

(institutionalization) 作為加強雙邊關係，形成兩國合作習慣的保障。⁴⁹

從上述內容來看，沈大偉在 2011 年認為相較於 2010 年，中美關係再度恢復穩定，並得到了新的動力。但是此時的沈大偉已經主張要接受中美關係之間的競爭性，而且提出兩個 I 做為保障這個新穩定的機制，可見他對這個新的穩定期能否維持並非無條件樂觀的。沈大偉在 2012 年接受中國日報專訪時，更是明確的指出，中美關係的競爭將越來越多於合作。

沈大偉在該篇專訪明確指出，中美雙方在經濟、戰略及文化等各領域由競爭來主導將是中美關係的新特點，同時緊繃的關係將是常態。沈大偉並說明，儘管兩國的交流和合作日漸增加，但是對彼此的不信任感也日深，他甚至提到許多美國人將中國視為對手而非夥伴。對於解決的方法，沈大偉提及相互依賴有利防止這種競爭關係演變成衝突，沈大偉並認為只有透過不斷的對話增加對彼此的理解，才能解決這樣的情況。⁵⁰

從上述的專訪內容來看，沈大偉在 2011 年及 2012 年對中美關係已經不如以往樂觀，2011 年他認為中美關係找到新動力，但是他對這個穩定能維持多久表達了擔憂，並提出建議來協助中美兩國維持穩定。然而 2012 年沈大偉再度指出競爭以及緊繃將成為中美關係的常態，這相對於 2004 及 2005 年對中美可以共同合作並追求在亞洲的利益，或著在 2009 年對歐巴馬政府時期中美關係的正面肯定，沈大偉在 2011 年及 2012 年的觀察顯得相當悲觀許多，不過沈大偉仍對此提出他的建議，換句話說在積極對話和相互依賴等條件下，他仍對中美關係的改善有所期待。

⁴⁹ 沈大偉原著，鮑世奮、張沛校譯，2011，〈2011 年的美中關係：從脆弱到實質性穩定〉，《國際展望》，(6): 91-126。

⁵⁰ 譚英姿 鄧章瑜，2012，〈中美關係新特點：競爭多過合作 ——專訪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中國日報網：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12mgdx/2012-10/19/content_15832258_2.htm，檢索日期：2015 年 4 月 10 日。

2013 時，沈大偉在其專書 *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 對中國的外交影響力提出批判，他引用奈伊（Joseph Nye）的理論，認為影響力（軟實力）的缺乏使中國尚未成為一個全球大國。沈大偉並在該書主張中國雖然已認知到軟實力的重要性，但實際上在外交、全球治理、經濟、安全和文化等領域對國際的影響仍然有限。⁵¹沈大偉也在該書評論中國外交表現時討論了中美關係，他指出中美雙方的官方描述都認為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當然也是最複雜的關係。沈大偉並說明了雙方關係的密切，例如雙方在對方國內都有大量留學生與研究員，另外也每年舉行戰略與經濟論壇，可惜的是雙方的對話並未有太具體的成效。另外，沈大偉也認為中美關係近幾年來無論在經濟或共同利益領域的合作，雙方都表現的不是太好。但沈大偉在文末也強調，中美關係必須要謹慎把握在競爭與合作之間的平衡。⁵²

上述 2013 年的著作，沈大偉不僅批判了中美關係，認為兩國關係在近幾年來的表現不佳，甚至批評了中國在各方面的影響力仍然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沈大偉認為近年來雙方的對話未具成效，而他在 2012 年的專訪當中就曾指出，對話是解決中美關係緊繃常態的唯一方法，顯然沈大偉不認為中美兩國達成他的期許。

除了該書以外，沈大偉在同年的 7 月發表了文章，評論新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希望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沈大偉肯定中國的這項提議，因為雖然他認為中美的權力轉移仍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但隨著中美關係的競爭增加，不信任感也逐漸增加。沈大偉並在文章中引用皮尤全球態度調查，指出中美兩國人民對彼此信任度也不高。沈大偉在文中認為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有利於中美走出現在可能走向進一步敵對的「舊型大國關係」。雖然沈大偉贊同「新型大國關係」對中美關係的益處，但他認為該構想不夠現實，他主張建立「競爭性共存關係」，

⁵¹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⁵²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73-78

雙方加強競爭管理，並以雙方相互依存的關係作為緩衝，彌補雙方競爭管理經驗缺乏可能造成的衝突。⁵³

在上述 2013 年的文章，沈大偉認為雙方只能建立競爭性共存關係，在管理雙方關係的同時，透過相互依賴來緩衝彼此的衝突。此時期的沈大偉不再認為中美關係可順利邁向完全合作，而僅能管理競爭來避免可能發生的摩擦。到 2015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前夕，沈大偉提出對中美高峰會成果的十項觀察指標，其中相當重要的是他對這次峰會對中美關係影響的看法。

「中美關係對兩國以至全球都至關重要，雙方政府都不會任由兩國陷入敵對關係，否則兩國的領導人必然要為此下臺。然而，中美關係需要有更堅實的基礎，不能光依靠短期協議或領導層維持關係的意願去支撐，而是需要在棘手的重大問題上尋求實質進展。但由於中美分歧既深且廣，而且涉及實質的國家利益，要在重大問題上尋求進展並不容易。在這種情況下，最樂觀的預期是雙方能夠達致「競爭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的關係：兩國既能有效管理分歧、防止情況失控，也能夠針對彼此的重大關注議題，作出相應的讓步。」⁵⁴

沈大偉再次在文中強調了競爭共存的概念，他並指出，儘管中美雙方的領導人都沒有意願讓兩國關係惡化，但是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使得分歧不可能如此輕易解決。從這裡也可以看到，競爭共存已是沈大偉認為中美關係最樂觀的情況。高峰會結束後，沈大偉則撰文認為此次高峰會是成功的，但他同時指出，兩國過去高峰會取得的成就往往在幾個月後回到分歧、不信任還有惡語相向等狀態，因此他建議有必要保持定期的往來與會面。⁵⁵

⁵³ David Shambaugh. 2013. "Prospect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March 07.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 (April 21, 2015).

⁵⁴ 沈大偉，2015，〈沈大偉：從習近平訪美觀察中美關係的十大指標〉，南華早報中文網：<http://www.nanza.com/tc/international/14ff4b37318fb11/shen-da-wei-cong-xi-jin-ping-fang-mei-guan-c-ha-zhong-mei-guan-xi-di-shi-da-zhi-biao>，檢索日期：2015 年 9 月 28 日。

⁵⁵ David Shambaugh. 2015. "Reserving differences while finding common ground'." September 28.

綜合了沈大偉自 2010 年至今對中美關係的觀察後，大致可以說明他對中美關係的看法並不再如 2001 年到 2008 年那麼樂觀，他一再的強調中美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從他嘗試透過雙方「競爭性共存關係」來緩和中美可能發生的衝突，還有他對中美未來定期交流的建議來看，在部分條件下，他對中美關係的前景並未那麼悲觀。

第二節 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

本節從沈大偉關於中國的其他外交關係的文章中，整理出他對中國與歐洲、俄羅斯以及拉丁美洲關係的評論和觀點，之所以整理出這三個地區與國家，主要是中國與這些地區的雙邊關係都是對國際事務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在經濟與政治領域對國際事務有重大影響，身為美國的盟友，歐盟與中國的關係也影響了中美之間的合作或競爭。俄羅斯近年來積極提高自身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話權，且與歐美之間的關係也不太穩定，中俄關係的穩定與否也對國際局勢相當重要。最後是拉丁美洲，過去一直是美國的後花園，中國在此地積極的增加影響力，必然牽動美國的戰略布局。基於這些地區的重要性，本節因而將關於這些地區的研究整理出來，希望能讓明白沈大偉如何看待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外交行動。

歐洲

2004 年沈大偉撰寫了 *China and Europe: The Emerging Axis* 一文描述當時的中、歐關係。沈大偉在文章中提到，中歐已發展成為一個全面、多領域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但在武器交易方面，沈大偉指出，中國急於解除歐盟自 1989 年以來的對中武器禁運，而在過去一年中，歐洲承受來自中國希望解除禁運的壓力，同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5/09/28-xi-us-visit-common-ground-shambaugh>
(September 30, 2015).

時美國也施加壓力要求歐盟維持禁運，這讓歐盟陷入一個敏感的外交糾紛之中。沈大偉認為雖然許多歐盟國家都認為禁運是過時的，但他們仍在意三個議題。第一是人權議題。第二點則是歐洲國家並不想增加中國軍力投射能力和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最後，解除禁運可能讓原本已經緊張的美歐關係更加惡化。沈大偉認為武器禁運仍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議題，歐盟要如何處理這個議題，兼顧到中歐及美歐關係，仍有待觀察。沈大偉指出，中歐關係處於一個蜜月期。他認為雖然中、歐關係仍因為武器禁運、拒絕提供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及人權等議題，而有所阻礙，但是他也列舉中歐關係中的有利因素。首先是中歐關係在冷戰時一直立基於美蘇的雙邊關係上，冷戰的結束為中國與歐洲大陸間的政治與商業關係打開了道路。第二，歐盟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因此中、歐也少了一個可能的潛在刺激因素。第三，歐洲在東亞也沒有真正的軍事或戰略利益，也沒有軍事聯盟或軍事上的承諾。第四，中國與歐盟對於美國都設法限制美國霸權。第五，歐洲在技術供給方面能滿足中國的需求，中國則提供了低成本製造基地。第六則是歐盟與中國發表的一系列文件顯示了中歐正進行各式各樣的接觸。關於歐盟對華的政策，沈大偉羅列了歐盟的三個主要戰略，幫助中國在全球多邊機構獲得信心且承擔相應的角色；加強歐盟與中國的雙邊交流；改進中國的內政能力以管理治理上的挑戰及提高生活水平。在該文最後，沈大偉主張，由於缺乏在全球戰略及利益上的衝突，加上一直依附在中美關係的背景下，他認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國與歐洲將在穩定的步伐下持續成長，並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歐關係將成為世界事務中的新主軸並發揮穩定世界的作用。⁵⁶

沈大偉對中、歐關係顯然是樂觀的，不過如前所述，中、歐關係中最敏感的議題之一當屬武器禁運，沈大偉在 2004 年的文章中僅客觀列出中-歐-美三方在武器禁運方面的立場與難題，但在 2005 年沈大偉明確表達其反對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的立場。

⁵⁶ David Shambaugh. 2004. "China and Europe: The Emerging Axis." *Current History* 103 (674): 243-248.

2005年2月23日，《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刊登了沈大偉的一篇評論，關於小布希總統試圖說服歐洲不要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沈大偉列出歐洲要求解除禁運的主要論點，並逐一說明總統應如何加以反駁。第一個觀點是禁運政策出自1989年的公報，並不具法律約束力。對此沈大偉認為禁運確實並未完全禁止國防技術或零件進到中國，但很大程度的防止了致命武器的進口，而且能針對中國仍未承認於天安門事件殺害平民傳達某種政治信號。第二個觀點則認為對於致命武器和國防技術出口到中國，解除禁運後，對編碼的加強將建立一個更嚴格的軍售制度。但沈大偉反駁認為，加強編碼的確有助於對殺傷武器和零件的售出，卻對於防衛和軍民兩用技術未加限制，這正是中國最希望從歐洲取得的技術。第三個主要觀點提到禁運與現在中、歐關係的全面穩健呈現不一致，禁運表達了對中國的歧視，這會成為中、歐關係深化的一個阻礙。沈大偉卻認為中、歐關係從未像現在這麼好，很難認定對於未來進一步改善的阻礙。第四個觀點是歐盟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大有改善，當初施行禁運的理由已不復存在。沈大偉指出，雖然中國人權自1989年來逐步提高，但是1989年是一個相當低的標準。中國仍有如勞改營及政治犯等人權問題。第五個觀點認為中國將在五年內能製造出和法國所擁有的相同的武器，因此禁運並無意義。沈大偉指出，中國的軍事工業技術水平至少落後10到20年，而西方的禁運也確實減緩中國的製造能力。該文最後主張歐洲必須考量其戰略有必要加強中國的軍事能力嗎？他認為答案是否定的。中國的軍事投放能力增加將從根本改變東亞安全環境，這也是美國所關切的。更重要的一個核心問題是維護台灣的安全，防止中國擁有用以對付美軍的歐洲武器。沈大偉認為美歐可以盡量享受與中國間的友善關係，一方面維持禁運，中國只能忍受，直到他承認天安門並停止對台施加軍事壓力。⁵⁷

顯然在2004年到2005年間，沈大偉對於中、歐關係的前景持有樂觀看法，但卻不同意歐洲因此而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認為這對東亞局勢會形成不穩定

⁵⁷ David Shambaugh. 2005. "Don't lift the arms embargo on China." February 23.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5/02/23china-shambaugh> (March 12, 2015).

因素。不過除了武器禁運議題外，在上文當中，沈大偉對中、歐關係仍給予積極的肯定，認為中、歐關係正處於前所未見的友好狀態。不過即便是他一度樂觀的中、歐關係，到了 2007 年的時候，他也不再無條件看好了。

2007 年，沈大偉發表了一篇名為 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Complicated 的文章。在該文章的開頭，沈大偉即指出，經歷過 10 年的穩定提升關係後，中、歐關係進入了一個更加複雜的階段，他認為中、歐關係正從蜜月期進入婚姻關係，雙方都開始意識到彼此關係的複雜性。沈大偉並引用了歐盟委員會 2006 年發表的官方《通訊》（Communication），所列出對中國的看法，該清單大致上期待中國在貿易上更加符合 WTO 規範、加強軍事的透明化、更積極負責以及維護台海和平。沈大偉指出，這些清單讓中國政府與歐洲觀察家感到意外，使得北京的歐洲觀察者們認為歐洲正採取與美國相同的遏制或對抗政策。不過沈大偉提到，中國的外交官員私下表示能「了解」歐洲的擔憂，中國也仍維持並進一步推動與歐洲的合作關係。沈大偉認為，雖然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並未生變，但這些文件確實反映了歐盟有所改變，他根據過去經驗整理了六個變量來推測歐盟未來的政策走向。首先是貿易因素，隨著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長，加上部分國家的高失業率，歐洲將越來越能感受到「中國因素」。第二，中國對於歐盟通訊提出的問題要如何回應？歐盟又如何回應中國解除武器禁運等要求？第三個變量，2006 年以前的通訊對中國較樂觀的看法引起其他民間或非政府組織不滿。因此 2006 年的通訊顯示歐盟將更聽取成員的意見。第四，歐盟投入大量資源在政治、經濟和口頭上協助中國內部改革，並分享自己作為福利國家的歷史，比起美國只祝重中國崛起的外在表現，歐洲更關心其內部條件。第五，歐洲試圖促進中國的全球治理，中國是一個日益全球性的行動者，歐洲希望北京能協助處理困擾國際秩序的挑戰與危機。第六，美國因素及角色也很重要。與中國的關係對歐美關係有重要影響。沈大偉在結論表示，中、歐戰略夥伴關係仍是重要的世界事務，但回顧 1995 到 2005 年中歐的十年關係，中歐已逐漸走出蜜月期。他指出，雙方必須降低期望值，學

習管理彼此分歧並發展機制，以期待建立一個長期的婚姻關係。不過沈大偉也認為大量的債券與共同利益仍將暫時推動中、歐的密切合作。⁵⁸

沈大偉在 2007 年的這篇文章已經觀察到中歐關係正逐漸改變，他用結束蜜月期來形容，表示中、歐必須開始正視雙方關係的複雜性及實質的分歧意見。然而沈大偉仍期待中歐關係能夠藉由積極的管理彼此關係而度過眼前的瓶頸，走向穩頂的長期關係，因此雖然不能說沈大偉對中、歐關係仍然相當樂觀，但在雙方小心處理關係加上目前的仍存在共同利益的條件下，他還是看好中、歐關係的前景。上述都是從歐洲的角度看待中、歐關係，到 2008 年⁵⁹的時候，沈大偉在他與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還有周弘主編的專書《中歐關係：觀念、政策與前景》裡針對中國如何看待歐洲進行了分析。

沈大偉指出，中國對歐洲的看法是源於中國對世界體制與秩序的理解與偏好，這使他們得到一些與事實相左的結論。沈大偉進一步說明了中國的歐洲觀察家總是嘗試在其政策優先目標中尋求並達成中、歐之間的共識。沈大偉指出，中國分析家認為歐盟在某些問題上獨立於美國之外，因此中國的歐洲分析家們認為歐洲是多邊主義的提倡及實踐者。有些觀察家則認為中、歐在推進經濟全球化及反政治全球化方面具有共同點。沈大偉指出，在整體關係的部分，中國的分析家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就給予中、歐關係壓到性的積極評價。對於 2003 年中、歐宣示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沈大偉說明部分分析家認為這是歐洲並不支持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的結果。軍方則認為中、歐在打擊恐怖分子和有組織犯罪等方面的成果，的確稱得上是戰略伙伴關係。不過中國觀察家們也認為中、歐關係也仍有一些問題，例如中國對人權議題仍然敏感；歐洲至今仍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歐洲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最後，沈大偉針對中國的歐洲認識提出三個觀察，首先是中國的歐洲觀察家對歐洲事務及歐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非常

⁵⁸ David Shambaugh. 2007. "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Complicated." May .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7/05/china-shambaugh> (April 22, 2015).

⁵⁹ 本文引用的是中文版，原文出版於 2008 年。

熟悉，儘管歐洲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深度及廣度及不上中國對歐洲的分析。其次，大多數中國分析家儘管認為雙邊仍有些問題，但對中、歐關係的現狀與未來抱持樂觀看法。第三，中國的分析家對歐洲的評估存在認知不一致，中國非常明確自己追求的國際秩序，因而容易發現其他國家政策與其目標相同之處，誇大與歐洲的相似性，低估或忽略了差異性。⁶⁰

看起來沈大偉對中、歐關係的樂觀程度遠勝於對中美關係，但是在他 2013 年的 *China Goes Global* 一書中，則指出中、歐關係在 2010 年開始出現問題。沈大偉列舉出中、歐雙方對彼此關係的不同看法，歐洲認為中國並不總是幫助或回應他們所關切的問題，並對彼此關係感到不適，而中國方面則仍樂觀看待中、歐關係。沈大偉在書中認為中、歐關係是在衰退的。⁶¹

俄羅斯

在《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中關於中國周邊安全的部分，沈大偉詳述了中俄關係自 1990 年代來的改變。他在該書提到中蘇之間曾有多次糾紛與衝突，但隨著冷戰結束，中俄關係開始了明顯的改善。包括 1990 年代雙方建立共識要成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1 年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沈大偉指出該條約展現中俄兩國決心共同對抗美歐主導的全球秩序。換言之，沈大偉觀察到中俄兩國藉由對現有國際秩序的共同不滿形成良好的合作關係。相對於沈大偉於中俄國際安全事務合作所給予得正面肯定，他對貿易領域就不那麼看好，他提到中俄兩國的雙邊貿易金額相當小，僅 80 億美元。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則包括，兩國劃定 4340 哩的邊界，並協議邊界軍事化，中國分別在 1996 年和 1997 年與俄羅斯、塔吉克、哈薩克還有吉爾吉斯簽訂「沿邊軍事領域信心建立協定」(Agreement on Confidence Building in the Military Field along the Border Areas) 及「邊界地區相

⁶⁰沈大偉，2010，〈中國眼中的歐洲：真實的不一致還是認知不一致？〉，載於《中歐關係：觀念、政策與前景》，沈大偉、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周弘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19-140。

⁶¹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86-94

五軍力裁減協定」(Agreement on Mutual Reduction of Military in the Border Areas)。沈大偉認為，兩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確實強化了雙邊的共同安全及區域安全，另外中俄也在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上找到共同目標。⁶²雖然沈大偉在該書中對於中國在改善中俄關係方面的成功給與肯定，但到了 2009 年開始，沈大偉對中俄關係的觀察已經大不相同。

2009 年時沈大偉在紐約時報發表關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俄行程的評論，於該評論開頭他指出，胡錦濤的訪俄行程昭示著中俄自蘇聯解體以來雙邊關係的顯著進展。但他認為中國正逐漸令俄羅斯頭疼。他評論胡錦濤與俄國總統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 (Dmitry Medvedev) 的會面，對於雙方在貿易、能源、文化交流或軍事及核武問題上的合作給予積極的評價。不過另一方面，沈大偉提到，中俄友好關係也存在某些問題，包括了中國全球股市及責任的成長與俄羅斯的縮減、俄對中的軍售量下降、中國進入中亞地區還有近來美國提出的「中美全球夥伴關係」都有可能影響中俄關係。⁶³

顯然沈大偉對於中俄關係的前景已不如 2002 年時樂觀，他曾讚賞中俄雙邊關係在蘇聯解體後的有相當大的改善，現在卻主張在兩國更緊密合作的表面下，中俄可能恢復過去的猜疑與競爭。在 2013 年的著作中，沈大偉也指出，即便總體而言中俄關係是健全的，但是歷史記憶與中國對同盟的恐懼仍籠罩在中俄關係之中。⁶⁴

拉丁美洲

沈大偉在 2008 年撰文討論了中國在拉丁美洲的新進展，文章開頭他即指出，2008 年 11 月的 G20 會議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拉丁美洲的領導，展現了中國在拉丁美洲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的新里程碑。沈大偉指出，中國與拉丁美洲的貿

⁶² 沈大偉原著，高一中譯，2004，《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pp.442-445

⁶³ David Shambaugh. 2009. "China and Russia: When Giants Meet." June 15 .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9/06/15-china-shambaugh> (July 22, 2015).

⁶⁴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78-86

易日益成長，從 2000 年的 126 億美元到 2007 年的 1026 億美元，成長近八倍。另外，在文中沈大偉還說明中國對拉美的援助，包括建立公路，鐵路，煉油廠和港口以方便向中國出口。另外沈大偉提到，約有 15 個拉美國家已經批准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與智利和秘魯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正醞釀當中。但沈大偉也在該文指出，拉美國家並非都對與中國關係表現積極，尤其中國已在拉美過半國家得到市場經濟地位，而有部分國家如墨西哥和阿根廷已被中國的傾銷商品所打擊。沈大偉並主張，拉美若不盡快發展出自己的專長，恐怕將會不足處理中國接下來將帶來的問題與挑戰。⁶⁵另外，在 2013 年 *China Goes Global* 一書，沈大偉指出，中國在拉美國家墨西哥等的印象越來越消極。⁶⁶

除了上述三個地區及國家外，沈大偉尚有討論中日及中非等雙邊關係，但由於篇幅較少或附屬於其他雙邊關係而略有提起而已，本文即未加介紹，且本節開頭即有說明所選的區及國家之重要性，故筆者認為透過上述所選的區的研究摘要，已可初步檢視沈大偉的中國對外關係研究。

第三節 中國戰略安全觀

本節將討論沈大偉對中國安全戰略相關的研究，此處的安全戰略是專指中國在軍事安全方面的戰略考量，國防戰略與對外關係息息相關，而且亦是紅藍隊學者在爭論中國是否會成為威脅時的一個重要分歧，因而本節將這部分放在對外關係中分析。至於解放軍內部的制度及現代化進程和中國內政較有關係，因此會在下一章加以討論。

關於中國軍事安全觀，沈大偉的文章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就有所討論，他在該文章認為由於中國在冷戰時期長期處於敵

⁶⁵ David Shambaugh. 2008. "China's New Foray into Latin America." November 17 .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8/11/17-china-shambaugh> (July 2, 2015).

⁶⁶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1-120

人的包圍，因而即便今日的中國已處於相對安全環境，解放軍仍對美國及自身周邊國家感到威脅。面對這樣的一個「預設」自己處於威脅的解放軍，沈大偉在文末建議美國及其盟友與中國建立具有合作成分的「競爭性共存」戰略伙伴關係，以避免敵對關係。⁶⁷

沈大偉的著作中以 2002 年出版⁶⁸的專書《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第七章詳述了解放軍對威脅的看法，沈大偉指出，解放軍和中共文職領導人對威脅的看法，在決定中共軍事態勢和現代化的優先次序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這是為什麼有必要理解解放軍在安全與威脅方面的評估。沈大偉提到中國在 21 世紀初，已經和其周邊國家都建立了合作關係。沈大偉詳述了過去與中國有衝突的鄰國，在 14 個與中國接壤的國家以及海上鄰國幾乎都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相對於當時，沈大偉認為中國正處於新的和平景象，那些過去的威脅已經消失，中國已更加像個現狀強權。中國也比過去更深入的參與世界事務，1997 年也同意於「適切時機」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在論述了中國目前處於前所未有的安全環境後，沈大偉進一步的說明自 1997 年開始出現的「新安全觀」，沈大偉認為「新安全觀」主要反映了中國對區域及國際關係和安全的幾個面向上的看法。首先是中國對目前由美國主導的單極國際體系有所不滿。其次中國反對透過脅迫或武力來解決爭執。第三是北京希望採取更主動積極的外交策略，且希望被視為全球性大國。最後，沈大偉認為「新安全觀」的提出主要與美國在各地鞏固同盟關係有關，例如北約的擴張，還有美國於東南亞建立五個雙邊安全聯盟並強化與東亞、南亞及中亞的非聯盟性質安全關係等。沈大偉認為從最後一點來看，其實新安全觀是針對中國的鄰國提出的，因為中國的官員或分析家都一直擔心美國強化聯盟的目的是為了對付中國，特別是可能因為台灣問題而對中國採取行動。他指出，中國傾向從「圍堵」和台灣問題這兩個角度來看美國在亞太的所有安全關係。⁶⁹

⁶⁷ David Shambaugh. 1999/2000.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24(3): 52-79

⁶⁸ 原文出版於 2002 年，本文引用的中文譯本則出版於 2004 年。

⁶⁹ 沈大偉原著，高一中譯，2004，《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pp.439-451

從上述內容為止，沈大偉認為中國已經成功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使自身處於相對過去安全的環境，與此同時中國也逐漸採取更積極的外交政策。然而沈大偉同時認為中國「新安全觀」的提出雖然是有部分反映對美國為主的單極國際秩序不滿，但另一方面也是針對美國與中國周邊國家的軍事同盟而來，換言之，沈大偉認為新安全觀也反映了中國對美國圍堵政策的警戒。那麼接下來就說明沈大偉所觀察到解放軍對威脅的看法。

沈大偉認為，解放軍的分析人員仍視中國所處的環境是相當危險的。沈大偉列舉了軍方的分析家的主張，他們看法略有不同，但都一致的視美國為國際安全事務的破壞力量。關於中共軍方對美國追求霸權的憂慮，沈大偉指出，中共軍方的分析報告都將美國描述成追求霸權、擴張主義及追求成為全球及區域主宰的國家。沈大偉並指出，中國的分析家認為多極體系的崛起將可制衡美國對霸權主義的追求。另外，沈大偉說明，解放軍的分析家對於美國的聯盟組建一致反對，儘管1997年後這種反對漸趨和緩，而逐漸有分析家認為這種聯盟並非對付中國，不過仍強調這種聯盟關係不應干涉台灣問題。沈大偉並引用不具名的解放軍分析家以及將領的看法，認為美國仍設法影響中國，且試圖塑造中國。沈大偉在該章最後提到台灣問題，他指出台灣是人民解放軍最有可能與之爆發衝突的國家，但解放軍出版的刊物中卻很少談及兩岸間的軍力平衡或雙方爆發衝突時的預想。沈大偉也提到，有一些將領對解放軍攻台的方式有所描述，但沈大偉也指出，所有的戰術想定都受到一個重要變數的支配，也就是美國的軍事干預。不過他也指出，解放軍也有信心在台海戰爭中面對美軍的介入。⁷⁰

綜合來看，沈大偉觀察下的中國已逐漸展現出大國的自信，除了外交政策上變得主動積極，也從與周邊國家的協議中取得實質的外交利益，甚至逐漸有分析家不再視美國的亞洲盟國是為了圍堵中國。然而對解放軍來說，美國在亞洲聯盟

⁷⁰ 沈大偉原著，高一中譯，2004，《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pp.451-468

仍是中國的威脅，而且美國若干預台灣問題則中美發生軍事衝突的機率仍大，但根據沈大偉的看法，解放軍已有信心面對中美因台海發生的衝突。

小結

本章已經整理出沈大偉對中國外交關係的相關研究，簡略回顧前面三節的內容。首先關於沈大偉在進入 21 世紀前對中美關係的研究，從 1987 年的《中國的反美主義》到 1991 年《美麗的帝國主義》裡，他都表現出對兩國關係的悲觀預測，他認為中美兩國仍有嚴重的錯誤認知，若不處理這個認知上的扭曲與差距，將讓中美關係持續陷入摩擦與衝突。之後他 1995 年文章也表示中美對彼此都採取錯誤的政策，而雙方都不太可能改變，所以他仍主張中美的未來衝突不斷。我們似乎可以說沈大偉在早期並不看好中美關係可以走向穩定與和平。

沈大偉 2001 年的文章或評論並未改變對中美關係衝突本質的看法，不過他開始期待中美能採取正確外交政策。2001 年可以說是沈大偉在中美關係研究的一個轉折，儘管如此，似乎很難說他的觀點有了具體的改變。沈大偉真正開始對中美關係有樂觀看法是在 2002 年的 911 事件以後。正如筆者在前文所引用沈大偉的文章，恐怖攻擊發生後，中國對美國反恐戰爭的協助加上美國首要戰略目標的轉移，讓兩國關係逐漸改善，這些因素讓他觀察到中美關係的新穩定期，他對這個穩定期的時間長度保持謹慎卻不悲觀，他認為兩國只要相互尊重，這段穩定期是有可能維繫的。顯然在 911 事件後，沈大偉已不再如同 2000 年以前主張中美關係必然走向衝突不斷的未來，這個觀點在 2004 年他觀察到中國成為亞洲秩序變動中的主要動力後仍沒有改變。

沈大偉在 2004 年到 2005 年都公開表示亞洲的局勢正在改變，中國在這個改變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卻不主張中國的崛起必然對美國地位造成打擊，他甚至列出中美合作的可能模式。顯然中國的崛起並不讓他認為中美必然因此而發生衝突。

2009 年歐巴馬政府上台，沈大偉認為中美關係依然持續穩定，他對歐巴馬政府承襲小布希時代的對華政策表示肯定，認為這有益於中美關係的穩定。儘管美國的對華政策沒有太大變化，但是 2010 年時，沈大偉卻觀察到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轉變，如前文所述，他指出中國對待其他國家的態度轉趨強硬，對於雙邊或多邊爭議更表顯得不容妥協，這對中美關係當然也有所影響。儘管如此，沈大偉並沒有對此一轉變有所評論，甚至在 2011 年時還發表文章認為中美關係恢復穩定，並透過官員交流重新找到動力，不過他此時已經主張中美關係存在競爭性，似乎不再像過去一樣對中美合作有樂觀的預期。2012 年更是宣稱競爭及緊繃將是中美關係的常態，僅有透過對話和相互依賴才能避免競爭轉向衝突。

在 2013 年沈大偉根據長期觀察中國外交後所撰寫的專書 *China Goes Global* 裡，沈大偉更是明確批評近年來中美各種層面交流的成效不彰，並提醒中美需要平衡其競爭與合作關係。看起來 2010 年中國外交政策的改變並非對沈大偉的中美關係研究毫無影響，只是他仍在觀察中國的新變化，到了 2013 年這本專書出版時，沈大偉才明確表達對於中美關係惡化的擔憂。雖然沈大偉並未在如之前一樣樂觀看好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但也並未如同 2000 年以前悲觀地認為中美關係必然衝突不斷。

綜上所述，筆者將沈大偉的中美關係研究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在 2000 年以前，此時期沈大偉主張衝突循環論，認為中美關係必將衝突不斷，而這歸因於雙方對彼此的認知錯誤。

第二個時期在 2001 年到 2009 年，具體而言是在 2002 年開始，此時沈大偉主張謹慎穩定論和亞洲秩序變動論，亦即中美兩國只要謹慎管理雙邊關係，穩定關係是有可能持續的，而亞洲的新局勢也可能建立在中美合作的基礎上。

第三個時期是 2010 年至今，此時期他提出「競爭性共存關係」來作為中美競爭持續增加的對應方式。這個主張並非沈大偉在 2011 年才第一次提到，筆者在第三節即有說明他在 1999 年的文章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就曾提出此建議，但是進入 21 世紀後就很少再提起，或許因為中美關係

從 2001 年開始進入穩定期，讓他認為中美關係不需要再透過共生關係來緩衝競爭。重提該主張不只表示沈大偉對於中美的完全合作已沒有期待，也代表他對中美關係亦不再如之前樂觀。但筆者以為這並不表示沈大偉再次主張衝突循環論，而僅是他意識到中美關係中的競爭本質無可避免，或者因應中美關係倒退而做的應變。基於他仍認為是有可能透過相互依存或其他機制來緩衝雙方進一步衝突的可能，筆者認為這仍是有條件的樂觀。

如果將這三個時期稱為悲觀、樂觀及有條件的樂觀，沈大偉對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的觀察是否亦有一樣的變化？中歐關係變化較少，在沈大偉的觀察中，中、歐關係雖然存在問題，例如貿易逆差或武器禁運，但整體而言中、歐關係是持續穩定成長的。但 2013 年，亦即沈大偉的中美關係研究進入有條件樂觀時期，他也在 *China Goes Global* 指出中、歐關係開始衰退。

而相對於 2002 年時沈大偉對中俄關係改善的積極肯定，他亦同樣自 2009 年開始改變其觀點。雖然整體而言沈大偉並不認為中俄關係已然惡化，但他卻主張中俄關係中存有潛在的問題，包括經貿議題及中美合作的可能都影響著中俄關係的變化。對於中國與拉丁美洲關係，沈大偉在 2008 年時認為雖然中國在拉美的影響力日漸增大，但所帶來的一些傾銷問題也讓部分拉美國家感到不滿，2013 年他更進一步主張中國在拉美國家的形象日漸下降。

總體而言，檢視沈大偉在中國的對外關係研究，大致符合筆者使用三階段變化的趨勢。三個階段之中，第三階段仍在發展當中，目前看來沈大偉對中國對外關係的看法是逐漸消極的，其觀點是否有可能在此階段反轉，成為主張中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的藍隊成員，筆者認為是可以觀察的。同時，這個三階段變化也反映在沈大偉的中國內部治理研究上，這將在第三章有詳細說明。

最後，本章第三節關於中國戰略安全觀的部分，筆者認為沈大偉的研究發現有其重要性，他認為儘管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已比過去穩定許多，但中國仍常常認為自身處於威脅之中，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威脅，因而他在 1999 年的文章稱之為

「矛盾的安全觀」。中國感受到的來自美國的威脅並非完全是自我想像，但仍可看出中國的戰略觀非常缺乏安全感。

第參章 沈大偉的觀點-中國內部治理

第貳章已經討論沈大偉關於中國對外關係的觀點，接下來本章將討論沈大偉在中國內部治理方面的看法。在本章將探討沈大偉關於中國內部治理的三個部分，分別是中國黨政、中國軍政還有中國經濟。其中中國黨政的章節，將致力於討論沈大偉對中國共產黨的制度、政策、人事等各方面的研究與評論。中國軍政的部分與前一章的安全戰略觀不同，是具體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體制、軍備還有軍文關係。最後中國的經濟是全球都相當關注的問題，因此本章也會加以討論。本文會沿用第貳章所歸納的沈大偉的中國對外關係研究三個時期，藉以討論在中國內部治理的部分，沈大偉的觀點是否也有相同的變化趨勢。

第一節 中國黨政

討論中國的政治自然脫離不了中國共產黨，就如同沈大偉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的說法。

「如果有什麼因素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和所有與之交往的國家，那麼最重要的因素莫過於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的性質了。1949年以來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⁷¹

因此沈大偉長期關注中國共產黨的各種發展，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更是完整的呈現他對中國共產黨體制及統治能力的詳細觀察與觀點。他在該書中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能力表現出信心，並駁斥中國崩潰論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是在2008年出版⁷²，也就是沈大偉中國對外關係的樂觀期。但進入有條件樂觀期後，他對中共的統治能力就不再如同2008年時

⁷¹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p.1

⁷² 原文是2008年出版，中文翻譯本是在2012年出版。

樂觀，尤其 2015 年他在紐約時報一篇評論中認為中共統治正在進入最後階段。⁷³ 這樣的變化也引起中國學者及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們的討論。在本節將重新檢閱沈大偉過往對中國共產黨的各種研究與評論，並尋求兩個目標，首先驗證沈大偉對中國黨政研究是否也符合三個時期的變化，第二則是嘗試找出他的觀點發生轉變的原因。

在 2002 年中共十六大開始前，沈大偉在紐約時報對中共第四代領導集團即將接掌的中國政局情勢發表了他的觀察。在該篇文章裡，沈大偉認為新的領導集團將面對許多的制度問題。引用他的原話：

「他們將繼承一個日漸成為空殼的政黨機構，故作規則而非施加權威。黨今天面臨身分與合法性的雙重危機。」⁷⁴

沈大偉認為中共面臨的問題包括，各階層對黨的疏離、黨強制手段減少和市場經濟成長而增加的對黨學說的挑戰、腐敗問題、農民工問題、國有企業轉型造成的失業問題以及黨缺乏針對民族未來的理念或遠景⁷⁵

沈大偉認為這些問題顯示中國共產黨無法跟上社會需求，因而削弱了黨的合法性，若無法回應這些需求，中共維持統治的能力將逐漸減弱，而他建議共產黨如果要不透過武力但仍維持政權，就必須與人民和民間組織分享權力。⁷⁶

上述觀點顯示沈大偉在 2002 年也就是江澤民時代末期，胡錦濤剛接任中共總書記時，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能力並不是非常樂觀。當胡錦濤正式接任國家主席後數年，沈大偉觀察到「民主浪潮」正席捲中國。2007 年 7 月，也就是在中共十七大舉辦前，沈大偉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讓上千的

⁷³ David Shambaugh. 2015.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March 6.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June 12, 2015).

⁷⁴ David Shambaugh. 2002. "Will the Party Lose China?." November 7.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2/11/07china-shambaugh> (June 15, 2015).

⁷⁵ David Shambaugh. 2002. "Will the Party Lose China?." November 7.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2/11/07china-shambaugh> (June 15, 2015).

⁷⁶ David Shambaugh. 2002. "Will the Party Lose China?." November 7.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2/11/07china-shambaugh> (June 15, 2015).

民主國家綻放」(China: Let a Thousand Democracies Bloom)的評論，針對黨組織不斷提起關於「民主」的討論，沈大偉發表了他的分析與看法。

沈大偉指出，胡錦濤在其任內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或「中國特色的民主」前提下的「黨內民主」、「民主選舉」還有黨外的「協商民主」。他進一步解釋，黨內民主的推動讓黨的幹部能討論與審議政策，而非單是執行上層指示。民主選舉則增加 15%到 30%的候選人到全國及省的黨代表大會候選人名單上，以及村委的多人競選。再來是協商民主，共有三種機制，首先是讓其他黨員和公眾在各級黨幹部任用前發表對候選人的評論，其次為地方工程制訂前聽取當地意見，以及加強公眾對地方預算的監督，最後為多黨合作，包括中共領導人與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黨派」的互動，還有非共黨成員出任國務院職務。儘管沈大偉認為更進一步的民主措施不可期待，但他仍對中共推動上述措施表示肯定。⁷⁷

沈大偉在 2002 年的評論指出中共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與人民和民間組織分享權力而非透過武力維持。胡錦濤截至 2007 年所推動「中國特色的民主」及「社會主義民主」或許並未完全符合沈大偉的建議，可以確定中共改革的方向是符合他的預期的，因為沈大偉發表的文章不再認為中共面臨失去政權的危機，不只如此，他在 2008 年出版《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更全面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機構以及改革藉此探討中共是否能繼續維持政權。

沈大偉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這本書裡，從一開始就特別的強調該書僅討論中國共產黨自身建制的發展對其統治能力的影響。

「本書關注的是作為一種建制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政治體制（後者必然包括國務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級和省級以下的政府和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其他非黨組織機構）。這是讀者從一開始就應該記住的重要區分，要不然，讀者就會奇怪，為什麼沒有

⁷⁷ David Shambaugh. 2007. "China: Let a Thousand Democracies Bloom." July 6.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7/07/06china-shambaugh> (June 10, 2015).

把一系列的因素——少數民族、經濟、台灣問題和國際關係——視為影響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因素。」⁷⁸

有別於一般討論中共存續可能時，往往會論及中國社會或國際問題，沈大偉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沒有環境（國際或國內）因素影響下，作為一個組織機構是否能夠持續維持其存在。可見沈大偉對於中國共產黨組織機構相關研究注重之程度。

沈大偉在書中的主要論點是中國共產黨正處於收縮與調適同時並存的狀態，對此本文認為有必要特別引用他對該狀態的描述。

「中國共產黨已經表現出列寧主義政黨收縮和衰弱的典型症狀，但也正在證明自己在許多關鍵領域有能力作出重要的調適和改革。從長遠來看，這種調適究竟能不能阻止和扭轉衰退的趨勢並挽救它的政權呢？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也是中國觀察家們激烈爭論的問題。」⁷⁹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段文字中的兩個重點，首先，中國共產黨是處於衰退狀態的，再來則是儘管中國共產黨正在進行調適還有改革，能否阻止其衰退，沈大偉認為仍是需要再觀察的。為什麼要特別說明這點？如前所述，沈大偉在 2015 年時所發表關於中國共產黨統治正進入最後階段的評論，引起了中國還有其他中國問題專家們的激烈討論。因為長期以來沈大偉被劃歸紅隊陣營，卻突然發表了似乎與過去理論大相逕庭的觀點。關於這個議題，沈大偉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就對此有所解釋。其實他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就已主張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進入正在進入衰退的列寧式政黨，而且這個趨勢不可避免。雖然他在該書仍傾向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存續較樂觀的看法，不過他是按照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措施作出這樣的結論，因此對沈大偉而言，中共的統治能力的收縮是確定的，重要的是所採取的改革措施究竟是否能延緩甚至阻止這樣的衰退，而截至 2008

⁷⁸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1

⁷⁹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6-7

年他認同中共所採取的調適政策，而 2009 年以後中共的轉變讓他感到不樂觀。⁸⁰關於這段專訪以及他整個研究觀點上的變化，稍後將會作一個進一步的整理。從這個角度來看，沈大偉在 2015 年認定中共統治衰退的評論就顯得沒那麼突兀，因為他對中共維持政權能力衰退的論點並未改變，而是中共採取的改革方向轉向「錯誤」的方向。從前文引用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內容來看，也確實符合沈大偉的說法，之所以中國各界會感到震驚，恐怕是對於沈大偉在該書論點的片面理解造成的結果。

現在回頭討論《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這本書裡沈大偉的觀點。前文提及沈大偉在該書的主要論點是中共正處於收縮與調適並進的狀態，而他認為中共的調適措施很多是吸取那些冷戰結束時崩潰的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因此沈大偉在書中羅列了西方還有中共各自對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因素的分析、中共從非共國家吸收的經驗還有西方對中共政權的論述和中共自身的改革。

沈大偉在該書第二章列出關於西方對共產主義國家垮台原因的探討包括這些國家經濟上出現停滯，部分進行市場改革的國家讓地方政府以掠奪方式介入地方私營經濟，破壞依附網絡，從而削弱原先黨和國家對民眾的控制。政治上則出現共產黨機構的嚴重衰退，意識形態的說服力、監控公民能力、內部紀律還有公民順從度都降低，沈大偉尤其指出公民順從度對共產國家的穩定相當重要，而且當共產國家出現新的民間團體，戈巴契夫卻沒有支持當局施以鎮壓，這也是造成東德崩潰的原因之一。社會層面則是半自治公民組織還有非官方工會的出現，還有公民社會的興起，再加上原本由政黨或國家向公民分配資源的組織化依附程度降低，這些讓黨的權力下降。文化方面，民族主義影響了蘇聯為主的共產國家，另外意識形態降低造成公眾的疏離，還有道德敗壞亦是政權垮台的原因。共產黨的強制力部分，當共產國家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時，反抗活動變少，其強制力相較初期會減弱，變得相對溫和，軍隊逐漸專業化也降低他們出面拯救共產黨的意願。

⁸⁰ 儲百亮，2015，〈沈大偉：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17/c17shambaugh/>，檢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國際環境的因素主要關於蘇聯的過度擴張，卻缺乏相應的經濟規模使其經濟惡化進而影響上述社會政治層面問題的惡化。沈大偉在該章最後認為上述原因交互影響導致蘇聯及東歐共產的瓦解。⁸¹

介紹完西方對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垮台的原因後，接下來暫時跳過第三章西方對共產國家垮台原因的分析，先說明第四章的內容。在第四章，沈大偉列出了中國共產黨為了從共產主義國家崩潰的過程找出可供學習的經驗，所進行的一系列分析與研究，正如他在第四章開頭的說明。

「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為了自我『重造』、拯救和再合法化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要想理解這些改革，首先要理解中國共產黨對下列事件的批判：(1) 1989 年春的『天安門』事件；(2) 1989 年-1991 年東歐和蘇聯的事件；(3)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和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4) 亞洲、中東、歐洲和拉美各類非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⁸²

關於中共從非共產國家吸取的經驗，沈大偉放到第五章討論。那麼中國共產黨從這些共產國家的垮台吸取了那些經驗？沈大偉在文中透過幾位學者的研究來說明，本文將之總結為幾個主要內容，首先是意識形態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還有加強宣傳，當然也要讓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黨內的部分，他們都主張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發揚黨內民主、加強改善黨的領導、完善監督機制還有打擊腐敗；經濟加速發展則被認為是重要的一環，無論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政治改革或民族問題的解決，都必須先要有健全的經濟；謹慎處理民族問題，防止分裂主義的產生；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策略。⁸³

上述是沈大偉所找出關於「一般經驗教訓」的研究主要內容，沈大偉另外還提到中國學者對於共產黨應吸取的「具體經驗教訓」的研究。這些研究得到經驗包

⁸¹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3-34

⁸²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62

⁸³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10-116

括，黃葦町等人提出遏制黨內腐敗的蔓延，避免因為腐敗削弱黨的威信及領導力，甚至造成社會不平等、犯罪率升高還有行政效率的低下。⁸⁴賀秋剛則主張應建立關於地方各級幹部的個人財產申報及公示制度，另外他還指出中國的「關係」文化是造成人事上腐敗的原因，因而需要建立用人機制。⁸⁵沈大偉對於賀秋剛關於中國共產黨用人腐敗的批評與建立用人機制的主張表示認同，他並提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樣建議建立以工作績效為準的選拔制度，許多中國學者們也認為有必要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其他還有建立集體領導及協商機制等建議。另外沈大偉還提到兩個中國共產黨從共產國家垮台所吸取經驗，一個是新聞媒體控制，另一個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不可行。⁸⁶

從沈大偉所列出的西方與中共對共產主義國家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出在一般經驗教訓的部分，中共與西方的分析並無太大差別，但是中國較西方的分析家多了具體經驗教訓的討論以及可能的改革措施，使中國學者們的分析更加詳細，沈大偉列出兩者加以比較，突顯中共為此進行的努力，這同時能強調沈大偉在結論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傾向樂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在調適方面的努力，而非認為中共收縮的情況不存在或不嚴重。

前述內容是沈大偉在書中分別論述中共及西方各自對共產主義國家垮台原因的觀點。第三章是沈大偉所整理的西方對中國共產黨的論述，當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瓦解後，中國問題專家們開始討論中國是否會走上同樣垮台的結局。沈大偉將這些學者的論述整理成兩類，分別是悲觀主義者還有樂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如 Roderick MacFarquhar、謝淑麗還有鮑瑞嘉（Richard Baum）等人都指出，相對於經濟的發展，中國政治體制是脆弱的。鮑瑞嘉另外提到中共還面臨馬克思主義不再具有說服力後，無法描繪新的中國未來前景的困境。他們都認為中共終將垮

⁸⁴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117

⁸⁵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17-118

⁸⁶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18-119

台。除了他們之外，章家敦、Merle Goldman、Bruce Gilley、Will Hutton 還有鄭永年等人，則在主張中共政權將會垮台之外，還認為中國最終將進行民主化。沈大偉強調這些人之中，鄭永年有別於其他人，他認為中國邁向民主化不太可能依靠外力或上層的崩潰，而可能是來自中國內部的漸進政治自由化或是各種不穩定造成下層革命。另外，有一派學者不主張中共的崩潰即將發生，不過卻指出中國面臨嚴重的治理問題，沈大偉以裴敏欣作為該主張的代表。裴敏欣認為中共將進入長期的停滯，國家將不再提供經濟與社會的成長，相反的將掠奪這個社會，他並主張如果缺乏民主化，任何來自政黨的改革及調是不會成功，因而他認為由下而上的改革比較可能發生。除了他之外，另一位香港學者吳弘達也有類似觀點。⁸⁷

上述是沈大偉在第三章介紹的悲觀主義學者，而相對於這些悲觀主義者可能來自各個不同領域，樂觀主義者多半來自美國各大學的教職。沈大偉首先介紹的就是他自己編輯的《中國不穩定嗎？》（*Is China Unstable?*）⁸⁸一書。沈大偉將該論文集作者們的論點整理出來，包括主張中國將持續處於「穩定的不安寧」，也就是中國將有一些社會的騷亂，但這些騷亂基本是針對具體對象與事由的不滿，更重要的是這些騷亂之間沒有關係，因而並未形成全國性的動亂。除此之外，這些作者們也不認為蘇聯及東歐共產跨台的因素存在於現在的中國。沈大偉在書中還說明其他觀察家們指出，中國的經濟依循的是東亞發展中國家模式而非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模式，政治上他則提到朱雲漢認為中國共產黨與 70 年代末的國民黨具有政治趨同性，他還引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合作的評估，指出中國的制度仍然強大。另外，沈大偉提到，包含他自己還有黎安友、Alice Miller 還有黃靖都同意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觀點，中國列寧主義制度正在進行「再制度化」，傅士卓提出的例證是中共在 16 大提出建設「制度化、規範化和秩序化的體制」政治計畫。傅士卓指出，中共的改革在回應地方

⁸⁷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38-48

⁸⁸ David Shambaugh. 2000. *Is China Unstable?: Assessing the Factors*.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需求的同時也避免黨的執政地位受到威脅，他對於中共能否長期迴避執政合法性問題存疑，但認為改革在中期內是可行的。其他樂觀主義還包括 Bruce Dickson 還有 Kelles. S. Tsai 都認為中共在江澤民時代進行的政治改革，將企業家引入黨的領導階層是一種新的適應措施，這讓這些企業家及中產階級不會要求進一步政治變革。Melanie Manion 則觀察到中共在領導階層的和平且系統化交替，這在其他共產國家是未見的。Alice Miller 還有黎安友也都同意中國共產黨已逐漸進入制度化，黎安友特別提到中共在權力交接、幹部管理改進、官僚機構差別化、大眾參與還有呼籲管道拓寬等若干政治上的制度化，他並稱之為「有彈性的威權主義」。關於黎安友的論點，沈大偉認為 Dickson 也有類似的觀察。對於黎安友主張中國共產黨的改革能應對受到的挑戰，沈大偉認同他的觀點。⁸⁹

沈大偉在第三章的結尾再度闡明了他的觀點，悲觀主義者往往聚焦於中共控制力的收縮，並論斷中共將無可避免走向與蘇聯相同的命運，樂觀主義者則認為中共能夠依靠改革面對這些挑戰的，沈大偉卻認為中共處於收縮與調適並行的狀態，共產黨面臨的是一個長期的衰退，並不會如悲觀主義者想像的那樣驟然崩潰，這是能透過調適來延緩甚至逆轉，而中國所進行的改革雖然能延緩收縮，但都只是策略性的措施。⁹⁰

從上述第三章的內容已經可以看到西方學者裡的悲觀主義者還有樂觀主義者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能力，沈大偉則表達出有別於兩者的觀點，他既主張中共不會驟然崩潰，但同時認為中共進行的只是策略的改革，後者正可呼應我們在前文所提到他 2007 年的評論，對中國進一步的民主措施不可期待，因為既然中共所有的改革是策略性的，自然僅是應對社會需求而加以調整，要觸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儘管沈大偉對雙方的主張都未完全同意，從文中他對中共所採取措施的延緩效果給予肯定態度，我們仍可推論沈大偉是較傾向樂

⁸⁹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49-58

⁹⁰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58-61

觀主義。那麼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該書第六、七章的內容，相較於前面介紹的幾章是文獻整理居多，第六、七章是沈大偉自己對中國共產黨調適過程的觀察，詳細說明這些內容有助於我們理解沈大偉在本書出版時期，也就是 2008 年左右對中共的整體評價。

第六章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改革措施。在該書前面的幾章有提到，無論是西方或中國共產黨對於蘇聯垮台原因的分析，都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意識形態上，亦即馬克思主義的僵化以及教條化。悲觀主義者在評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時，也批評中國共產黨同樣面臨在馬克思主義失去吸引力後，無法提出有說服力的中國未來前景，進而出現合法性危機。但是沈大偉在本章的開頭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卻推翻了西方認為現今的中國只依靠經濟成長與民族主義來維持其執政的錯誤觀念。沈大偉在書中說明，中國從蘇聯垮台得到的教訓之一就是，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共產黨的根本，一旦放棄，就等同放棄中國共產黨存在的意義。故此中國共產黨採取修正與調整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使之符合非意識形態性的政策，從原本根據意識形態制定政策的做法，改為先制定政策回頭從意識形態尋求政策的依據，有必要的話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提出新的思想依據。接著沈大偉開始論述作為向民眾灌輸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以及江澤民與胡錦濤提出的新思想。⁹¹

關於中共的宣傳部門，沈大偉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系統能夠監控各個不同的媒體平台、教育單位甚至是如博物館、展覽館等文化平台，可以說掌控了所有的訊息平台。沈大偉指出，中共宣傳部門雖然具有龐大審查權限，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尤其是信息革命及網路的出現，宣傳部門控制的效果有所削弱，加上全球化、商業化以及人民對政府資訊不再信任等各項因素，都使得國家對媒體的控制力下降。不過沈大偉也在書中提到，總體而言，沈大偉認為中國共產黨宣傳系統雖然比起毛澤東時代收縮許多，但仍能控制大多數中國民眾獲得的資訊，不過他

⁹¹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51-153

同時認為前述技術方面、商業化、政治及消費者偏好等各項因素的互動仍會持續削弱中共對信息及思想的控制能力。沈大偉強調，若中共無法真正的塑造人民的精神與信念，則中共的失敗不遠矣。⁹²

在說明了宣傳部門以後，很自然的要說明這些宣傳部門所需要告訴民眾的是哪些思想與資訊，因此沈大偉在第六章的後半段詳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塑造的「新意識形態」，包括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⁹³，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有「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沈大偉認為江澤民思想的重點在於第一個代表，即「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沈大偉指出，這顯示中國共產黨將成為一個包含商業精英的精英政黨，另外，三個代表思想也放棄了全面的公有制度。沈大偉強調，這和其他後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一樣是現行實際政策的理論化。到了胡錦濤上任以後，沈大偉認為胡錦濤與溫家寶注意到分化加劇以及內陸與沿海城市的貧富差距加大等中國社會問題，因此他將重點轉向三個代表中的「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與之相關的，胡錦濤提出的構想就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沈大偉說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主要有六個重點，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沈大偉稱此構想並非宣傳，而有積極意義，正是應對前述中國的社會問題。除了上述理論，沈大偉還討論了中國特色的民主，他指出，胡溫時期民主已經廣泛被中國共產黨納入辭典，他也列出中國共產黨，包含各理論家及溫家寶所主張關於民主建設的思想，但整體而言沈大偉認為中共所提民主仍首重黨內民主而非人民的民主權利。另外，沈大偉也很重視中共 16 大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並指出該決定納入中國

⁹²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53-160

⁹³ 三個代表分別是 1.要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2.要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3.要始終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多年總結的所有經驗教訓，他認為該文件是一個長期建設與調適黨的執政能力的活動。⁹⁴

在討論完中國共產黨重建運動的意識形態部分，沈大偉在第七章開始討論在組織方面中國共產黨的重組工作，這些工作通常都來自《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所作的決議。首先是保持黨員先進性。從2005年1月左右，中共開始了18個月的整風運動，分三階段對包含中央在內各級黨員進行拷問、批評和自我批判，旨在改善黨風，加強黨員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認識。第二，中國共產黨注意到的腐敗問題，中共加強了黨外協商和監督的機制。儘管如此，沈大偉認為腐敗問題仍是中共體制性痼疾。另外，沈大偉提到中國共產黨在重建地方黨組織方面的努力，包括在新型社團和私營企業建立黨組織、加強對全國各地幹部的訓練、重建農村黨委、整風運動還有提高政策透明度。沈大偉還指出，中共透過將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及民主黨派地位提高增加黨外監督機制。黨內民主的部分，中共嘗試黨委的差額選舉村民選舉、鄉鎮選舉、部分村支部差額競選和部分村長選舉，另外也加強黨內的討論與公眾協商。而對於中國民主的前景，沈大偉指出，中國是否會就此走向民主仍是未知數，因為中共並未允許有組織反對派存在，但他同時認為如果中共對自身合法性及大眾支持有信心，可能願意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一樣施行全國直接選舉。最後，沈大偉提到的中共組織再造的措施是領導集體的更替，從鄧小平開始，就積極增加中共集體領導的活力，而每一代領導集體都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包括出生年代、經歷背景對外國的傾向都不同。對於胡溫體制五年來的表現，沈大偉認為他們如第七章所述的致力於恢復黨組織的活力還有制度化，同時他們穩固了權力，並為第五代領導集團接班奠定了基礎。⁹⁵

⁹⁴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60-182

⁹⁵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83-224

從第六和第七章的內容來看，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還有組織方面的改革措施著實不少，相對於第三章的悲觀主義者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中共以實際行動來證明他們推論的錯誤，無論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匱乏、組織制度上的缺陷或者是最終民主化的可能性，中共都做了各種延緩措施。沈大偉對這些措施的詳細描述令人不難理解他最終在結論時對中共的執政能力持傾向樂觀的態度，有趣的是，對於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沈大偉倒是沒有說不可能，只是他不認為突然的民主化有可能發生，而是中共在自身能控制並保證執政地位的情況下逐步開放直接選舉，這也符合前文提到他在2007年對於中共內部不斷談起「民主」所發表的評論。

最後，在開始討論第八章沈大偉對於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否存續的結論前，要回頭看看中國共產黨從非共國家學習到的經驗。沈大偉是將這些內容放到第五章介紹，可是筆者認為從整本書的脈絡來看，非共國家的經驗雖然也有所貢獻，但對於中共的各項改革而言，共產國家垮台的經驗總結相對是更重要的。所以本文將第五章的內容放到結論之前來介紹。

沈大偉在第五章首先說明的就是中共從顏色革命⁹⁶中學習到的經驗。中共詳細的分析了中亞地區的前蘇聯加盟國所出現的一系列推翻政權的革命。沈大偉指出，中國學者首先就認為這些政權的更替僅是權力的鬥爭。再來，中國學者們同時認為這些顏色革命是美國在中亞地區推動和平演變策略的結果，美國積極的輸出民主及自由的價值，還有提供資金給反政府勢力，並培養親西方勢力。而美國之所以這麼原因包括基於利益與俄羅斯爭奪中亞地區領導權還有向全球輸出民主，藉此鞏固美國的地位。沈大偉指出，顏色革命讓中共重新擔憂並質疑美國仍在推動和平演變。而對於非共國家的觀察，沈大偉指出，中國學者欣賞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高效廉潔的政府，並將其民主視為指導性民主。除了新加坡外，中共還分析馬來民族統一機構長期執政的原因，並歸因於馬來西亞的愛國和道德教育、對政府財政政策的控制和反美主義。中共也研究日本自民黨，雖然自民黨與企業

⁹⁶ 顏色革命是指發生在中亞還有東歐的一系列和平推翻當地專制政權的運動。

和官僚的緊密關係是日本政制的優勢，但中共批判其金錢與黨派政治還有自民黨的精英屬性。國民黨在台灣的失敗同樣是中共研究的對象之一，中共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包括，黑金政治、腐敗、黨派分裂、領導層低效率、本土派的興起、國民黨與大陸間的傳統連繫還有李登輝的陰謀。其他中共也關注還有印度、韓國、菲律賓、泰、敘利亞、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等國。最後，在第五章結尾沈大偉認為中國是一個兼容並蓄的國家，吸取各種經驗教訓，以維持並加強中共執政能力，對於其他國家的優點也都同樣吸收。⁹⁷

沈大偉在第五章整理了中共對非共國家的各種研究，並說明了中共對於任何有助於維持執政地位的經驗都會加以吸收，即使是非共國家的經驗。因此，綜合了前共產國家的失敗經驗、倖存共產國家的優點，中共將之運用在自身的改革上。而到底中共這些改革有沒有功效？中共的執政能否持續下去？沈大偉在該書最後一章做出了他的結論。

在第八章，沈大偉再次強調中國收縮與調適並存的狀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出現許多前共產國家崩潰的因素和現象，但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也正在進行各種不同的政治改革。沈大偉還列出許多西方對於中共未來的預測，像是鮑瑞嘉、迪克森和李成等人。沈大偉則有自己的幾點主張，首先是他不認為西式民主會出現在中國，不過如同新加坡一樣的一黨制內競爭，沈大偉認為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值得一提他認為第五代領導集團（習李）之中的一些人都曾接受過西方教育，較有可能接受類似新加坡的半民主競爭。另外，沈大偉認為鮑瑞嘉提到的協商型列寧主義，即更廣泛的協商，比起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更有可能發生。另外，沈大偉也不認同中共制度會崩潰，在沈大偉的觀察中，中國共產黨確實出現了許多的收縮現象，但是共產黨仍牢牢控制各級政府、各種單位，而且仍然是個強大且具有彈性的組織。對於有推測指出中國可能陷入軍閥割據的分裂狀態，沈大偉認為並不會發生，因為人民解放軍目前朝向一元化發展，且即便其黨軍色彩消退，解放

⁹⁷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126-148

軍也會轉變成保衛國家和民族的軍隊，中國共產黨仍可透過國家機關加以指揮。沈大偉同時反對指稱中國為停滯國家的言論。沈大偉還主張，中國不可能走入法西斯制度或走向毛澤東主義。反駁了這些對於中國共產黨可能未來的預測後，沈大偉認為中國能否繼續執政的問題並不是一個是非題，中共的收縮可能因改革所挽回，但調適措施卻不是必然能逆轉中共的收縮狀態。另外，沈大偉認為調適的結果，可能迫使中共引入更大的政治競爭，但沈大偉斷言中共終將發現政治的多元會符合其長期利益。最後，沈大偉提到發展中國家過渡到新興工業國家時，來自社會的需求與壓力會增加，這時通常有兩種選擇，壓制或開放社會需求的表達，沈大偉指出，中共在胡錦濤時代選擇後者，不過因為戈巴契夫當年開放政治競爭的步伐過快導致失敗，中共不太可能開放真正的競爭，最多僅是給予八大民主黨派活動空間。沈大偉總結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將是漸進的、實驗性質的方式，並吸取各種經驗，成為一個兼容並蓄的混和型政體。⁹⁸

本文花了相當長的篇幅介紹沈大偉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中的各種主張與觀點，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這本書確實是沈大偉所有的著作裡，最完整包含它對中國共產黨的所有觀察，因此要討論沈大偉對中國黨政的看法時，自然必須一一將本書的內容加以整理，才能完整審視其觀察。第二個原因則在前文已提過，沈大偉在2015年時對中共未來執政情勢表達了不樂觀的看法，之所以引起廣泛討論，有很大原因是認為相對於2008年的觀點，他對中國看法出現重大轉折，可是在將整本著作重新回顧後，就可以知道，沈大偉在2008年的觀點，稱不上是真正的樂觀派，又或者說，他並非對中國共產黨樂觀，而是對於胡錦濤等第四代領導集團推動的改革方向贊同。無疑的是，沈大偉肯定中國共產黨從1990年代以來吸取各種經驗教訓後推動的調適措施，對於中國的未來則肯定胡錦濤及第四代領導集團選擇適度開放社會表達需求渠道的方向，但是這些都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上，中國共產黨正在經歷收縮狀態。所以這個收縮狀態能否延緩或逆轉，

⁹⁸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p.225-250

是取決於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如同過去根據教訓，使用適當的措施來應對。所以當中國改變調適方向，而新的措施並無助於逆轉中共的收縮狀態時，沈大偉評論中共進入最終階段是一直符合他對中國共產黨收縮狀態的觀察。不過筆者還是提出一些意見，2008 年的著作裡，沈大偉做出較樂觀的結論是經過對中共各層面的觀察，並比較各種主張和實際數據做出的結論，但是在 2015 年他評論中共進入最終階段時，所引用的依據卻相對薄弱，因此筆者將在後面的內容針對此點討論。

在隔年 2009 年的《時代》雜誌 (*TIME*) 沈大偉寫了一篇名為「中國 60 年：富裕之路」 (*China at 60: The Road to Prosperity*) 的文章，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60 年時，回顧自 1979 年以來，改革開放為中國帶來的轉變，包括經濟的繁榮、社會與過去的重新接軌，例如儒家或佛教價值，其他還有知識分子處境的改善，儘管他們仍受到許多管制。少數民族問題也仍然是中共政權的弱點，另外，犯罪、腐敗、收入差距等問題都仍存在，不過沈大偉肯定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保持穩定的成果。與本節相關的黨政問題，沈大偉再次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化成效，包括黨員的教育還有晉升都精英化，以能力為主要考量。官員的退休機制同樣的制度化了，而非過去只有被清洗或死亡兩種結果。沈大偉還肯定中共以集體領導取代一人獨裁的制度，而政策透明化的部分雖然還不夠，但沈大偉認為至少政策制定已有更多協商。最後，沈大偉重申中國共產黨相對於前蘇聯更加具有彈性且能夠調適。⁹⁹

沈大偉在 2009 年對中共黨政的論點和 2008 年並未有太大差異，基本上仍肯定中共調適的成果。不過這都是在樂觀期的觀察，隨著沈大偉對中共的外交策略進入有條件樂觀期，他對中共黨政的觀點是否有所改變呢？

2011 年，時值中國共產黨創黨 90 年，沈大偉在《國際先驅論壇報》又發表了一篇評論。沈大偉在該文指出，雖然中共的改革仍在進行，但是中共內部的宣傳機器、大型國有企業、軍事聯盟和內衛部隊都已經從改革轉向黨內強硬分子，並

⁹⁹ David Shambaugh. 2009. "China at 60: The Road to Prosperity." September 28.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24366-2,00.html> (April 26, 2015).

顯露出對新疆和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動盪、社會動盪及示威的恐懼。沈大偉認為雖然總理溫家寶領導的改革派仍然主張更開放的政治，不過黨內的意見逐漸兩極化，他並指出，預定接班的第五代領導集團只會增加風險規避還有鎮壓的力度。¹⁰⁰

整體而言，沈大偉在 2011 年這篇文章的評論裡，已經觀察到中國共產黨出現的改變，黨內的強硬分子慢慢取得主導權，中國共產黨不再如 2008 年那般的對自身政權穩固有信心，而採取鎮壓和規避風險的手段來維持政權。沈大偉更斷定習近平等人上任後，這種趨勢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看起來沈大偉對中共維持政權的新方向並未給予正面的評價。

2012 年，沈大偉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中國觀察家對於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的十個問題，包括習接任後，中國會不會重回改革的道路？因為沈大偉觀察到由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一手推動的改革已被停止。習近平和李克強是否可能實現經濟再平衡？習是否能對西藏和新疆制定更加柔和的政策？沈大偉認為中共以武力鎮壓，犧牲太大，但他對習是否有足夠政治力量抵抗鎮壓機器並找出中國政府與少數民族之間穩定抱持疑問。習近平和黨機構的民族主義政權對與領土糾紛還有美國採取極端立場可以嗎？習能管制媒體嗎？習能夠掌握軍隊嗎？習的外交政策是實質多過豪語嗎？習要如何處理因貪腐、重商主義和能源貿易等政策而在非洲、拉美和中東引起的日益不滿？習會否採取更積極的全球治理政策？最後是習會否推進與中國關係？沈大偉要透過這十個問題來分辨習近平是一個改革者或保守的風險規避者。¹⁰¹

上述這十個問題中，關於改革的問題，沈大偉觀察到中國共產黨已經收回了改革的腳步，他期待習近平會是一個改革者。關於少數民族的處理方式，沈大偉會提出習近平是否有足夠政治力量對抗鎮壓機器，這呼應了他在 2011 年的觀察，

¹⁰⁰ David Shambaugh. 2011.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 June 30.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1/06/30-china-communism-shambaugh> (June 25, 2015).

¹⁰¹ David Shambaugh. 2012. "Ten Questions for China's Heir Presumptive." February 10.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2/10-10-questions-shambaugh> (June 25, 2015).

中共內部的強硬立場已經逐漸出頭，所以沈大偉認為即便習近平是個改革者，能否對抗強硬分子的勢力還是個疑問。至於媒體的管制，則是一個新的議題，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裡，沈大偉指出，雖然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系統正在收縮，但他認為該系統仍然能有效管制大部分的信息。可是，2012年沈大偉會提及這個問題，可以推測沈大偉對中國共產黨宣傳系統的效力已不如當年樂觀。中國人民解放軍則逐漸具有自主性，沈大偉提到這個問題，顯示黨與軍隊的緊密關係已經鬆動，則軍隊是否會維護中國共產黨又是另一問題。整體而言，沈大偉所問的這些問題，實則顯示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目前遇到的問題和挑戰，也顯示他對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政策方向有所質疑。

既然2012年的時候，沈大偉對第四代領導集團已經失去信心，那他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所提過那些受過西式教育，有可能接受半民主競爭的第五代領導集團，沈大偉現在又是如何看待呢？沈大偉在同年發表了對習近平及第五代領導集團的評論，他認為不要去期待第五代領導集團能夠進行改革。首先第五代領導集團缺乏凝聚力，而改革派會持續受到黨內保守派的檢視。另外，近年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政策和投入資金，但卻未解決真正的挑戰，例如社會不平等、環境破壞、教育系統僵化以及缺乏透明度和問責機制等國內問題，還有國際上的軟實力疲乏。沈大偉並指出，改革削弱了國有企業、內部安全機構、軍方及黨內保守派，因而這四個利益集團聯合脅持了較軟弱的胡錦濤，使得改革停滯。沈大偉認為即便習近平是一個改革者，面對這四個利益集團，他是否有能力對抗尚無法確定，何況他還不一定是一個改革者。沈大偉斷定持續的專制以及與外國衝突將是第五代領導集團時的發展。¹⁰²

從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看到沈大偉在此時就對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出現悲觀的看法，除了保守勢力對改革的阻礙之外，中共也必須面對國內的問題以及如何處理國際關係等挑戰，而沈大偉認為第五代領導集團很難去推動改革，即便他們有

¹⁰² David Shambaugh. 2012. "Don't Expect Reform from China's New Leaders." November 15.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2/10-10-questions-shambaugh> (June 7, 2015).

這個意願。在沈大偉的觀察裡，中共的改革正陷入停滯，並走向專制的道路。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顯然沈大偉期待的是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政府，最終至少成為類似新加坡的半民主政體，雖然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延緩甚至逆轉中共的收縮狀態，或許，沈大偉的思考方式仍和大多數美國學者一樣，從西方的價值觀來評斷中國未來應有的樣貌。

到了2013年，沈大偉再度發表了一篇名為 *Assessing China's New Leadership One Year On* 的論文，討論第五代領導集團第一年的表現。沈大偉在該文總結指出，中國已經出現了歷史上衰敗王朝的若干現象，包括精英派系主義和勾心鬥角、腐敗和自私的官員、貧富不均、民眾感到不安與挫折、沒有充分的社會福利、社會和種族騷亂日益廣泛、對中央的尊敬削弱和上升的地方主義、缺乏真正的法治還有國家反覆無常、徵收重稅但卻進入官員手中。除了這些「衰敗現象」之外，沈大偉還認為中國的富商和精英都隨時做好離開中國的準備。另外，黨的宣傳機構還有軍隊等維護合法性的工具一旦放鬆管制就可能形成問題，這點還沒發生在中國，不過沈大偉指出，黨的管制結束，則中共就開始進入終局。¹⁰³

同年12月，沈大偉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發表了對於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做決定的討論。沈大偉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同時展示了野心與謹慎，雖然改革派提出了令人振奮的說辭，但內容模糊又了無新意，沈大偉還指出，這些文件顯示中共缺乏決心且優柔寡斷。儘管如此，沈大偉仍然部份肯定這次會議的成果。首先，這次會議做的決定，是中共首次企圖全面解決中國所出現的各種複雜問題。第二，坦承和客觀面對黨與國家的問題，沈大偉認為這是有效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沈大偉指出，中國國內面臨的問題包括，發展的不平衡、城鄉差距加大、產業結構不合理、醫療、教育還有貪腐等各種問題，改革派這次宣稱要解決這些問題，確實令人振奮。不過沈大偉認為中共卻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儘管仍有一些具體作為，例如一胎化政策鬆動還有取消

¹⁰³ David Shambaugh. 2013. "Assessing China's New Leadership One Year On." *Cross-Strait Developments in 2013: New Trends &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勞改制度等，其他仍多半是模糊的口號而已。沈大偉還指出，在黨國的改革部份，沒有證據顯示中共會釋放全力，他認為比較有可能的情況是對網路異議、非政府組織和政治活動的打擊會越演越烈。關於國有企業的部份，沈大偉認為中國仍然傾向韓國的財閥模式，並迴避了其跨國公司缺乏競爭力的問題。該決定還包括戶口系統改革、經濟持續創新、金融改革、穩定管理社會不平等、環境保護和軍事改革等改革措施。總體而言，沈大偉仍肯定這個決定所包含的一些改革措施。¹⁰⁴

沈大偉在 2013 年的兩篇文章裡都指出中國共產黨正在面臨許多的問題，特別是內部的問題，其中貧富不均、發展不均還有黨宣傳系統的問題都是他在 2008 年就已指出，不過當時他對於中共改革方向較信心，認為中共有機會逆轉這種收縮狀態。可是在 *Assessing China's New Leadership One Year On* 一文，他再次提醒中共正出現衰敗的徵兆，顯然他對於習近平上任後中共的未來方向是否能夠維持中共政權並不那麼確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則看起來讓沈大偉對中國共產黨改革懷抱了一點期待，不過他仍批判該決定的空話要比實質措施要多。

進入 2014 年後，沈大偉發表了一篇名為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 的論文，形容中國像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在社會、經濟、政治還有環境等各領域都處於改變的重要時刻。沈大偉在文中列出了中共所面臨的 10 個改革的挑戰。首先是經濟的挑戰，沈大偉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可能會受到利益集團的阻礙而停滯，但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仍是有希望的。第二個則是創新改革，沈大偉認為中國如果不繼續改革創造性，就有可能陷入今天日本、南韓還有台灣所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沈大偉指出，中國以為透過投資足以促進創造性，但忽略應從教育體系開始改革並改變思維，所以沈大偉斷定除非中共推動高等教育和媒體的開放，否則中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個是社會不平等例如貧富差距加大還有沿海與內陸省份發展的差距。沈大偉認為中共面臨的第四個挑戰

¹⁰⁴ David Shambaugh. 2013. "Breaking Down China's Reform Plan." December 2.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3/12/02-breaking-down-china-reform-plan-shambaugh> (June 7, 2015).

是打擊貪腐，沈大偉指出，腐敗已經是整個中國都面臨的嚴重問題，習近平上任後已展開史無前例的打擊行動，但沈大偉認為從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前例來看，習的打貪會否成功尚不可知。第五個挑戰是政治和法律改革，沈大偉認為打擊腐敗、提高政策透明度才能阻止可能發生的來自社會的動亂，但他指出，中共反其道而行，加強對各層面政治活動的打壓。對於中共在這方面的改革，沈大偉預期中共將持續的倒退並進行打壓。第六個挑戰是城市化的推動。第七個挑戰是環境問題。第八個挑戰是打造中國文化產業和軟實力。第九個挑戰是提高軍隊戰鬥力，沈大偉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硬體設備上已經有了許多進步，不過真正要成為一流軍隊還是需要根本性的組織變革。第十個挑戰是外交關係的管理，沈大偉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日漸緊張。¹⁰⁵

這十個挑戰包含了到 2014 年為止，沈大偉對中國整體局勢的觀察。從這些問題中可以看到，在他的觀察中，中國正處於一個改革能否繼續推動的重要時刻，因為當前中國內部有太多問題，如果無法加以解決，則改革勢必難以推動。要注意的是，沈大偉一再強調解決貪腐、加強政策透明度以及回應社會需求等措施才是保障中國共產黨繼續執政的方式，可是他近來的文章都表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只是不斷壓制政治與社會活動，藉此避免可能的風險。因此，沈大偉對於中共近年在政治改革上的表現並不是相當滿意，而如果詳細閱讀《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以後就會知道，對他而言，如果中共的改革方向不正確，那就會很難延緩或阻止中國共產黨的收縮狀態。那麼接下來就要討論沈大偉近年再度引起「中國崩潰論」熱議的文章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個紅隊學者引起中國崩潰論的討論看起來相當反常，而沈大偉在後來的採訪中則表示，該標題是《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所選，並非他的原意，他並非章家敦之類的中國崩潰論者。¹⁰⁶不過這是否表示沈大偉仍然對中國發展相當樂觀呢？

¹⁰⁵ David Shambaugh. 2014.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1-18.

¹⁰⁶ 餘東暉，2015，〈沈大偉答中評：我跟章家敦不是一夥人〉，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5年3月6日，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學者們將之視為中國崩潰的論述，並紛紛撰文反駁，包括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澳門大學教授陳定定還有大陸學者蕭功秦等人都紛紛反駁沈大偉的言論。¹⁰⁷那麼沈大偉真的認為中國會崩潰嗎？沈大偉在2008年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還反駁中國崩潰論者的主張，並認為中國不太可能崩潰，如今卻做出相反推論，是否代表他的學術思想出現轉折？筆者認為從整理這幾年的文章後可以發現，整體而言改變的不是沈大偉的理論，而是中國政策的方向。沈大偉在該文指出，中共政權出現五個跡象顯示了共產黨的系統性脆弱。第一，富人們都隨時準備好離開中國，並有計畫的送孩子出國留學，也有許多女性在美國生產，讓小孩取得美國籍。第二，習近平上任後就嚴厲鎮壓新疆及西藏，箝制任何信息並打壓宣揚西方「普世價值」的組織及活動。沈大偉認為這傳達了黨領導的不安。第三，沈大偉說明他參加中國一個探討習近平「中國夢」的會議的經驗，他認為與會者肢體僵硬、表情麻木，對會議感到厭倦。另外，習近平的宣傳小冊子也乏人問津，儘管那是免費贈送的，他認為這表示了黨對人民的控制降低。第四，沈大偉認為習近平所推動的反貪腐活動遠比其前任還要持久，但並未真正解決根植於一黨制、庇護網絡、缺乏透明度、缺乏法治還有國家控制媒體等問題的腐敗。另外，由於反貪腐的選擇性傾向，沈大偉認為打貪淪為政治工具，習意圖藉此驅逐江澤民的人馬。第五，中國的經濟陷入一系列陷阱，而那些利益集團，如國有企業和黨幹部都極力阻止改革的實施。沈大偉認為除非放鬆政治管制，否則中國永遠不會出現創新社會和知識經濟，不過習近平卻選擇了壓制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3695874&sw=%E6%B2%88%E5%A4%A7E4%BC%9F>，檢索日期：2015年6月15日。

¹⁰⁷ 參照方冰，2015，〈陸克文批沈大偉“中共崩潰論”胡說八道〉，美國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rudd-refutes-20150504/2749378.html>，檢索日期：2015年7月1日。Dingding Chen. 2015. “Sorry, America: China Is NOT Going to Collapse.” March 10.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orry-america-china-not-going-collapse-12389> (July 1, 2015).以及蕭功秦，2015，〈蕭功秦：如何看待沈大偉的“中國崩潰論”？〉，觀察者網站：

http://www.guancha.cn/XiaoGongQin/2015_03_26_313732.shtml，檢索日期：2015年7月1日。

而非開放。沈大偉並稱讚江澤民與胡錦濤時期對變革的管理，擴大協商等措施，並藉此指出鎮壓並非習近平唯一的出路。在最後，沈大偉認為習近平不太可能放鬆管制，因為在中共看來，放鬆管制是自取滅亡。沈大偉指出，雖然很難說中共的崩潰即將到來，但是我們正在目睹它的最後階段。¹⁰⁸

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討論中共政權是否有可能崩潰，因此對於沈大偉的論據嚴謹與否，不予討論。不過對於這篇文章引起的爭議，確有必要說明。沈大偉之後接受《紐約時報》的專訪，他為他的文章做了更詳細的解釋。

沈大偉提到《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這本書除了研究中共的調適政策外，也強調中共的收縮。

「這本書側重在中共當時進行的『調適』上。但別忘了書名中的另一個詞：『收縮』。這個詞很重要，我當時說，一黨列寧主義國家和其他獨裁國家都會在後期出現收縮狀態，這是正常的、自然的，一向如此，現在我也仍然這樣認為。而問題是：列寧主義政黨要採取怎樣的措施來應對收縮，延緩不可避免的衰落？基本而言，他們可以採取被動和防禦性的做法，進行壓迫式的統治，也可以採取主動和動態的方式執政，以開放的姿態，嘗試引導和管理變革。從大約 2000 年到 2008 年，在曾慶紅主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後一種方式。但我認為，在 2009 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¹⁰⁹

這也是本文在回顧《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再強調要注意到的地方，沈大偉強調能夠阻止收縮的是中共的調適措施，他從未主張中國就算沒有那些調適措施也能夠安然維持統治。不過，沈大偉在這篇訪談裡面還提出了比他的文章更加悲觀的想法。

「中共不是沒有選擇。打壓可能是它的『預設模式』，但這不是唯一選擇。它還可以採取開放姿態，主動管控政治變革……他們要麼通過壓制來自取滅亡，要麼採取開放姿

¹⁰⁸ David Shambaugh. 2015.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March 6.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June 12, 2015).

¹⁰⁹ 儲百亮, 2015, 〈沈大偉：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 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17/c17shambaugh/>, 檢索日期：2015 年 6 月 10 日。

態，但這樣也可能導致自己的覆滅……即使他們放鬆了壓制，也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中共。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大出血，到了他們可能無法扭轉或阻止的地步。……導致公眾對這個政權不滿的其他因素還包括，社會高度不平等、公共物品供給不足、污染無處不在，以及工資隨著經濟增長放緩而停滯不前。所以我認為中國共產黨進入了『最後階段』。但是和《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吸引眼球的標題相比，我對於中共收縮、衰落的這個漫長過程的看法，要更加細膩微妙一些。」¹¹⁰

換句話說，沈大偉認為即便改革或放鬆管制也不一定能保證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其他經濟、社會因素也會造成中共的覆亡。換句話說，中共的滅亡似乎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但沈大偉最後強調，他所謂的「最後階段」和標題的寫的「崩潰」相比，是更細膩的概念。其間，崩潰是突如其來的，如同前蘇聯在短時間內突然瓦解，而沈大偉所提的最後階段是指長時間的衰退，最終失去政權，這個時間或許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都有可能，中國僅是進入結束前的長期衰退階段。

沈大偉在該訪談除了說明他的主張有所轉變是因為中共的政策變化以及其主張的最終階段並非崩潰論之外，沈大偉還對文章的一些內容有所解釋，首先他認為習近平的權力雖然穩固，但是黨的總體生命力還有他個人對權力的掌握都很脆弱。另外，沈大偉仍主張雖然習近平認為戈巴契夫的改革會導致國家崩潰，但透過鎮壓可能導致一樣的結果。而關於中共的意識形態控制減弱，沈大偉強調他指的是監控機構未來鬆懈並同情異議人士的可能性，並非指中共的控制已經呈現鬆動，同時他認為民眾對圍繞習近平建立的個人崇拜。沈大偉重申政治壓迫的結果，一旦發生鬆懈則中共就會迅速瓦解，而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推動開放又不失控制力，沈大偉認為按照中國的文化和社會，這是比較好的選項，當然沈大偉並不認為習近平會選擇這條路。¹¹¹

¹¹⁰ 儲百亮，2015，〈沈大偉：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17/c17shambaugh/>，檢索日期：2015年6月10日。

¹¹¹ 儲百亮，2015，〈沈大偉：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17/c17shambaugh/>，檢索日期：2015年6月10日。

沈大偉雖然澄清了他的主張並非中國立即會崩潰，不過無庸置疑的是，沈大偉的確預測了中共政權的結束正在倒數計時，只是這時間並沒有該文標題看起來那麼快到來。不過關於外界認為他態度改變，沈大偉自己也在上述訪談中提到，這是因為中共的政策轉向，而他在另一次接受採訪時也說明此點。

「我認為我的觀點是演變(evolve)而不是改變(change)。中國在演變，我的觀點變化是因研究對象變化了。」¹¹²

真的是如此嗎？本文既然已整理沈大偉對中國黨政所發表的評論及文章，那接下來筆者就針對這點討論。首先，沈大偉在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這篇文章以及之後的訪談所提到的各種中共內部問題並非他首次提出，如果細看本文整理的沈大偉自 2011 年以後的文章或評論，可以發現他一再強調中共面對的這些問題，不管是富人出走、思想管制的衰弱、貪腐問題、政策透明度以及少數民族問題，都是沈大偉認為中國改革遇到的嚴重困境。對此，沈大偉一直認為壓制社會需求是無助於這些問題的改善，他也不只一次批評習近平上任後加強管制的做法。所以，沈大偉的這個對中國未來悲觀的觀點絕非突然的轉變。第二，沈大偉的態度真的有轉變嗎？其實這些問題如意識形態管制、貪腐問題、政策透明度還有開放或壓制社會需求的路線抉擇，沈大偉早在 2008 年《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就已提過，他也指出，中共正處於收縮狀態，但是改革的方向正確或可延緩或逆轉這個收縮狀態。即使是在沈大偉對中國發展較為樂觀的著作裡，他都表明了中國處於問題之中，可以說他一貫主張中共必須改革，否則對黨的存亡將是問題。所以，顯然改變的是習近平上任後中共的改革方向，從開放到壓制，讓沈大偉對此改革逆轉收縮的可能性感到悲觀。因此從這兩點來看，的確符合沈大偉的說法，他的論點絕非突然改變，甚至立場是一致的，即中共的改革方向將決定它

¹¹²馮兆音，2015，〈沈大偉：中國「臉皮還不夠厚」〉，世界新聞網：
<http://www.worldjournal.com/3176708/article-%E6%B2%88%E5%A4%A7%E5%81%89%E5%BC%9A%E4%B8%AD%E5%9C%8B%E3%80%8C%E8%87%89%E7%9A%AE%E9%82%84%E4%B8%8D%E5%A4%A0%E5%8E%9A%E3%80%8D/?ref=%E8%B6%85%E4%BA%BA%E6%B0%A3&npg=2>，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能否維持政權，而對沈大偉來說，習近平選擇了他認為不可行的政策方向。

回到本節開始所提的兩個問題，第一，是否符合三個時期趨勢？第二，沈大偉理論轉向的理由是什麼？第一個問題的部分，沈大偉在中國黨政方面的研究並不存在第一個悲觀期，事實上他對江澤民時期（1989-2002）還有胡錦濤時期的大部分時間（2002-2008）都是屬於樂觀時期，而2008年以後則仍然是「有條件」的樂觀期，重點在於中共能否走向江胡時期的開放路線。至於第二個問題，筆者已使用許多篇幅來討論這個改變的原因，並非他的立場及理論有所改變，而是中共走向他理論假設中，將讓中共進入終局的政策路線。

另外，鍾宜錚提及紅隊在中共權力分析的研究上，常常強調中共的內部問題，藉此強調中共政權之脆弱性並說明中共難以成為威脅。除此之外他也引用了沈大偉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以說明紅隊雖然主張中國具有脆弱性，卻不認同中國崩潰論這類的極端觀點。¹¹³筆者認為，同樣以沈大偉為例，正如本文所顯示他已經指出中共政權結束政在倒數，那麼他的主張與中國崩潰論的差距在哪裡？或許可以加以區分的不同在於，崩潰論帶有即時性，沈大偉的終局論則是長期衰退以至於結束，儘管如此，這兩者的界線仍頗為模糊。

再來，同為紅隊學者，謝淑麗在2007年的著作裡雖然也認為儘管中國內部有許多問題，中共仍能應對這些問題並維持政權，但她仍指出中共可能崩潰的原因，例如經濟重創、環境或公共衛生等問題引起全國動亂，或者黨領導人為了維持黨的政權而必須對美、日和台宣戰。¹¹⁴相對於此，幾乎同一時間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則更加樂觀的認為，中共當時的改革方向對於中共政權的維持相當有助益，且中共正持續走向開放的政體。可見即便同是紅隊陣營的學者，在關於中共政權穩定與否的問題上都會有所差異，何況沈大偉自己的論述就有所變化。因此隨著中國情勢的改變，學者的論述是有可能轉變的，如果強要用紅藍隊

¹¹³ 鍾宜錚，2013，〈一個所謂紅隊學者，藍普頓的中國認識〉，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pp.34-36

¹¹⁴ 謝淑麗原著，溫洽溢譯，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p.86

的定義去劃分學者陣營，不免太過狹隘，而且容易因為陣營劃分的印象，影響對學者完整思想的認識，沈大偉的中國終局論所引起爭議，就是因為對其紅隊學者身分的印象，而忽略了他近幾年來多次表達的對中共改革的擔憂。所以從沈大偉對中國黨政的歷年研究，我們可以證實紅藍隊這樣的陣營劃分不僅有其侷限，甚至有礙於我們對學者主張的認識。那麼接下來，本文將討論另一個和中國共產黨政權密不可分的領域，中國的軍事。

第二節 中國軍事

在第貳章已討論過中國的軍事安全戰略，不過那和中國的對外關係比較有關，接下來本文將討論的則包括沈大偉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制度還有軍備方面的相關研究。在開始討論沈大偉在軍事方面的研究之前，必須先說明討論軍事對本文的意義何在？紅藍隊之間一個重要分歧，就是中國的軍事力量的日漸上升究竟會不會威脅美國？對藍隊學者而言，中國的軍事力量正是中國威脅論最好的例證之一，對紅隊而言這卻並非必然。因此，檢視沈大偉怎麼評價中國軍力，有助於釐清本文主題，即對紅藍隊這樣的區分是否恰當或有意義。那麼接下來就討論沈大偉對於中國軍事方面的著作。

如果說沈大偉對中國軍事的研究有任何特點，那就是他不只專注於中共在硬體武裝上的提升，他更在意中共軍事將領的安排與訓練。沈大偉在 1999 年與李潔明（James Roderick Lilley）編輯的著作《共軍的未來》一書裡，就撰寫了一篇文章討論後鄧小平時代中共軍方的將領。沈大偉在該文指出，中共在鄧後時代大幅更換人民解放軍的領導，範圍包括各軍區的陸、海及武警司令、副司令還有政委。其他有總參謀部、總後勤部、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等機構也有人事調動。沈大

偉認為，這些解放軍的新領導階層將影響未來十年與美國的關係，因此有必要認識他們。¹¹⁵

除此之外，沈大偉列出了新的解放軍領導階層大致存在 8 種情況，首先，解放軍內部派系不再如過去明顯。第二，從屬及人事關係的形成多因曾一起服役或同間參謀學院就讀。第三則是領導階層的去政治背景化，這批新領導人除了遲浩田和王瑞林之外都沒有政治背景，沈大偉認為這是代表著黨軍關係的新變化，因為黨與軍隊的關係不再如過去緊密，逐漸變得專業化。第五，沈大偉指出，這些新的領導階層多只在軍區服務缺乏，因而缺乏國際觀也不太考慮戰略而僅思考戰術。第六點，解放軍元老級人物逐漸喪失在軍中的影響力。第七點，沈大偉認為這些新的領導幹部在政治上的地位相當穩固。第八點，沈大偉指出，中共雖然透過司令員和政委的輪調來避免各地派系形成，但新的領導階層卻多為來自「山東幫」的成員。另外，沈大偉也在該文說明了這個新的領導階層有五個工作重點，這些工作重點包括了，精簡軍隊數量，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精英部隊、加強有限度不對稱戰爭的準備、強化黨對軍對控制、打擊軍中腐敗及加強訓練還有不影響經濟及民生的情況下增加國防經費。¹¹⁶上述內容裡，沈大偉明確的列出這些新的軍方領導高層所代表的意義，尤其是這些領導幹部缺乏政治背景這點，在之後的結論將是個重要的觀察。

接下來沈大偉在該文逐個分析各單位的新領導幹部們，例如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張萬年和遲浩田，還有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等人。其他沈大偉也介紹了國防部、軍種部門、軍區及軍事學院等單位的主要領導人物的背景還有特色。沈大偉並在最後總結三個需要注意的方向。首先，是黨軍關係的變化，關於這點，沈大

¹¹⁵ 沈大偉原著，翟文中、黃俊彥、余忠勇、張天虹、吳奇達譯，2000，〈鄧後時期的中共軍方領導幹部〉，載於《共軍的未來》，James Lilley, David Shambaugh 主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9-42。p.11

¹¹⁶ 沈大偉原著，翟文中、黃俊彥、余忠勇、張天虹、吳奇達譯，2000，〈鄧後時期的中共軍方領導幹部〉，載於《共軍的未來》，James Lilley, David Shambaugh 主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9-42。pp.12-15

偉引用了 Ellis Joffe 的觀點，認為早期的解放軍是不折不扣的專業黨軍，但在後鄧時代，卻有兩個因素影響了過去的黨軍共生關係，一個是黨的元老級領導人物不再具有軍方背景，同樣的軍方領導人物也沒有政治背景，軍隊將越趨專業化，黨和軍的利益將不再一致，不過該文也指出，只要中共仍然掌握政權，就不會需要解放軍來維繫政權。第二則是，中共領導人已察覺解放軍面對現代化戰爭能力的缺乏，而如果台海或朝鮮半島發生衝突，共軍將必須與美國這個軍事科技最進步國家對抗，因此已開始一系列計畫強化解放軍軍力。第三，沈大偉認為這些新軍方領導在面對外界挑釁時，對台灣還有南海問題將會立即發起戰鬥，但如果是面對韓、中亞、印度、俄羅斯、美和日等國時，仍將盡力避免戰爭。¹¹⁷

從上述的文章可以看到沈大偉對共軍的研究並非僅只於軍力研究，他更在意主政者們的背景和態度，那將影響了中國對外的軍事行動，更重要的是也影響了黨軍關係，尤其黨軍關係的變化是沈大偉的研究中常會加以討論的議題，畢竟在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解放軍的態度將是決定中共政權能否維持的重要關鍵之一。接下來將討論沈大偉的另一本專書《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在第貳章即有討論該書第七章內容，以釐清沈大偉對中共軍事戰略安全的觀察，而這一節則將專注於整理他在該書對中共軍事設備、制度和黨軍關係等議題的討論。

沈大偉在該書第二到第六章討論的都是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制度上的轉變。首先，沈大偉認為中共在經歷 1990 年代的三次震撼，分別是波斯灣戰爭、台海危機還有科索沃戰爭，讓高層意識到中共有必要加速其軍隊，例如科技現代化和應付不對稱戰爭等問題。而沈大偉指出，當解放軍開始進行改革的同時，也讓軍隊與黨的關係產生變化，根據他的說法，黨軍關係正邁向軍文關係。沈大偉在文中提到，解放軍目前主要任務是對外維護國家安全，在國內安全及政治工作方

¹¹⁷ 沈大偉原著，翟文中、黃俊彥、余忠勇、張天虹、吳奇達譯，2000，〈鄧後時期的中共軍方領導幹部〉，載於《共軍的未來》，James Lilley, David Shambaugh 主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9-42。pp.15-38

面已較少過問，且至少法律上解放軍是受到國家主席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指揮，因此研究軍文關係比黨軍關係更為恰當。總體而言，沈大偉認為軍隊究竟是應受到黨或是國家的控制，仍持續有所爭議，但是解放軍卻在這個改革的爭議中取得更大的自主權與專業。沈大偉指出，解放軍出面擊退外敵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否會繼續幫忙鎮壓黨的政敵，將重新界定黨、軍和國家的關係。沈大偉也指出，中共為了適應現代化戰爭，以「高科技條件下的有限戰爭」為主要條件，大規模的修改其作戰準則還有戰術及戰略，但沈大偉認為解放軍為此而設的新準則與目標卻受到自身能力限制難以實施，這點他們也深感苦惱。沈大偉還主張相較解放軍指揮管理方式的調適遠跟不上軍事設備現代化的速度，因此共軍距離現代化軍隊仍然有段距離。¹¹⁸

在指揮管制和兵力架構的部分，沈大偉指出，解放軍的組織架構基本上仍延用 1950 年代引進的蘇聯式系統，並無法適應現今的戰爭，而解放軍已經從事許多精簡與改革措施以達到適應「高科技條件下的有限戰爭」的兵力架構，可是沈大偉認為目前解放軍的改革都是基於現有制度進行漸進改革，而其基本架構仍是蘇聯時期的系統，如要真正成為一支現代化軍隊，則解放軍應當要進行更根本的改革。在預算上，沈大偉認為解放軍的預算的確比過去提高，可是他也指出這些經費並不全然用在軍事設備的提升，因此難以論斷解放軍正大幅強化軍力。在國防工業與武器採購方面，沈大偉指出，這是中國最需要現代化的部分，但是中國一直缺乏足夠能力滿足國防需求，向國外採買武器的管道也常常受阻。沈大偉認為解放軍雖然擁有龐大的部隊和完備的傳統武器，其國防工業卻仍然有許多限制，而解放軍重視長程攻擊能力還有資訊戰爭技術，沈大偉指出，這能推斷中共有意以不對稱戰爭來應對與美國和日本等技術先進敵人。安全戰略的部分，本文第貳章已提過，且與本節主要討論主題不相符，這邊不再重複討論。在《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這本書的最後，沈大偉主張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逐步滿

¹¹⁸ 沈大偉原著，高一中譯，2004，《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pp.1-170

足其國防需求，並進而購成對鄰國與美國的挑戰僅是時間的問題，對美國及其亞洲盟友來說，重要的是能否與之和平共存。沈大偉還主張美國應該要持續與中國交流對話。¹¹⁹

從上述內容來看，在 2000 年左右，沈大偉對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現代化程度的評價顯然並不高，他認為中國軍隊朝向真正現代化軍隊仍有段距離，無論是在軟體或硬體設備的發展，不過他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未來發展還是相當看好的，他認為解放軍終將成為現代化軍隊。在沈大偉 2013 年的著作，*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的第七章，他論述中國在全球安全議題扮演的角色時，他再度討論到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進程。沈大偉在該書主張中國軍隊的軍事硬體設備和指揮制度等都有所升級，「高科技條件下的有限戰爭」也仍然是解放軍的目標。沈大偉還討論了解放軍各軍種的發展還有共軍在電子戰技術的進步。另外，在 2000 年時，沈大偉評為急需現代化的國防工業部分，沈大偉在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指出，中國已經是世界上主要的武器供應商之一，雖然其銷量及影響仍遜於美國和俄羅斯，不過已超越英法兩國。整體而言，沈大偉在該書的觀察顯示解放軍這十數年間已取得許多進步，但仍有未足之處。儘管如此，沈大偉在該書對中共軍事的發展依然持樂觀看法。¹²⁰

從上述的內容可以看到，整體而言沈大偉對解放軍的現代化進程相對於中共的外交或黨政領域是一直較為樂觀的，他認為解放軍的現代化只是遲早的問題，甚至在某些領域超過美國只是時間的問題。儘管如此，他的論述仍符合紅隊學者的主要看法，即使中共的軍力在增加，美國還是有機會透過對策來和中國維持和平關係。

第三節 中國經濟

¹¹⁹ 沈大偉原著，高一中譯，2004，《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pp.171-438 pp.509-550

¹²⁰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69-306

中國的經濟成長向來為世人所注目，而前文也有提到，沈大偉指出，西方學者很多認為中國政權的維持依靠的僅是高速的經濟成長，顯然經濟成長對中國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沈大偉較少有專門探討中國經濟的著作或評論，但他對於中國經濟的看法仍可散見於其他議題的文章。沈大偉對於中國經濟的成功並不否認，正如他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所提。

「它（中國）擁有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最大規模的外國直接投資、欣欣向榮的國際貿易、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¹²¹

沈大偉認同中國經濟的繁榮，不過他也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造成了收入不平的社會問題：

「中國世界上基尼系數上升最快的國家之一，反映出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的速度加快，因為少數人從改革中致富的同時，大多數人被遺忘了。社會弱勢群體的人數在過去 10 年中快速增長。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政策向沿海地區傾斜，忽視了內陸地區，尤其是農村出現了相對的貧困化。」¹²²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如同其他紅隊學者一樣，沈大偉也並不只看到中國經濟繁榮的一面，他更在意繁榮背後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這點在之後的文章可以常常看到，他對於中國經濟成長背後所面對的問題有詳盡的討論。

在前文提到沈大偉 2009 年的文章，「中國 60 年：富裕之路」，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一個概略的回顧。沈大偉指出，1978 年以前，毛澤東主導下的中國提出了一些災難性的措施，例如大躍進，而這一切直到鄧小平等改革派人是重新掌權後才畫下句點。沈大偉在文章中提到，距離鄧小平經濟改革後 30 年，中國交出了非凡的成績，他列出中國目前的經濟成就，包括成為僅次於美日的世界第三大

¹²¹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245

¹²²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167

經濟體、在電子技術和生物技術方面的升級並成為世界主要製造業大國。沈大偉還指出，中國除了受到全球最多的外國投資外，由於中國目前已累積有 20 兆美元的外匯存底，中國也開始了自己的投資。另外，世界 500 強的企業中有 37 家是中國企業。在資源方面，中國也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費國。在列出中國經濟成就的同時，沈大偉也指出了中國經濟成長所付出的代價和面對的問題。他提到中國的高經濟同時帶來嚴重的空氣及水污染。除此之外，沈大偉也指出，中國仍有 2.07 億人處於不到貧窮線每日 1.25 美元的生活水平。經濟持續的成長所帶來的都市化也因大量的強制拆遷引起地方反感。¹²³

同樣地，沈大偉在 2009 年的觀察仍指出中國經濟正在持續成長，不過仍然造成許多其他的環境及社會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文章中，沈大偉提及中國有 37 家企業進入世界 500 強企業，並藉此肯定中國的經濟表現，然而他 2012 年在東亞論壇季刊 (East Asia Forum Quarterly) 卻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的跨國企業真的跨國嗎？」(Are Chin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ally Multinational?) 的文章對於他在前文所提的中國企業進入世界前 500 企業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沈大偉指出，未來中國的企業將有可能在國際市場佔有更多地位，不過他從現在的情況觀察，中國企業品牌知名度仍不高，企業主要業務多辦在國內，因此沈大偉認為儘管中國企業總收入排名持續增加，在世界前 500 企業裡影響力攀升，但仍然未如中國政府的要求：「走出去」。沈大偉並說明中國企業無法真正走出去的十個原因，首先是中國企業很少真正的全球範圍運作。第二，沈大偉指出，中國少有能夠跨國管理的人才。第三，中國企業的管理缺乏透明度甚至有腐敗傾向，另外還受到中國共產黨的介入，因而政治化。第四，僅有少數全球品牌。第五，由於缺少管理人才，中國企業常常透過併購的方式擴張企業，不過沈大偉指出，這些被收購的部門常常在併購後市值下降。第六，多數的中國企業並沒有制定向全球化邁進的商業計畫和戰略。第七，中國企業往往具有明確分層，並注重領導階

¹²³ David Shambaugh. 2009. "China at 60: The Road to Prosperity." September 28.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24366-2,00.html> (April 26, 2015).

層的指示而缺乏創新，這往往造成併購後與西方企業文化的衝突。第八，中國企業常出現不透明及腐敗，甚至還有商業欺騙行為，而中國的法律顧問往往不是真正了解外國的法律環境。第九，中國企業缺乏全面的調查，因此面對競爭對手時常無法正確了解雙方優勢。第十，中國企業內部的國內和國際部門常是互不聯繫協助。¹²⁴

沈大偉從上面十個因素來解釋中國跨國企業在真正國際化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當然他並未否認中國企業日漸增加的影響力還有總收入，不過他認為從國際影響力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仍未真正的成為跨國大企業。從這裡可以看到沈大偉對中國的經濟還是給予肯定，但他從國際化與否的角度來看，中國企業表現仍有待改進。類似的觀點我們可以在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看到，他該書主張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四個領域，貿易、能源、投資還有援助等，都有廣泛的涉足，可是沈大偉認為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影響力仍不夠深入，他尤其指出中國在對外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和政府開發援助所投入的資金仍不如美國。¹²⁵ 這些論點說明除了中國經濟所衍生的內部問題之外，沈大偉對於中國在經濟層面的國際影響力也提出質疑，這點的確符合紅隊學者的論述邏輯，即中國雖然國力日漸增長，卻尚未足以成為美國的威脅。

2014年，在前文提到的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 一文，沈大偉對於中國所面臨的經濟改革挑戰有詳細的說明，首先第一的重點就是在宏觀經濟上的調整，要把主力從增加國內投資和出口的舊模式轉移至增加國內消費還有刺激創新及知識產業。再來則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將競爭引入能源、交通和電信等壟斷產業。第三則是放寬或解除戶口限制。第四，金融部門自由化還有人民幣交易區及與外匯交易的擴大，另外還有紓解地方銀行和企業債務即修

¹²⁴ David Shambaugh. 2012. "Are Chin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ally Multinational?." July 10.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2/07/10-china-multinationals-shambaugh> (June 26, 2015).

¹²⁵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05-206

定破產法。第五，放寬各級政府規章。第六則是經濟的進一步開放，建立自由貿易區減少關稅限制，另外還有擴大中國的對外自由貿易協定。第七，提高預算透明度。第八，修改稅收結構。另一個改革挑戰則是創新性不足，沈大偉指出這將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中國將無法研發更先進的技術，卻又隨著人民薪資升高而失去便宜的勞力優勢。不過如同前文敘述，這些改革非常有可能受到利益團體的阻礙，不過沈大偉認為目前看來還是順利的。¹²⁶

從沈大偉列出的這些問題看來，他對中國經濟情勢的觀察比起以往較悲觀的，之前的文章雖然指出中國亮眼的經濟表現背後衍生許多問題，在國際上並未有深入的影響力，可是在這篇文章提出的卻是結構性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若不將這些結構性的問題解決，中國的經濟將有可能停滯甚至出現問題。其中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沈大偉在 2015 年的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一文，亦再度被提及。沈大偉在該文指出，在西方的觀察中，中國正卡在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並沒那麼容易脫離，不過習近平事實上已經提出許多經濟上的改革政策，可惜的是國有企業和地方幹部等利益團體正計畫阻止這些計畫的實施。另外，沈大偉也認為中國要進入知識經濟，政治體制的開放將是重要的關鍵，否則政治體制將阻礙經濟改革。¹²⁷

顯然沈大偉認為中國的經濟能否成功轉型進入下一個階段和其政治改革息息相關，換句話說，既然沈大偉不認為中共有可能在政治議題上重新回到開放的改革方向，我們應該可以判斷他對於經濟的改革也並不那麼樂觀。總體而言，沈大偉在 2014 年以前的著作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樂觀的，唯一批判的是衍生的貧富差距加大和環境污染等問題，還有經濟領域的全球影響還不深。這一類的批判尚符合紅隊學者的立場，中國經濟的成長是肯定的，也因此美國應當和其合作，又

¹²⁶ David Shambaugh. 2014.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1-18. pp.3-5

¹²⁷ David Shambaugh. 2015.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March 6.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June 12, 2015).

因中國內部問題還有國際影響力不足，美國並不需要感到威脅。可是 2014 年以後，沈大偉談到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時，甚至認為中國陷於中等收入陷阱後將很難脫離，並將之與政治改革相連結，可以說是對中國經濟的不樂觀預測，這與一般對紅隊學者立場的印象並不相符，所以筆者認為在沈大偉在經濟方面的論述變化，也可反映用制式標準去區分中國問題專家並不適當。

小結

在本章討論了中國的內部議題，包括幾乎影響整個中國政治的黨政問題、軍事改革議題還有經濟問題。從我們上述的整理可以看到，沈大偉在中國黨政的論述變化顯現紅藍隊學者這樣的陣營劃分有其侷限，因為以沈大偉為例，隨著中國自身政策及環境變化，他就做出與本來主張差異頗大的論述，讓外界震驚於他的「學術突變」¹²⁸。所以筆者以為用紅藍隊區分並無法完整說明這些學者的立場，更有甚者，還成為了我們去判讀這些學者論述的阻礙，因為對學者陣營歸類的印象而在解讀其著作時有錯誤判斷，這在本章也花了大篇幅解釋，認為沈大偉有所「突變」者往往忽略他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裡樂觀論述的「但書」，亦即適當的改革。

中國軍事的部分，筆者認為沈大偉的論述仍符合一般紅隊學者的定義，中國的軍力持續增長是無法否定，不過他仍認為美國應該要與中國持續交流。雖然如此，沈大偉對於中國軍力增長而對鄰國構成挑戰的可能性並未否定，並從他近年對於中美關係進入有條件樂觀期來看，他對中美關係和諧的可能性不再這麼肯定，因此他對中美是否會發生軍事衝突的判斷亦有可能有所變化。在最後經濟的部分，筆者已有說明，沈大偉近年對中國經濟的批判已從衍生問題轉移至根本的

¹²⁸ 蒙克，2015，〈透視中國：中共統治會崩潰嗎？〉，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_watch/2015/03/150318_china_watch_shambaugh_china_cracking，檢索日期：2015 年 3 月 18 日。

結構問題，並形成不那麼樂觀的預測，而紅隊學者雖然會希望降低美國對中國經濟成長的顧慮，而直接做出部樂觀預測是否超出一般紅隊學者的論述是可議的，筆者因此再次主張現有紅藍隊學者分類的侷限和不當。

總結本章的內容，筆者以為在整理沈大偉對中國內部問題的觀察後，可以初步的批判，紅藍隊的定義是不足以劃分學者，而且還可能造成對學者主張的誤判。

第四章 紅隊學者的比較—沈大偉、藍普頓和謝淑麗

本文在第貳章和第參章已經將沈大偉的中國研究初步加以整理，說明一個學者的論點不可能全然一致，有時甚至發生不小的變化。如同沈大偉的中國對外關係研究，是從悲觀到樂觀，再到有條件樂觀，隨著中國的政策路線改變，他對中共政權的未來也逐漸悲觀。因此，將這些學者籠統的區分為紅隊或藍隊時，很容易忽略他們觀點的變化，或是因出現所屬歸類相反的論述而困惑。前兩章的提醒是，同一位學者即便在同樣議題的研究觀點未必會一直符合「紅隊」或「藍隊」的分類定義，用這樣簡單的分類不僅不足，甚至有礙於對學者觀點的解讀。

即便不考慮個別學者論述所發生的改變，劃於同一陣營的學者之間的主張是否真的差異不大呢？如若不然，則可進一步質疑紅藍隊的分類並無意義。故此，第四章將分析三位頗具代表性的紅隊學者，包括 2015 年初被中國的外交學院選為最具影響力美國知華派學者的藍普頓，還有曾任柯林頓總統時期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以及本文主要研究對象沈大偉，透過比較這三位紅隊學者主張的異同，來釐清前述本文對紅隊陣營學者主張是否接近的質疑。第一節和第二節主要是簡單整理並陳述藍普頓和謝淑麗兩人對中國內部還有對外關係的觀察，在第三節則比較沈大偉與他們兩人間的異同。

第一節 藍普頓的研究介紹

藍普頓生於 1946 年，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教授以及該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藍普頓是著名的紅隊學者之一，同時如前所述，他也被視為最具有影響力的美國智庫學者。根據一次專訪內容，藍普頓對中國產生興趣是在 12 年級（台灣的高中三年級）時一門遠東歷史課程，讓他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

進入史丹佛大學後就主攻中國與亞洲研究。¹²⁹本文選擇了藍普頓的三本專書，分別是《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 1989-2000》、《中國國力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還有《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這些著作分別在 2001 年¹³⁰、2008 年和 2014 年完成，可以說代表了他近 10 至 20 年對中國的觀察成果，本節將會透過這些著作的介紹整理，說明藍普頓的中國研究的重要觀點。

《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是藍普頓對中美外交關係研究的重要著作，他先概述中美在安全及經濟議題的情勢，之後將 1989-2000 年中美關係的變化以全球、國家社會還有個人等三個層次討論。

藍普頓認為 1989 年到 2000 年雖然波折不斷，卻有助於兩國尋求更現實的相處方式。2000 年左右的中美關係局勢，藍普頓則認為不要成為公開的敵對狀態就已足夠。雖然如此，藍普頓還是主張可以期待中美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另外，藍普頓提出中美關係在安全議題方面的爭議，包括中國因應安全觀從對抗大國侵略轉向防範周邊威脅，而進行軍事的現代化，卻引起鄰國和美國關注；美國奉行單邊主義，而中國期待更多邊的國際秩序；中國將自己定位為弱國，而美國則視中國為崛起中的大國，也讓雙方在安全領域產生分歧。台灣亦是中美安全議題中的重點。藍普頓指出美國常有不符中國預想的行為，例如台海危機，中國錯估美國防衛台灣的決心。他主張雙方應加強相互認識及增加合作領域，並防範台灣問題成為中美衝突的導火線。在經濟領域，藍普頓觀察到兩國貿易額在 80 年代中期迅速倍增，90 年代，中國日益依賴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對外貿易。這讓美國部分決策者想藉經貿制裁逼迫中國改變，藍普頓認為這並不如他們想的有效。美國對中美的經貿關係也有許多不滿，首先就是貿易逆差和就業機會流失到中國等問題，而中國的商業規則不透明也成為爭議，此外中國出現的大量盜版及侵權行為也讓美國感到不滿。中國的勞改問題也常不時出現在中美的談判中，強迫罪犯生產商

¹²⁹ 余東暉，2014，〈中評獨家專訪美國“紅軍”藍普頓〉，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33/0/8/2/103308288_2.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3308288&mdate=0730001724，檢索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¹³⁰ 原文為 2001 年出版，中文譯本出版於 2003 年。

品，美國希望禁止這類勞改產品。關於中美人權議題，藍普頓認為中美的人權觀念基於發展歷史和發展目標的差異而大不相同。不過藍普頓在回顧中美因人權所發生的事件後指出，美國透過經濟施壓無助於中國人權狀況的改善。他認為中國內部的改變，包括人民與世界的接觸、領導人是否感覺安全、中產階級的壯大還有司法及法律制度的建設才是中國人權情況改變的關鍵。¹³¹

在上文整理的《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 1989-2000》的前三章內容可以看出藍普頓對中美關係的總體看法如同前文已提過的，他和沈大偉一樣都認為中美兩國彼此並不够理解對方。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全領域的部分，除了國際秩序觀差異還有台灣問題這類雙方基於觀念和利益不同造成的摩擦外，藍普頓舉出許多爭議的例子是由於美國對中國的立場不清楚，因而產生誤判，例如將中國視為崛起大國，卻忽略中國如何評估自身實力，又或著是將中國軍費的增長和軍事現代化當作威脅，但沒考量這是中國基於其周邊安全考量的措施。當然，中國對美國也有所誤解，例如錯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不過雖然他在文中強調雙方都不够了解彼此，但藍普頓在文中指出美國不僅不了解中國安全領域政策的源由，還常過分戒慎恐懼，徒增雙方關係的不穩定性，可以說他認為在安全領域，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對中美關係影響甚大。

在中美經濟貿易的部分，藍普頓則指出，中美貿易往來日益密切，同時也讓中國依賴美國市場日深，伴隨而來的卻是讓美國將經濟貿易當作制裁的手段，藉此達成自己目的或逼迫中國改變。藍普頓對於美國某些政策制定者的這種想法加以批判，認為這種判斷是錯的，中國並不必然害怕美國的制裁，這點尤其在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如人權議題時最為明顯。藍普頓在經濟領域同樣傳達了美國因誤判而試圖以錯誤方式去改變中國，反而影響中美關係。可見，藍普頓觀察下的中美關係中，來自美國誤判造成的不穩定因素是佔多數的，與其說他主張兩國相互理解，不如說他主張美國主動理解中國，並做出相應決策。

¹³¹ 大衛·藍普頓原著，計秋楓譯，2003，《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 1989-20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pp.3-166

接下來介紹藍普頓對中國從宏觀到微觀的觀察。藍普頓按照全球、國家和市民社會以及個人層次來介紹中美關係的進程。

中美關係的全球層次部分，藍普頓認為中國並非不願加入國際組織及做出貢獻，問題在於關於中國的加入的代價是否太高。藍普頓指出，中國在全球的經濟活動和美國同樣受到國內外的政治影響，他認為單純將中國視為共產國家會造成對它分析的誤判。在不得罪國內勢力集團、不遵守協議會支付重大代價以及遵守協議能得到資源等情況下，中國是會履行協議的。藍普頓認為中美兩國都需要讓國內體制適應全球化，否則兩國將難以相處。針對中美與第三方關係，藍普頓認為中-港-美或中-美-台，都必須小心翼翼的處理彼此的關係，如果有任何誤判都可能影響三邊關係的平衡。另外，他認為美國不需要在意中俄合作的進展，而應專注讓自身分別與中俄的關係比中俄關係發展更好。美國面對中日關係要鼓勵穩定的三邊合作。接著是國家及社會層次。藍普頓指出，基於歷史經驗，中國極力避免內政受到干涉，美國卻覺得自己有義務關注外國事務，而中美關係常受到這種認知不同的影響造成緊張。媒體則加強了這種自我認知，而且兩國的媒體對彼此的報導多半是負面且偏頗的。除了國家歷史經驗及媒體影響造成的認知衝突外，藍普頓還提到中美雙方不夠了解的另外一個因素，亦即中美兩國常忽略對方的對外關係是受到國內因素影響，包括中美都不夠理解對方國內意見的多元化還有社會具有的複雜性。另外，中美的領導人都正轉向事務型領導人，這些人傾向透過對外政策維持國內穩定並平衡支持者。在機構、地方制度和總體議程，中美兩國也大不相同。最後是個人層次，藍普頓認為，雖然領導人或個人在中美關係中單獨決定的能力已經逐漸下降，他們要決策前需要經過協調支持者以保障政策受到支持，但是個人在中美的互動過程仍發揮了重要作用。藍普頓並指出，美國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學術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商業團體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於中美前景，藍普頓在文中提到，中美關係如今（截至 2000 年）處於十字路口，他認為此時的決定將影響日後的中美關係。對此，藍普頓提出了未來有可能的三種中美關係情境。第一種是廣泛合作的關係。第二種情況是混雜的關係。

第三種前景是廣泛衝突的關係。藍普頓建議中美關係的相處要讓彼此有迴旋的空間、有能力制定及貫徹政策的組織機構、確認事項的重點、戰略性的對話和界定意圖、守信、考慮對方的國內政治因素、領導人要能解釋並引導民眾了解當今情勢及政策。¹³²

從《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一書的內容來看，藍普頓筆下的中美關係可分三方面，首先中國在國際上的行動都是可以理解的，並非外界所想像的那麼不可預測，藍普頓已經在經貿、安全觀、歷史經驗還有內政與外交關係等領域來解釋，中國的行為都是各國面臨問題時有可能的反應，甚至美國自己都有面臨這些困境。那麼就引出他的另一個論點，中美並不真正的互相理解。例如美國常忽視中國是正在發展中的國家而以自身標準要求中國，或沒考慮中國的內政因素。同樣的，中國也未真正理解美國的政治運作過程，造成對美國行為的誤判。雙方也沒考慮彼此的國際觀及歷史經驗，因而不斷造成摩擦，可是同時兩國又在許多事務上需要合作。最後，由於以上的因素加上雙方多元的決策參考來源，也讓中美關係日益複雜。整體而言，藍普頓對於中美關係的論述並不是太悲觀，對他來說，雖然中美關係在過去十年合作與摩擦與合作都存在，他也觀察到其中許多因素來自彼此的不夠理解，不過同樣的他認為進入 21 世紀後，中美兩國的決策也將會影響日後數十年的中美關係，換句話說，中美關係並不一定非得處於競爭及合作混雜的關係，而能隨著雙方的努力加以改變，甚至他明言現階段的競合混雜只是必然的過渡時期。那麼在步入 21 世紀後，藍普頓又是如何看待中美關係？在本文第貳章可以看到，沈大偉在進入 2001 年後，對中美關係的改善有高度肯定，因此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藍普頓在《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 1989-2000》一書的中文版特別新增的對 2001-2003 中美關係的觀察。

藍普頓在該篇文章中，仍用他的三個層次來探討 2001 到 2003 年中美關係。藍普頓在開頭就說明，全球層次出現兩個比較大的改變，一個是 2001 年中國加入

¹³²大衛·藍普頓原著，計秋楓譯，2003，《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 1989-20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pp.179-444

世界貿易組織，第二則是同年發生的 911 事件及隨後的美國反恐戰爭。藍普頓並指出，反恐戰爭對於中美關係的穩定多少有所幫助，而且其後的北韓及伊拉克議題也讓中美必須合作。國內和個人層次則是國內領導集團的轉變，中國第四代領導集團的掌權和美國小布希總統的就任。在該文的總結，藍普頓給予這段時間的中美關係較積極的評價，他指出，小布希上任後採取的作為讓人認為中美關係比想像中耐久，而 911 事件的發生則增加中美關係戰略基石，經濟的相互依賴也穩固了雙方關係，另外對於最可能引發中美衝突的台灣問題，藍普頓認為隨著兩岸經濟交流，是有可能避免衝突的。¹³³

針對 2001 年到 2003 年的中美關係，藍普頓顯然和沈大偉同樣的認為 911 事件的發生對中美關係有所幫助。當然，雙方在分析架構最不同的一點就是藍普頓使用了他的三個層次，從全球到個人來觀察中美關係。上述內容主要聚焦於中美關係，而藍普頓另外一本著作《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就著重在中國國力的發展了，當然最關心中國國力發展的除了中國自身之外，還有其鄰國和美國，因此藍普頓在文中也會提到中國在力量上的發展對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含義，也探討了中國的外交觀念。

藍普頓在 2008 年的著作《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將力量區分為強制力量、功利力量和標準力量。藍普頓並藉此分析中國的力量，軍力即是強制力量，功利力量則是財力，而標準力量就是智力。軍力的部分，藍普頓指出，為了因應威脅，中國積極加強現代化，同時也強調中國不希望稱霸。財力的部分，藍普頓列出中國經濟力量有優勢，地區的鄰國們一面與中國合作取得利益，另一方面也集體限制中國的活動範圍。藍普頓並指出中國的經濟總量雖然龐大，人均卻仍低，且中國在亞洲地位的提升並不一定代表美國的影響下降，美國不應感到害怕。最後一種力量是理念力量。藍普頓在文中藍普頓詳細說明了中國的理念力量，其中創新和研究能力的部分除了軍事外，其他方面仍落後於歐美。另外，藍

¹³³大衛·藍普頓原著，計秋楓譯，2003，《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 1989-20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pp.447-476

普頓說明民族主義是中國政權穩固的兩大基礎之一，中國的民族主義不一定是侵略式民族主義，有可能發展出積極的民族主義。藍普頓還認為國際上對中國的印象沒有美國那麼負面。藍普頓並主張中國提供大國與其他國家相處的備選模式，這就是軟實力的展現。在外交方面，藍普頓在文中指出，中國外交目標在可預見的未來是阻止有他國進行有害中國利益的行為，而非掌控局部地區。藍普頓並指出中國在未來數十年將把注意力放在國內事務，因為即使中國的各項力量在增長，領導人也不可能忽視國內的挑戰，否則風險太大。藍普頓在文中主張，中國並非一個軍事為重點的國家，美國如果將之當成軍事國家對待，恐怕最後會逼中國走上這條路。藍普頓建議美國協助中國追求經濟的需求，避免它最後採用軍事手段達成目的，對此藍普頓建議美國應當協助中國發展與他國關係。¹³⁴

總結《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的內容，藍普頓詳細的分析了中國的力量，除了說明中國的力量增長其實背後仍有許多問題外，也強調中國並非一個想用強制力量控制地區的國家，而是以經濟成長與中國利益為優先目標。藍普頓認為，只要美國能釐清這點，並採取適當的政策協助中國滿足需求，中國並不會成為一個軍事威脅。筆者認為藍普頓在該書出版的 2008 年時的立場是頗為樂觀的。另外，該書提醒美國，中國力量增長背後仍有許多問題，而且中國近期內將忙於國內事務，透過這些說明，藍普頓試著傳達美國並不需要恐懼中國力量的增長，而且雖然困難，但是仍應改善兩國關係，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藍普頓的《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和本文第貳章所提到沈大偉 2013 年出版的《中國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國》有類似的效果，也就是提醒美國不需要如此恐懼中國力量的增長。但是可以看到的是，沈大偉是透過對中國軟實力的批評來說明美國無需警戒中國，藍普頓則並不否認中國力量的增長，包括在軟實力方面的吸引力，可是強調中國目前的目標並非美國所預防的軍事擴張，而未來的目

¹³⁴ 大衛·藍普頓原著，姚芸竹譯，2009，《中國國力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北京：新華出版社。

標上可改變。有關沈大偉和藍普頓兩人在這點上的差異，同樣在第三節會詳加說明。

最後，本節要介紹的藍普頓著作是2014年¹³⁵出版的《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第一章的內容主要說明藍普頓在該書問題的背景，從鄧小平成功開啟改革道路後已經過三十多年，中國面臨許多轉變，雖然有繁榮卻也隱藏著問題。¹³⁶正如他在第一章末指出中國2013年所展望的問題，也是藍普頓在《從鄧小平到習近平》這本書的主要問題意識：

「中國大都是『交易型』的第五代領導人能就鄧小平所創造的效果做出艱鉅的抉擇嗎？

而且，做了抉擇後，他們能夠有效執行嗎？」¹³⁷

藍普頓為了探討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如何處理他的改革的遺留效果，從兩個層次來探討中國的發展。

第一部分是從宏觀層次來觀察中國，藍普頓指出，中國領導人面對體系越來越多元，已不再能單獨決定政策。藍普頓認為江、胡和習三位領導人很難像鄧一樣做出重大政策，這與官僚及社會多元化有關，他並說明這將是中國領導與治理的挑戰。接下來藍普頓進一步指出，鄧小平所創造的高投資和高成長模式已經到了臨界點，需要轉型為更具創新的制度。但是中國決策體系處於領導人虛弱和次級團體力量增加，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變成進一步改革的阻礙使轉型不易。另外，他也討論中國的世界觀，藍普頓主張中國的全球互動是樂觀的，但是民族主義可能會讓中美關係處在合作和角力的掙扎。接下來的第二部分微觀的討論中國的內部問題。藍普頓中國領導人都有共同的憂慮，包括農民和人口問題、工人問題、經濟及物價控制、分配不均和天災人禍等議題都可能政權合法性。除了上述內部恐懼之外，還有外部恐懼，例如台灣問題。藍普頓還指出，歷史經驗讓維護國家尊嚴和主權是領導人首要目標，不過這卻使中國很難相處。不過藍普頓認為對中國領導人來說，國內議題是主要關注的問題，所以必要時中國才會介入國際事件。

¹³⁵ 本文引用的是2015年出版的中文譯書，原版出版於2014年。

¹³⁶ 大衛·藍普頓原著，林添貴譯，2015，《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台北：遠流出版。pp.17-51

¹³⁷ 大衛·藍普頓原著，林添貴譯，2015，《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台北：遠流出版。p.51

軍文關係的部分，藍普頓在文中指出，軍隊逐漸專業化並退出群眾政治，但是藍普頓也提到，軍方的決策管道與其他單位不同，因而可能形成外交部不知道軍方行為的溝通不良情形發生。藍普頓還懷疑軍方未必會傳達正確資訊給文人領導。預算方面，軍方爭取到在國內生產毛額中佔一定分額的預算，因此隨著中國經濟成長快速，也讓軍事預算逐年增長。除此之外，藍普頓還說明了中國最高領導人通常不清楚軍方的活動，而且解放軍並非對最高領導人負責，而是對黨負責，也常造成兩個中央的問題。最後討論的是中國的談判，藍普頓認為中國的談判會參考各方實力，對弱國讓步，對強國則否，藍普頓指出，尤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認知美國國勢衰退對中美關係有重要影響。他並主張只有美國國力重新成長才能平衡美中關係，尤其是經濟力量。藍普頓並預測即使未來中國經濟成長下降，但未來二十年間其經濟成長仍是相當可觀的。結論的部分，藍普頓指出，中國要繼續向前走，必須將正當性基礎從經濟轉為以程序正義、參與、經濟及生活品質。另外，中國普遍認為美國已經失去全球共主的正當性，中國想要糾正它認為不公義之處。不過藍普頓認為這低估了美國文化、經濟及政治制度的堅韌。最後藍普頓說明，兩國雖然時有摩擦，但是由於雙方都需要改造內部事務以適應新時代，而不能因彼此分心。藍普頓並提出他的觀察，美國解決自身的問題比要求對方解決問題更有效。¹³⁸

總結來看，藍普頓對內部挑戰有深刻分析，包括領導人疲弱、決策分裂及其他國內議題。但是他對中國的經濟成長仍是有所期待的。軍文關係方面他則認為軍方受到文人的控制並不強，甚至文人政府無法掌握軍方的行動。對外關係的部分，雖然藍普頓指出民族主義可能對中國的對外關係有所影響，但他仍對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保持樂觀。中美關係方面藍普頓仍維持一貫主張，中國重視內部問題的處理更甚於外部問題，他並指出，現在的美國也是如此，因此這有利於中美關係暫時維持穩定。可是他也提到，中國已經認為美國不再有全球共主的正當性，甚至中國已有實力不服從現有國際建制，儘管中國可能對美國有所低估，但是他

¹³⁸ 大衛·藍普頓原著，林添貴譯，2015，《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台北：遠流出版。pp.53-260

強調這不利於中美關係的穩健，因為中國在談判時非常重視權力關係。因此他在最後主張美國要先處理自己的內部問題。顯然藍普頓認為如果美國不將自己的國力提高，則無論採取何種對中政策都將有不利的結果。

在 2015 年，藍普頓的演講內容則更清楚說明美國國力式微後的影響，他指出，中美關係正面臨臨界點，雖然中美關係仍處於最好的狀態，但是藍普頓認為美國對於中國在社會治理、經濟還有國際公民意識朝向正面積極方向的信心正在消失，使得經濟互賴的安全感消失。再者，美國因為金融危機還有近年中國在南海的行動，對自身實力的安全感下降，中國則想要擴大影響力，美國的再平衡策略卻讓中國感覺實力下降的美國想要藉日本圍堵中國。第三則是軍事科技的競賽。最後是美國國內大選，軍費降低還有中美貿易逆差成為焦點，民眾認為對中國的技術轉移是經濟空心化的原因。藍普頓認為上述原因造成中美關係處於臨界點，他建議中美兩國重新劃定全球機制，適應新的權力分配，避免單方面追求安全力量引發中美敵對。另一個建議則是中美發表第四個公報，強調兩國協力維持均勢以及調整經濟及安全機制，而非單方主導，並且藍普頓認為兩國應強化經濟互賴。

139

從上述整理的內容來看，本文認為沈大偉尚會隨著不同情勢而對北京未來的發展及中美關係的前景有樂觀或悲觀的預測，但是藍普頓即使觀察到中國面對內外挑戰或著中美出現摩擦，他仍期待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並且會提供相應的建議，因此相較於沈大偉近年來中國終局論，還有中美關係競爭共存論等主張，筆者認為藍普頓是更為樂觀的。接著下一節本文將討論另一位重要紅隊學者謝淑麗的研究。

第二節 謝淑麗的研究介紹

¹³⁹大衛·藍普頓，2015，〈藍普頓：中美關係逼近臨界點，需“第四個聯合公報”〉，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wj/20150611125684_all.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8 月 10 日。

謝淑麗現任職於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她和藍普頓及沈大偉一樣都是長期被劃歸到紅隊陣營的學者。謝淑麗自 1997 年至到 2000 年擔任柯林頓政府的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的經歷則讓她相對於其他紅隊學者更具有實務經驗。因此筆者選擇謝淑麗作為第二位與沈大偉比較的紅隊學者。

本文用以探討謝淑麗對中國觀察的文獻是她在 2008 年出版的著作《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這本書是她近年來的代表作，文中同時完整的針對中國的國內及國外情勢有詳細的分析，因此筆者認為，詳細探討這本書能夠理解她近年來對中國情勢的整體評價。

《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中國內部事務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還有台灣等外部事務。本文會先介紹內部事務的部分，再說明謝淑麗對外部事務的觀察。

內部事務的部分，謝淑麗首先討論到中國經濟時，謝淑麗接列舉中國今日（2008 年）的各種科技及經濟上的成就，謝淑麗認為只要沒有政治或經濟危機，中國經濟還能維持 20 年的繁榮。另外，謝淑麗認為中國已經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因此它盡量避免與他國發生衝突，尤其說服美國莫把中國經濟崛起視為威脅，除此之外脆弱的銀行體系、政治不穩定、就業問題、貧富差距、貪腐問題以及社會財都可能對經濟有影響。謝淑麗還說明了中國政治的概況，特別要提到的是謝淑麗認為胡錦濤為了鞏固黨員忠心而發動意識形態運動，她認為是沒有效果的。其次中國領導階層相當嚴防大規模社會動亂。謝淑麗說明天安門事件後，中共以宣傳民族主義來維持正當性，並深恐因對外示弱而被推翻。謝淑麗認為要如何讓民族主義不失控成為中共的難題。謝淑麗主張，只要中國繼續維持高成長和創造就業機會，則政權會長久存在。不過她同時認為一旦發生重大國內危機，或引發全國性動亂，中共政權隨時可能瓦解。黨軍關係的部分，謝淑麗在文中說明，解放軍效命對象是黨而非政府。謝淑麗還說明，爭取軍方的效忠是黨內領導人的首要任務。謝淑麗認為軍方能分得預算的原因部分就出在領導人地位不穩固，必須滿足軍方需求換得支持。謝淑麗還主張，胡錦濤盡量避免讓解放軍負責國內治安，

以免發生反叛情形，她認為胡錦濤還是沒有得到軍方的忠誠。另外，謝淑麗討論了中國的媒體跟網路的發展。謝淑麗指出，目前中國共產黨雖仍監控網路及媒體平台，可是越來越難全面監控。市場化的媒體則為了吸引閱聽人，記者有時會以民族主義的角度扭曲新聞事件來鼓動民族情緒。另外，謝淑麗也說明，中國外交決策者有時也透過《環球日報》和網路等非官方媒體蒐集民意資訊，可是官員也承認這些資訊都是極端民族主義觀點。此外，台灣傾向獨立的言論或是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都會引發網路上的抗議，而中共無法漠視，謝淑麗主張，軍事潛能增加以及中共控制資訊能力下降，很可能增加中國動武保持國家尊嚴的危險。¹⁴⁰

從上述內容來看，謝淑麗原則上肯定中國經濟成長的繁榮在近 20 年都是可預期的，這點與前述藍普頓的預測大致相同，對於中國經濟脆弱之處的擔憂亦有許多與沈大偉和藍普頓相同之處，例如扶養比及貧富差距。不過沈大偉和藍普頓都提到過中國經濟轉型問題，也就是中國要進一步轉型成更需要創新的產業有其挑戰性。而謝淑麗卻並未提及。這有可能是因為該書出版時，這個問題尚未在中國顯現。此外，謝淑麗提到重大的內外危機都可能瓦解中共政權，顯示謝淑麗認為中國比看起來還要脆弱，當然在沒有嚴重的情況下，謝淑麗還是同意中共的政權會長久持續。但相較於同時期沈大偉對中共適應措施的正面肯定，謝淑麗的觀察還是有些悲觀的。黨軍關係方面的分析，從她的觀察來看，中國領導人對軍隊的控制並不那麼穩固。另外，謝淑麗與沈大偉都同樣觀察到中國控制資訊能力的減弱，她強調的這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沈大偉則主張對內政有所影響，這點也是差異不小。

第二部分則是關於對外關係。謝淑麗先說明，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即使在後鄧時代仍是主要外交原則，但現在的中國已經承認自己是崛起中大國，而且自稱負責任的大國。謝淑麗認為，中國的睦鄰政策確實有成效。但面對台、日及美國的問題，由於公眾要求強硬，中國的政策就無法那麼穩健和負責。首先是日本，謝淑麗認為中日關係是上述三個對外關係中最難處理的，中共建政後不斷強調日

¹⁴⁰ 謝淑麗原著，溫洽溢譯，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pp.18-129

本對中國的欺壓還有中國如何反擊加上中國政治人物利用反日民族主義轉移國內困境。這引發日本認為中國是威脅的輿論。謝淑麗認為這讓日本的投資者卻步，而且也因此逼得日本更貼近美國，美日安全同盟更加穩固，這不利於中國。謝淑麗還指出，中國對日的跋扈，甚至可能逼迫日本拋棄和平憲法，重建軍隊。儘管中國外交部理解與日本改善關係的重要性，不過黨內幹部還有反日民意使得外交部無能為力。台灣問題的部分，謝淑麗並說明其實台灣問題無涉戰略考量，而事關中國內部政權穩固。共產黨長期宣傳兩岸的統一，才能洗刷百年恥辱。謝淑麗表示，這使得收復台灣與與共產黨正當性掛勾，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不能出錯。謝淑麗認為中國領導人承受來自內部的壓力，加上台灣內政的變化，使得兩岸經濟日益結合，戰爭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中國領導人在對美關係上則進退兩難，敵視美國將影響到經濟成長，也使戰爭可能性提高，若領導人對美示弱內部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可能引發國內危機。進入 21 世紀後，中美關係進入有史以來最好的時刻，加上 911 事件發生，令美國無暇關注中國對美國的威脅。接著謝淑麗指出，中國在 1999 年開始下令淡化反美宣傳，同時將外交政策轉向避免與美國衝突，面對小布希政府調整國家飛彈防禦計畫，中國也盡力避免因此傷害兩國關係。謝淑麗還提到中國石油海洋公司收購美國石油公司最終被封殺。讓中國感覺美國無論如何正規做生意，都會被美國封殺，諷刺的是中國反而成立單位監督併購案。最後謝淑麗主張，如果美國爆發涉及台、日的危機，將進一步引爆民憤，迫使中國領導人對外採取軍事行動，避免政權崩解。¹⁴¹

從上述內容來看，無論是中國的內政事務或外交政策，謝淑麗都觀察到中國的內部的民族主義讓中共的政權變得脆弱，中共既需要民族主義支撐正當性，卻也害怕民族主義反過來推翻政府，民族主義對中國來說像是把雙面刃。這使得中國的決策尤其是對台日美等容易激起民族主義的議題上，中國政府明知要改善關係卻常常不得不強硬應對。當然，謝淑麗也不認為中國對外的衝突必然都是因上述原因產生，尤其是中美關係，從謝淑麗的描述可以發現，從 1999 年以後，中國

¹⁴¹ 謝淑麗原著，溫洽溢譯，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pp.130-309

也多方面努力改善中美關係，反而是美國因為顧忌中國而採取抑制政策，中國則是致力改善的一方，可見針對中美的衝突，謝淑麗也歸咎於美國的過度警戒。

另外，謝淑麗分別針對兩國給予建議，她建議中國停止煽動民族主義並培養正面的民族主義，多頌揚中國目前達到的各種成就，她還主張應讓私營企業主加入外交決策體系，以平衡那些狂飆民族主義情緒的團體。除此之外，她建議強化文官對軍隊的控制。謝淑麗並希望中國鬆綁媒體，避免媒體向民族主義一邊倒的情況。謝淑麗還認為中國應該在放棄「一中原則」的情況下與台灣政府對話。針對美國，謝淑麗認為美國並無法強迫中國領導人聽取建言，但她認為美國是有能力採取行動讓中國成為負責任大國，同時不刺激中國民眾。謝淑麗的建議包括，引導中國與國際合作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保持壯盛軍力，防範中國領導人因內部壓力而逞一時之快；不炫耀軍力，較不易刺激到中國；避免日本重新成為軍事強權刺激中國及南韓；著手兩岸的政治對話；表達對中國的尊重，抬高中國領導人的國際地位；不對中國經濟崛起過度反應。最後，謝淑麗總結認為，如果美國能客觀發現中國的脆弱，並避免犯下可能引發衝突的錯誤，不要孤立中國，她指出，兩國分享區域和全球領導的關係是有可能實現的。¹⁴²

基本上謝淑麗為中國領導人所提的建議多半關於如何削弱中國國內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因為如前所述，這是她認為中國政權最脆弱之處。不過即使中國領導人同意謝淑麗的觀點，但是按照她的看法，民族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根源，將排外民族主義導向正面民族主義，一來正面民族主義操作比排外來得不易，是否能支撐中國的政治正當性，筆者頗為懷疑。二來，即便正向的民族主義能支持中共的正當性，中國領導人仍必須擔心如果經濟成長或科技發展方面的成就走向停滯，則政權是否可能一樣會動搖？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中國領導人是否有可能再次鼓動排外民族主義以穩定政權？謝淑麗的建議只是降低中國領導人直接因為排外民族主義而對外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最重要的還是處理中共正當性的問題。正如前述沈大偉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的看法。

¹⁴² 謝淑麗原著，溫洽溢譯，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pp.310-329

「如果不能真正地塑造人們的精神和信念，中國共產黨就會失去關鍵的控制機制和合法性來源。如果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戰中失敗，那麼它在民心戰中的失敗將會為期不遠」

143

然而，如同謝淑麗單純的想將排外民族主義轉向正面民族主義，不一定能做到沈大偉所提的塑造人們精神與信念。總結來看，謝淑麗對中國的觀察強調中國國內因民族主義形成了潛在動亂因子，並且影響了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特別是處理容易刺激排外民族主義的台日美相關議題時，特別的容易不理性。對謝淑麗來說，這讓中國在崛起的同時，內部又相當的脆弱，她認為美國必須要了解這個脆弱之處，並能透過某些行動遏止中國因內部壓力而下達與外國衝突的決策。民族主義造成中國政治的脆弱，這個論點是她與沈大偉還有藍普頓不同之處，在接下來第三節可以詳細加以比較說明。那麼接下來的第三節，筆者將第貳章和第參章介紹的沈大偉還有本章討論的藍普頓及謝淑麗三人的中國研究加以比較，並藉此論證紅隊學者間的研究觀點是否有明顯的差異。

第三節 比較三位紅隊學者的異同

本節將分兩部分來比較同為紅隊學者的沈大偉、藍普頓及謝淑麗的中國研究有無異同之處，首先是討論三人對中美關係的看法，雖然本文在第貳章對沈大偉的對外關係研究並不侷限在中美關係，但是中美關係是紅藍隊的一個重要分歧，郭壽旺定義紅藍隊時就以對台軍售還有是否支持中國威脅論等中美關係領域的議題來分類。¹⁴⁴準此，比較中美關係有助於本章的主題，檢討紅隊學者主張間的異同，所以本節將重點討論三人對中美關係的見解。第二部份就針對中國的內政事務，比較的內容包括政治、經濟還有軍文關係等議題。

¹⁴³ 沈大偉 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p.160

¹⁴⁴ 郭壽旺，2006《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對李登輝總統九五年訪美案例之研究》，台灣：秀威資訊。p.161

中美關係研究的比較

在進行比較分析之前，本文將先重新整理三位學者的中美關係研究重點，以利接下來比較三人的異同。

首先是沈大偉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本文在第貳章將他的研究區分為三個時期，在 2000 年以前是屬於悲觀期，2001 年至 2009 年是屬於樂觀期，2010 年至今則是有條件樂觀。在悲觀時期，沈大偉觀察 1972 年到 1991 年的中美關係後，認為中美兩國因為冷戰時期的長期分隔，兩國彼此並不理解對方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而且他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印象是扭曲的。沈大偉從上述觀察中總結認為中美若不更加理解彼此，改正扭曲的印象，兩國關係將永遠因錯誤而陷入衝突。沈大偉在之後的文章也指出，只有中國更自由或美國不再表現得像個強權，兩國關係才有可能改善，但他認為改變的可能性不高。2001 的文章中，沈大偉仍將中美兩國的關係定位為競爭與合作共存的戰略競爭對手關係。沈大偉在悲觀期對中美關係的前景並不看好，理由包括對彼此的印象錯誤還有中美兩國各自堅持相互衝突的價值觀，都讓兩國的關係陷入衝突與合作的交替。

911 事件是沈大偉對中美關係前景觀察的轉捩點，他肯定中國在該恐怖攻擊過後對美國的支持，雖然他認為中國在軍事援助上仍有保留，但整體而言中國的作為讓中美關係進入新的穩定期，而這時他認為只要雙方明智的管理彼此關係，該穩定期有可能持續下去。在此之後沈大偉也都肯定中美關係的正向發展，包括上述 911 事件後兩國的合作外，中美雙方都檢討了彼此的外交政策，中國方面以經濟為優先，而不再採取對抗中國的政策，美國小布希政府則不再採取對抗或遏制等政策，而是認真對待中國。2004 年到 2005 年間，當沈大偉發現中國正逐漸成為亞洲周邊鄰國的領導力量時，他認為中美兩國可以各自在亞洲尋求國家利益，而且兩國有許多的共同利益，儘管仍有北韓議題和台灣議題等分歧，可是沈大偉也指出，中國已不再明確要求美國退出亞洲。沈大偉此時對於中美兩國的互動並相當肯定，甚至期許兩國能尋求合作，共同參與亞洲新秩序。即便小布希總統卸任，沈大偉對新上任的歐巴馬政府的對中政策仍是抱持肯定的態度，他認為歐巴馬基

本繼承了小布希時期經營良善的中美關係，而且公眾和主要政黨都有共識的情況下，中美關係正處於前所未見最好的時刻。至 2009 年為止，沈大偉對中美互動的觀察以及對前景的預測都比 2001 年之前來得樂觀許多，不只認為此時期兩國互動穩定，而且期許更多的合作關係。

但是沈大偉從 2010 年開始指出，中國正發生「異變」，這個異變包括對內的打壓還有對外的抨擊，他並提到中美關係也跟著出現摩擦，這些摩擦包括中國反對美國對伊朗制裁、歐巴馬接見達賴喇嘛及中國政治犯等問題，甚至中美都準備對彼此進行報復，而且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也惡化。沈大偉雖然列舉外界對這個變化的看法，可能是因為中國在 2012 年將進行權力過渡；也可能是中國打算挑戰國際現狀；或著是中國外交政策改由現實主義者指導，但是他本人只是評價這一年的中美關係處於動盪之中。隔年沈大偉雖然觀察到中美關係出現新的穩定，但他對這個穩定卻不若以往有信心，並主張應接受兩國關係的競爭性。到了 2012 年的時候，沈大偉則再度主張中美關係的競爭將多過於合作，緊繃的關係會是常態，他認為只有在相互依賴的緩衝下，不斷透過對話才能防止競爭邁向衝突。在 2013 年的專書 *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 裡，沈大偉對中國的軟實力提出質疑，並認為中美在各領域的合作表現不佳，他建議中美要把握競爭和合作的平衡。而針對習近平的「新型大國關係」雖然肯定，但是仍建議中美建立以相互依存為緩衝的「競爭性共存關係」。整體來說，在有條件樂觀期，沈大偉並不認為中美有可能化解競爭，只能以相互共存來緩和雙方的衝突。2015 年在中美高峰會前夕則再度提及競爭性共存已經是中美關係最樂觀的情況。

沈大偉對中美關係的前景，隨著情勢的改變也有著不同的預期。相較之下，藍普頓對中美關係的立場變化就較少，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對中國的觀察沒有與時俱進，而是說他對中美兩國未來合作的前景始終是較為樂觀的。

本章第一節提到，藍普頓觀察 1989 年到 2000 年的中美關係後，認為中美兩國由於對彼此的不理解，因此在安全和經濟領域多有摩擦。例如在安全領域，中美兩國有著不同的國際秩序觀，中國期待多邊主義，美國卻抱持著單邊主義，此

外中國在台海危機中低估美國保衛台灣的決心，美國則沒理解中國基於防範周邊威脅加強軍事現代化，而對此充滿戒心。經濟方面也有同樣情形。這些都造成中美之間的摩擦和衝突。人權方面，藍普頓認為中國的人權有可能隨經濟和政治條件穩定而改善，美國的制裁反而是無效的。雖然中美不斷因誤解而出現衝突，可是藍普頓仍認為中美兩國的這些不理解是可以改善的。

除了上述在安全及經濟上的摩擦之外，在全球層次上，藍普頓認為中國是願意加入國際組織的，不過它必須考量國內因素以及加入國際組織需要付出的成本過高。藍普頓指出，這是包括美國在內所有國家都會有的考量，這意指美國不需要過分解讀中國是刻意不加入國際組織。在國內層次，藍普頓則討論了國家歷史經驗的差距讓中國怕被干涉，美國卻自認有義務干預，而形成衝突。雙方的媒體的選擇性報導也扭曲民眾對彼此的印象，其他還有個人決策及內政因素。藍普頓並給出建議，大致期待領導人相互理解，互相給予政策轉圜空間，並給予民眾對局勢的正確觀念。

筆者認為藍普頓對於中美兩國在 1989 年至 2000 年關係的研究基本觀點就是互不理解，由於背景、制度及文化差異，兩國在許多領域常誤解對方的想法，這產生了許多不滿和衝突。不過從藍普頓最後給的建議來看，他期待兩國相互理解後能互相讓步。911 事件發生後，藍普頓和沈大偉一樣都指出，中美關係得到改善。

2008 年的《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我們可以看到，藍普頓強調中國在軍力上的提升主要是應對可能的威脅，而無意擴張霸權，經濟總量雖大，但人均低於美國。藍普頓認為美國不需要對於中國力量的發展過於害怕或擔心。不過藍普頓指出，國際目前對中國的印象正面，中國也提供大國與其他國家相處的備選模式，他認為這是軟實力的表現。藍普頓在該書最後主張，中國力量增長的同時也面對許多國內問題，美國不需要過分害怕，而中國真正關心的是其國內經濟發展，美國應當體認到這點，協助中國滿足需求以及改善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在這本書中，藍普頓主要有兩大論點，一個是中國力量增長雖然快速，但某些領域不如美國，而且背後仍有許多問題，美國可以不用那麼警戒中國。第

二個論點則是中國更關注的是國內經濟發展，藍普頓認為美國與其抵制中國，不如滿足其需求，並引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筆者認為藍普頓在 2008 年的主張仍是要美國能正確理解中國的力量，並適時的協助中國，則中國並不會是美國的威脅。

藍普頓在 2014 年的《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也有部分內容討論到中美關係。正如本章第一節的內容，他大致對中美關係有以下幾個看法，首先在與包括美國在內大國的關係上，中國領導人講究的是權力的平衡。第二，儘管中國與國際互動是樂觀的，但由於中國國內民族主義將可能使中美關係既合作又衝突。第三，中國普遍認為美國國力正在走下坡，藍普頓認為因為中國對權力關係的注重，因而可能影響中美關係，因此只有美國充新恢復國力才能穩定中美關係。第五，中美兩國現在都必須專心處理國內事務，所以雙方可以暫時維持穩定。2015 年時，他則認為美國國力的式微也讓中美雙方安全感降低，他建議雙方可以發表聲明共同主導新的經濟及安全機制，並且加強經濟互賴。

藍普頓的中美關係研究也有三個變化，針對 2000 年以前的中美關係，藍普頓強調中國的國際行為和一般國家一樣都有其內政考量，中美衝突不過是因為雙方彼此仍未理解彼此。在 2000 年後至 2008，當中國的力量逐漸崛起之時，藍普頓則強調中國力量仍不及美國，而且注重的是經濟成長，只要美國滿足其需求，並引導中國融入國際，就可以避免中國偏離道路。2008 年之後，藍普頓強調金融海嘯過後，美國國力的式微，他認為這不利美國應對中國，美國目前應處理好內部問題。這三個變化都在主張美國不應對中國採取遏制或警戒的心態，只是隨著國際局勢變化而有不同主張。即便在 2015 年，他察覺到中美關係面臨安全感下降問題，他仍期待中美可以合作建立調整現有經濟及安全機制。

謝淑麗在中美關係的部分則是強調中國國內民族主義的影響，這點是她的研究與沈大偉及藍普頓不同之處。謝淑麗認為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成長來說相當重要，美國的敵視可招致軍事衝突和經濟傷害，關於這些中國領導人可能都理解，但是國內的排外民族主義讓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讓步會被視為示弱，進而動搖政權正當性。整體來說，謝淑麗認為中國試圖改善與美國關係，在人權以外的議題

對美讓步，1999年以後中國改變與美國為敵的政策以及之後的911事件發生讓中美關係改善，不過謝淑麗認為儘管中國對美讓步，但是石油公司併購案和美國國家飛彈防禦計畫的案例都表現出美國對中國的警戒，也令中國不滿。而且，謝淑麗也指出，如果美國涉入有關台日的事件，激起民間衝突，中美兩國仍會發生衝突。謝淑麗建議美國理解中國政權因為民族主義造成的脆弱性，逼使中國對美國某些行動強硬應對。謝淑麗同時指出，中國是可能因為民族主義而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的。謝淑麗並提出一些建言，大致上主張中國改善國內排外民族主義的擴散，美國則應抱持軍力防範未然，但又不可炫耀軍力刺激中國民眾，不協助日本成為軍事強權，協助開啟兩岸對話以及切勿孤立中國，才能實現中美共同領導。

謝淑麗的研究顯示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是中國外交上必須對美國強硬的根本原因，謝淑麗期許美國能看見這點，並且在不刺激民族主義下，協助中國融入國際。

本節之所以花費篇幅再重複整理了三人的中美關係研究主張，是因為筆者認為這有助於接下來的比較分析。首先從整體的研究來看，沈大偉比較注重當下中美關係的情況，並根據當下的情況來改變他對中美合作可能性的預測。例如沈大偉在樂觀期，就建議美國和中國能聯手參與亞洲秩序的變動，並建立合作關係。但是在有條件樂觀期，他就放棄中美完全合作的可能性，強調經濟互賴緩衝下的穩定。相較於此，雖然藍普頓也觀察到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擴張還有美國國力衰退出現的而造成的各種衝突，但他總是針對這些衝突的成因改變建議，從未放棄中美兩國攜手合作建立新秩序的可能性。謝淑麗雖然認為中國未必會聽從美國的建議，但她還是提供美國可以採取的措施，來防止和幫助中國避免走向軍事衝突的道路，也避免成為威脅。因此，儘管三位學者都不支持中國威脅論，不過我們可以指出，三人對於中美兩國未來的相處模式各有不同，最樂觀的當屬藍普頓，無論中美目前處於什麼樣困境，他都認為中美共同合作主導世界格局的前景是有希望的，目前的衝突僅是過渡時期。謝淑麗則主張透過美國採取的一些行動，是能阻止中國成為威脅，並建構中美合作的新秩序，仍算是比較樂觀的。沈大偉在

2010年以前和藍普頓及謝淑麗一樣，都期待中美兩國擴大合作關係及共同主導的秩序。不過近年沈大偉較為悲觀，不再期待中美完全合作，而只希望透過經濟互賴來緩衝競爭關係。

除了上述情況外，三人的研究還有些差異，例如本文在第一節曾提到，藍普頓指出，中國所提供與大國相處的備選模式，是中國軟實力的展現，但是沈大偉卻認為中國無論在全球治理、經濟、文化和軍事等各方面的影響力仍然疲弱，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也逐漸下降。¹⁴⁵雖然因為藍普頓是在2008年提出前述主張，而沈大偉則是在2013年出書說明中國軟實力的不足，可以解釋為這是中國的政策有所改變的影響，但是畢竟全球大國的影響力並不會因一時的政策改變而減弱如此之多，連藍普頓自己也在前文提到，中國認為美國已不再具有全球共主的正當性是低估了美國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堅韌。比較可能的解釋有兩個，一是沈大偉僅是認為中國不具備全球大國的軟實力，但未否認中國的軟實力。二則是沈大偉是刻意貶低中國的軟實力，因此檢視中國影響力的標準比之藍普頓更為嚴苛。中國的影響力與它和美國的關係息息相關，正如前述我們看到三位學者都指出，隨著中國的影響力擴張，美國如何應對將是中美關係發展的關鍵，因此在這裡討論了此點差異。

從上述討論延伸出另一個議題，即紅隊學者既然反對中國威脅論，自然必須要證明中國並非威脅。在這一點上，三人也略有不同。沈大偉和藍普頓早期都認為中美之所以會衝突是因為彼此的錯誤理解，不同的是沈大偉主要從冷戰長期對立造成中國對美國的扭曲印象著手，而且探討的是中國的美國觀察者，因為這些人是群眾認識美國的管道。藍普頓則不只是侷限在美國觀察者。但是在911事件之後，兩人對中國並非威脅的辯護方式就有所差別。沈大偉主要從他所觀察到的中美關係穩定，認為美國如果好好把握，中美關係就不必然是敵對，甚至他認為美國應加入亞洲以中國為首的秩序變動，共同追逐亞洲利益。藍普頓則透過對中

¹⁴⁵ David Shambaugh.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國不斷增長力量的詳細分析，明確指出中國力量雖然增長，但是某些領域，例如經濟的力量，並不如美國想像的強大，而且中國還面臨許多問題。透過這樣的方式告訴美國大眾，中國並非威脅，但他不是只提出中國力量不如美國，也指出即使中國力量足夠強大，由於中國主要專注於內政，並不打算控制區域，也不會成為中國的威脅。沈大偉同樣在前述 2013 的著作批判中國在各領域的影響力並不如美國，藉此提醒中國並非想像中強大，以降低美國警戒的作用，但由於批判居多，容易引起中國對該書主張的反感。藍普頓自己則在 2014 年改採取提醒美國自身國力的衰微，反而不利於中美關係，而且中國仍專注於內政，美國與其警戒及防堵中國，不如處理自身事務。不同於藍普頓及沈大偉的主張，謝淑麗則藉由提醒中國因為民族主義造成決策的脆弱，中國對美國的挑釁可能是迫於國內的壓力，美國只要能理解這點，就能避免軍事衝突，中國自然就不是威脅。如此看來，同樣主張中國不是威脅，三位學者各自有不同的方式，可見不能將紅隊學者一概而論的分類。

另外，謝淑麗認為排外民族主義將可能造成中國對外發動軍事戰爭，也與其他兩人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看法有所不同，第貳章對沈大偉的研究的整理中，沈大偉只提到民族主義是中國對美關係的一個不確定因素，但並未像謝淑麗如此看重民族主義的影響。藍普頓則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是有可能發展出積極的民族主義，不一定會形成侵略式民族主義。在這一個觀點上，仍能看出三人的不同。那麼接下來就來檢視三人對中國內政的研究。

內政事務的比較

在這部分，本文就直接討論前述整理的過程中，所發現到三人觀點的差異。首先是政權正當性，沈大偉、藍普頓及謝淑麗都體認到中共政權出現合法性問題，沈大偉指出，社會問題例如分配不均和貧富差距造成中共政權的動搖，而藍普頓持強調社會問題外，他還提到經濟及天災人禍都足以影響政權合法性。謝淑麗則是指出，中國自天安門事件後，改採民族主義作為正當性的來源。除了造成政權

正當性危機的原因稍有不同外，三人對於如何解決的看法有何異同？沈大偉提議中共與人民和民間團體分享權力，藍普頓是建議政治改革將正當性基礎轉為程序正義、參與、經濟及生活品質，兩者的意思大致相同，不過沈大偉強調參與，藍普頓還強調了程序正義及經濟等因素。謝淑麗並未針對正當性危機加以討論，但他認為中共用以填補正當性的排外民族主義反而造成危機，應轉為正面的民族主義。

除此之外，藍普頓主張中國的決策體制越來越多元，領導人很難繼續掌控全局，這對於更重大的政治改革將是挑戰，社會的多元化也將讓中共的治理愈加困難。過去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將可能成為改革的阻擋者。但是本文第參章的內容顯示 2008 年時沈大偉對於中共調適的能力是有信心的，透過對過去經驗的總結，保持中共政權是有可能的。但是在 2010 年之後，沈大偉對中共的統治能力便不再樂觀。雖然沈大偉在此之後也提及類似藍普頓的看法，中國第五代領導人不夠團結和保守派的阻礙讓改革缺乏進展，可是近年來沈大偉主要強調中共政權危機的問題出在胡錦濤晚期還有習近平任內，對於社會需求採取壓制的選項，這可能導致中國內部問題日益嚴重，進而動搖政權。除此之外，在前文提到的，關於藍普頓 2014 年主張中國領導人越來越疲弱，謝淑麗在 2008 年就有類似看法，不過她主要探討的是民族主義造成中國領導人在決策上的顧慮，與藍普頓主張的社會及決策機構多元化等因素不同。

另外，在政治領域方面需要提及的差異，應當屬沈大偉和謝淑麗對胡錦濤任內整風運動的觀察。沈大偉指出，整風運動主要目標是整肅黨風，並加強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黨員的影響。沈大偉認為這個運動是中共組織再造的一環，而他對中共的組織再造給予肯定，認為胡溫的措施不僅穩固自身權力，也恢復黨的活力。謝淑麗卻認為該運動是沒有效果的。兩人對胡錦濤所採取的措施有完全不同的觀察。筆者認為或許可以說明此時期對中國內政的發展，沈大偉是比謝淑麗樂觀的。除此之外，在本章第二節還提到，謝淑麗認為中國領導階層的分裂可能

造成中國政權崩潰，不過同一時間點的沈大偉對中國共產黨的調適政策具有信心，更可見兩人在觀察上的差距。

在經濟領域，中國的貧富差距和分配不均等問題，三人都有提及。而沈大偉及藍普頓則都在 2014 提及中國的經濟面臨轉型到更具創新需求產業的困境，沈大偉認為中國忽視了從教育著手，才能培養轉型到創新產業的動力，而藍普頓認為過去中國高投資和高成長的經濟模式正面臨極限，但是中國由於中國領導人疲弱和決策複雜，將很難改革。兩者的觀點還是有點不同，沈大偉的觀點並不認為中國的決策複雜，而是中國搞錯轉型的關鍵。謝淑麗未提到此點，雖然可能是因為本文只討論她在 2008 年的著作，而中國面臨產業轉型是近年才發生的問題，謝淑麗才沒討論，但是藍普頓在前述 2008 年的《中國力量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一書就有提及中國創新能力不足，因此從這裡看來，或許至少可以推論對謝淑麗來說，中國在這塊領域的缺點對整體的影響並不太大。

最後是在軍文關係的部分，第參章提到過，沈大偉早在 21 世紀初就觀察到人民解放軍過去和黨的連結已經消失，黨的領導階層不再具有軍人身分或經濟，同時他也發現中國正在從黨軍關係，慢慢邁向軍文關係，亦即由國家機關而非黨來指揮軍隊，當然這在中國仍有爭辯，不過沈大偉認為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逐漸走向專業化，並爭取到更大的自主權。而同樣第參章的內容提及 2008 年時，沈大偉指出，即便中國人民解放軍失去黨軍色彩，變為保衛國家及民族的軍隊後，中共仍可透過國家機關來指揮。儘管藍普頓和謝淑麗都同樣認為解放軍逐漸專業化，不過對於黨軍（軍文）關係有不一樣的想法。藍普頓在 2014 年的《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觀察，認為解放軍的指揮管道仍是中央軍事委員會和黨的中央政治局，換句話說，仍是黨在指揮軍隊。即便如此，藍普頓認為文人對軍隊的控制仍弱，文人領導常不清楚軍方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他並未區分黨和國家機關的差別，也就是說與機關無關，只要是文人都無法完全控制軍隊。2002 至 2004 江澤民和胡錦濤分掌軍隊與內政就是因為軍方希望江澤民留任，雖然藍普頓沒提到，不過這顯示軍方仍有很大自主權。這與沈大偉的觀察有兩個不同，首先是解

放軍並未邁向軍文關係，黨軍色彩仍重，而且按照藍普頓的看法，既然文人領導都指揮不了軍隊，那無論是國家機構或是黨的領導可能都無法完全掌握軍隊。謝淑麗在2008年《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也主張解放軍效忠的對象仍是黨，不過她提到黨為了換取軍隊的效忠，給予軍隊很大自主性，筆者認為這顯示她亦同意黨無法完全掌控軍隊。謝淑麗並主張軍方的預算提高正是因為領導人無法控制軍隊，需要藉此換取支持。謝淑麗的看法和藍普頓比較相近，都認為文人領導對解放軍的控制並不穩固，相對於此，沈大偉對共產黨控制軍隊的能力較有信心。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黨軍關係方面，沈大偉個人的觀察和其他兩位紅隊學者並不相同，尤其謝淑麗和沈大偉的著作時間相近，主張卻有很大差別。

小結

從上述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知道無論中美關係或是中國內政的研究，三位紅隊學者或許在許多主張上近似，但是若我們詳細檢視他們的研究，仍可發現許多的不同，甚至對部分領域的主張是天差地別。以中美關係來說，除了都主張中國並非威脅外，還可以根據對中美合作實現的信心和證明中國並非威脅的方式等差異，再加以分類。所以本章開始提出的問題：被劃歸同一陣營的學者之間的主張是否真的差異不大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所以筆者認為本章再度印證用紅藍隊這樣的二分法將學者加以分類是不足且可議的。

第五章 結論—對紅藍隊分類的反思

筆者在緒論提出了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也就是單以主張抑制或接觸中國為標準區分美國學者，這樣的二分法究竟是否適當？並且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兩個推論。第一，同一學者在同一議題上的立場並非總是不變；第二，同一陣營的學者彼此的主張必有差異。本文已經於第貳章、第參章及第肆章以文獻分析法及文本分析法探討了在緒論提出的兩個推論。接下來筆者將在這一章說明本文的主要發現。

本文在第貳章和第參章分別整理了沈大偉對中國對外關係及內政事務的研究，藉此驗證第一個推論：同一學者在同一議題的立場有時是模糊的，甚至並不一致。筆者在第貳章先是整理了沈大偉有關中美關係的文獻，發現可以按照他對中美關係前景的看法，大致將他的研究分為三個時期，悲觀期、樂觀期以及有條件樂觀期。2001年以前，沈大偉並不是很期待中美關係的改善，直到911事件的發生，中美關係進入新的穩定期，中國適時的提供美國援助，加上美國將戰略目標從中國轉移到反恐行動，讓兩國關係和緩許多，他期待和建議美國與中國合作參與亞洲新秩序的建構。然而從沈大偉在2010年觀察到中國對外態度轉為強硬開始，他對中美關係的預測就不再那麼樂觀，雖然2011年沈大偉也曾主張中美找到穩定的新動力，但從他近年宣稱中美完全的合作不可能，必須透過經濟互賴緩和彼此關係以及管理分歧的主張來看，本文認為從2010年以後沈大偉對中美關係是「有條件」的樂觀。沈大偉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也大致有這樣的趨勢，例如他在2009年以後也對中俄關係可能出現的潛在問題，包括經貿議題還有中國與美國的合作進程感到擔憂。中歐關係在沈大偉的描述中，大致維持穩定，但是到2013年時他認為中歐關係正在衰退，而且整體而言，沈大偉引用奈伊的理論，批判中國在全球治理、全球安全、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軟實力仍比不上美國，雖然中國的影響力正逐漸擴散，但是仍比不上美國深厚。另外，本文還討論了沈大偉對

中國戰略安全觀的研究，他認為中國處於相對的安全環境，卻抱持著四周充滿威脅的不安的安全觀。

從第貳章的研究結果來看，沈大偉對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的評價並非總是那麼一致，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國本身正在發生改變，正如沈大偉自己提到的，中國在 2010 年發生「異變」，不過這表示，至少沈大偉個人的來說，中國本身的變化會影響到他的立場，而非他的立場決定他對中國研究的結論。那麼如此看來，將沈大偉劃歸紅隊陣營並不完全準確，因為他的立場是可能有所變動的，這種變動並不只表現在沈大偉對中國對外關係的研究，還可見於他對中國內部關係的觀察。

本文於第參章將沈大偉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研究分為三個部份整理，分別是黨政、軍政還有經濟。本文在第參章的第一節就已闡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也是我們研究中國政治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筆者在第參章同樣用三個階段的變化來討論沈大偉對中國黨政的觀察，發現到類似於他的中美關係研究之變化。首先在 2002 年，胡錦濤及第四代領導集團剛接掌政務時，沈大偉對他們的處境並不樂觀，他認為胡錦濤等人接掌的是一個面臨身分和合法性危機的政黨，他對此提出的解決方法是中國共產黨必須適時與人民和民間組織分享權力。

到了 2007 年，沈大偉評價胡錦濤推動的「社會主義民主」或「中國特色的民主」前提下的「黨內民主」時，不再提及中共的合法性危機，筆者推論，這表示中共的改革方向符合他的期待。在 2008 年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沈大偉雖然仍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出現收縮的現象，但是他認為中共為調適所進行的改革有可能緩和甚至逆轉收縮狀態。然而，筆者也在第參章強調，沈大偉是對中共的改革感到樂觀，中共仍是處於收縮狀態。直到 2011 年之前，沈大偉都對中共的調適措施表示肯定。

2011 年開始，沈大偉陸續發表文章，說明中國共產黨逐漸為保守勢力主導，改採取鎮壓和規避風險的保守作風，即便在 2012 年習近平和第五代領導集團即將

接班之際，沈大偉對中共的改革前景也不樂觀，他認為習近平未必是個改革者，且即便他願意改革，也難對抗黨內保守勢力。沈大偉甚至主張，第五代領導集團治下，持續專制還有與外國衝突將是常態。2013年以後，沈大偉一再提醒中國面對內外困境，必須要透過改革解決，否則黨對宣傳系統和軍隊等維護合法性工具的管制結束，中共就將進入終局。2015年沈大偉一篇名為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的文章，重提中國在政治、經濟轉型和宣傳系統疲弱等問題，並指出中共若繼續採取強制措施，則中國就將進入最終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沈大偉並非在2015年的文章首次提及中國正在進入終局，但卻因為華爾街日報為該文標題加上「崩潰」(Crack-up)二字，讓外界認為沈大偉的學術立場轉向中國崩潰論。對此本文也根據他之後的受訪內容，討論出兩個重點。第一，沈大偉指出，他所說的終局是比崩潰更細緻的狀態。筆者認為這是差別在於崩潰是即時的瓦解，而終局將是漫長的衰退。第二，沈大偉一直都主張中共正處於收縮狀態，但2011年以前，他認為中共改革方向有利延緩甚至逆轉此狀態，隨著中共由保守派主導，改採鎮壓等措施，他自然就必須跟著改變主張。

另外，筆者在第參章還介紹了沈大偉對中國軍事及經濟的觀察。在軍事方面，沈大偉認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只是時間的問題，儘管如此，他仍主張美國應當持續與中國進行軍事交流。不過筆者也指出，隨著沈大偉對中美關係前景不再看好，上述觀點可能會有變。經濟方面，雖然沈大偉會批判中國經濟帶來的貧富不均和環境汙染等問題，但是在2011年進入有條件樂觀期之後，開始提到中國經濟在轉型為更具創新需求產業時遇到困境，而這需要從教育的改革以及政治管制的放鬆著手。不過從沈大偉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悲觀預期，筆者認為他對中國經濟轉型也不樂觀。

本文從第貳章和第參章的內容得到了三個發現，第一，證實了本文的第一個推論，個別學者在同樣議題上的立場並非總是不變。我們在沈大偉對中國的外交和內政的研究，都可以看到悲觀、樂觀和有條件的樂觀等三個時期的轉變。這表

示我們根據學者某段時間的立場及主張劃分陣營並不精確，因為其主張有可能發生變化。

第二，筆者在緒論曾說明，郭壽旺指出用親共或親台來說明紅隊及藍隊的差異並不適當，本文對沈大偉的研究正說明此點。如同前述，中國政策的變化會影響到沈大偉的立場，換句話說，沈大偉是根據中國的內外情勢來考慮何種中國政策對美國有利，進而影響到他的研究結論。這提醒我們，解讀美國智庫學者的主張時，要時刻記得他們之間真正的區別並非親華或反華，而是對何種中國政策符合美國利益有不同見解。當然，也正因為如此，學者的主張可能是動態的，強要定義美國學者的立場並不實際。

第三，沈大偉 2015 年發表的文章因為華爾街日報使用「中國即將崩潰」為標題，被認為他是在提倡中國崩潰論，引發外界對他立場轉變的驚異。不過，筆者在第參章指出，沈大偉對中共正在收縮狀態的看法從未改變，差別只在於中共是否推行適當的改革延緩這個狀態，當改革停止，則收縮狀態將持續。至於外界會認為他 2015 年的論點是「突變」是因為沈大偉長期被歸類為紅隊陣營，一般對紅隊學者的印象是他們對中國的看法較友善，正是這樣的印象讓外界解讀沈大偉的研究時，忽略了他對中國正面評價背後的擔憂或批判，若不是華爾街日報是用了聳動的標題，沈大偉對中共政權的悲觀預測恐怕仍不會被注意到。因此，本文認為以紅隊或藍隊區分學者容易誤導我們對學者研究的解讀。

本文第肆章則藉由比較沈大偉與其他紅隊學者的研究驗證本文的第二個推論：同一陣營的學者彼此主張必有差異。本文稍微整理了藍普頓和謝淑麗的中國研究，並和沈大偉的研究比較，大致上發現以下幾個差異。

第一，對中美合作前景的預期不同。沈大偉會根據中國的目前的國內外情勢來修正他對中美兩國合作的預期。例如 911 事件之後，中美關係處於穩定時期，他就建議美國和中國攜手建立亞洲新秩序，當他觀察到中國對外政策轉向強硬之後，他就放棄中美完全合作的可能性，認為僅能審慎管理兩國分歧，並建議以經濟互賴來緩衝兩國關係。而藍普頓即便察覺中美關係正處於困境或出現摩擦，他

仍然期待中美共同合作主導新的國際機制，他還會根據目前中美遇到的問題提出適當建議。謝淑麗則在提供中國如何不受排外民族主義影響而與美國交惡的建議外，也建議美國在不炫耀軍力的前提下保持武力，以避免中國因為民族主義而採取軍事行動。三位紅隊學者對中美關係各有不同預測，藍普頓最為樂觀，始終認為中美現在的情況僅是過渡期，謝淑麗有樂觀的預期，但也謹慎的防範關係惡化的可能，沈大偉則主張只能緩和而不能期待完全合作。

第二，解釋中國並非威脅的方式不同。沈大偉早期指出，中美兩國的衝突是由於兩國在冷戰時期長期隔離，兩國人民對彼此的認知錯誤及扭曲。這讓美國明白，中國並非威脅，只是因為沒有真正了解彼此，才會造成摩擦。2002年後，他建議美國與中國合作共同追逐亞洲利益，藉由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說明兩國未必會是敵對關係。2013年，沈大偉主張中國軟實力仍不如美國，這樣的觀點讓美國不再需要警惕中國的崛起降低美國影響力。藍普頓早期和沈大偉一樣強調中美的認知差異是衝突的原因，但在2008年時強調中國在部分領域力量仍不如美國，而且中國目前主要專心內政，美國不需要過度擔心。近期則說明美國自身國力的式微反而會成為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因素，不如先解決內部問題。謝淑麗主張中國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內部的排外民族主義，美國若能引導中國領導人解除困境，則中國就不再是威脅。

第三，對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的看法不同。沈大偉認為社會問題是中共政權合法性動搖的因素，因此他建議中共與人民和社會團體分享權力。藍普頓除了提及社會問題外，還主張經濟及天災人禍等因素，因此他建議將正當性基礎從經濟轉為程序正義、參與、經濟及生活品質。謝淑麗則是指出，天安門事件後失去意識形態的支撐，讓中共出現合法性危機，而中共用排外民族主義來，她認為應以正面的民族主義加以取代。

第四，對中共政治改革及未來存續的看法不同。沈大偉在2008年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能力較有信心，認為中共的改革有機會逆轉其收縮狀態。然而從2011年開始，沈大偉指出中共漸由保守保主導，棄改革而改採強硬鎮壓等保守措施，將

使中共逐漸衰退。藍普頓也和沈大偉同樣指出中共保守派正在阻擋改革，但是他還提及社會及決策機構多元讓中共領導人無法做出重大改革。謝淑麗也和藍普頓一樣主張中國領導人相當脆弱，不過她指的是中共領導人害怕排外民族主義可能造成政權崩潰，而不得不小心決策。三位都注意到中共在改革方面遇到問題，不過卻對成因有不同看法。

第五，對中國經濟轉型的預測不同。沈大偉和藍普頓都認為中國在轉型成更需要創意的產業時遇到困境，但是沈大偉認為主要是中國未從教育極致政改革著手，才會讓轉型停滯不前，而藍普頓則主張是中共決策過程變得複雜，很難做出重大政治改革而影響經濟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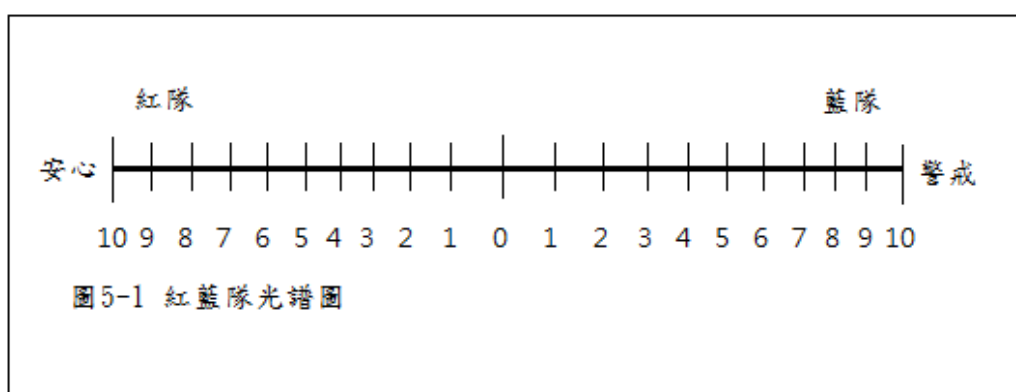
第六，對軍文關係的見解不同。沈大偉在 2003 年就主張過去政治局成員擁有軍方背景，或是軍事將領退休後擔任政治局成員的黨軍共生已經消失，黨軍關係正邁向軍文關係，軍隊還爭取到更大的自主權。除此之外，沈大偉還在 2008 年的著作肯定中共控制軍隊的能力，即便軍隊國家化，仍能透過政府掌握軍隊。藍普頓和謝淑麗也認為解放軍逐漸專業化，但並不同意中共有邁向軍文關係的跡象，他們認為黨仍指揮軍。藍普頓還主張無論黨或政府，文人都不能完全控制軍隊。謝淑麗也同樣認為由於黨無法完全控制軍隊需要給予軍方自主性和軍費來交換軍方的效忠。

其他還包括比起沈大偉及藍普頓，謝淑麗更重視民族主義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還有沈大偉認為胡錦濤的整風運動有助中共組織再造，謝淑麗則主張那是胡錦濤失敗之舉。從這些差異來看，即便三位學者同被歸類為紅隊學者，但是他們的研究其實有不少的差異。

我們總結來看，本文的兩個推論都得到了驗證。從沈大偉的中國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學者的思想可能是動態的，只以某個時期他的主要論述來歸類他的立場並不精確，更有甚者，因為紅藍隊分類給予的既定印象，會讓外界錯誤理解學者的研究還有忽略了學者觀點變化的脈絡。這證明了紅藍隊分類的不適。關於這點，郭壽旺和馬博元都有提出類似的看法，但只是初步說明紅藍隊學者在某些議題上

的立場不符所屬陣營以及紅藍分類對客觀理解學者研究不利，而未具體說明對紅藍隊的印象將如何有礙於我們對研究的認識。¹⁴⁶本文則透過對沈大偉的實證研究說明了學者即便對同個議題的立場也可能隨著時間及中國政策改變而有所變化，並且發現外界正是由於沈大偉紅隊學者的身分而錯誤解讀他的著作，並忽略他對中國的批判之處。此外從沈大偉與其他兩位紅隊學者的比較，我們則能發現，這些同一陣營的學者雖說看法有相近之處，但也有頗多相異之處，即便導向同個結論，過程可能有很大差異，甚至對某些議題的看法是天差地別，將他們劃歸同一陣營會讓人以為他們的主張沒什麼區別，這同樣誤導我們討論及研究他們的思想。上述研究成果顯示，對中國前景發展樂觀或悲觀無法用以區分學者，而且紅藍隊的區分有礙於對學者研究的認識。因此本文結論認為將學者劃分陣營並不適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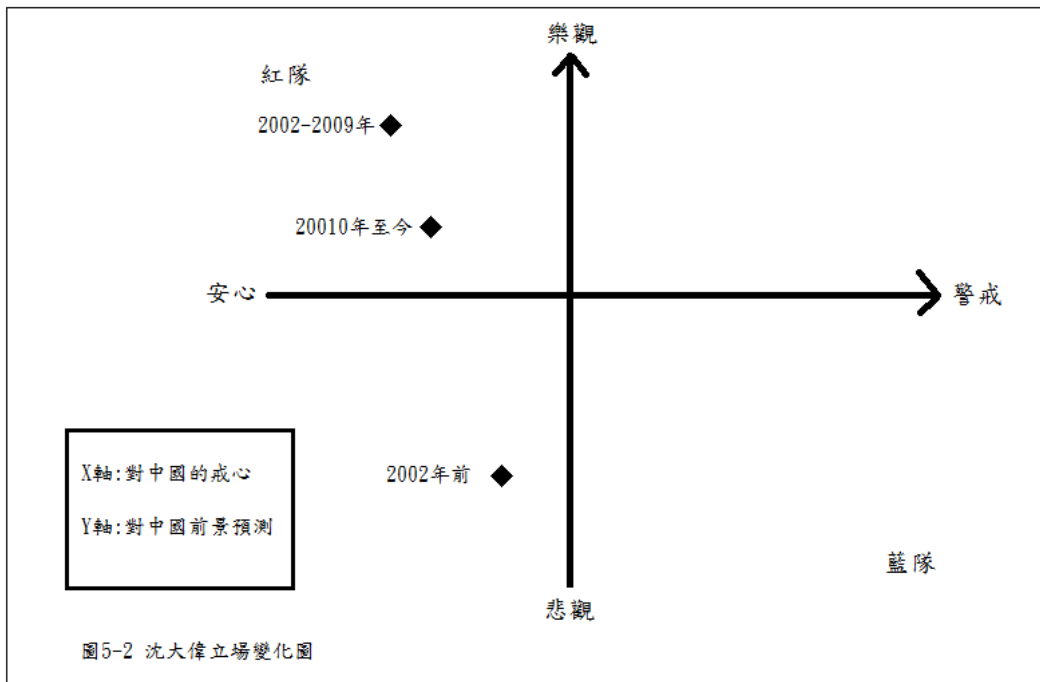
最後，雖然紅藍隊雙方關於中國是否會成為美國的威脅有不同主張，但其實自 1972 年中美重新往來以後，無論是紅隊或藍隊都不反對與中國之間的交往，兩者的主要差別僅在於兩國交流過程中，美國應該對中國保持多少程度的戒心。若據此將紅藍隊畫成光譜圖（如圖 5-1）則從本文對沈大偉著作的整理來看，雖然他的研究立場始終處於對中國較放心的左邊，但並非總是固定的，而是有所移動。



本文雖以沈大偉等紅隊學者為主要研究對象，不過可以推論藍隊成員應該也會有類似的變化。故此紅藍隊做為一種分類標準並不適當，但做為學者的立場仍

¹⁴⁶ 參看郭壽旺，2006《華府智庫對美國臺海兩岸政策制定之影響－對李登輝總統九五年訪美案例之研究》，台灣：秀威資訊。pp.161-162 以及馬博元，2004，〈外交政策評估研究-美國智庫與我國對美外交〉，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學位論文。p52

是存在的，未來也許可以進一步追蹤紅藍隊學者立場上的變化，例如圖 5-2 所顯示沈大偉立場上的改變，或許會更清楚紅藍隊學者們立場的變動性。



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 大衛·藍普頓原著，計秋楓譯，2003，《同床異夢--處理美中關係 1989-200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pp.3-166
- 大衛·藍普頓原著，姚芸竹譯，2009，《中國國力的三面：軍力、財力和智力》，北京：新華出版社。
- 大衛·藍普頓原著，林添貴譯，2015，《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台北：遠流出版。pp.17-51
- 弓联兵，2011，〈中國共產黨適應性變革與中國政治發展—《中國共產黨：萎縮和適應》評述〉，《理論與改革》，(5): 158-160。
-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市：五南。
- 方春生，2005，〈一個美國學者眼中的當代中國軍事現代化—《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問題與前景》〉，《當代中國研究》，12(4): 120-122。
- 沈大偉原著，翟文中、黃俊彥、余忠勇、張天虹、吳奇達譯，2000，〈鄧後時期的中共軍方領導幹部〉，載於《共軍的未來》，James Lilley, Shambaugh, David 主編，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9-42。
- 沈大偉，2001，〈中美戰略關係：從夥伴到競爭對手〉，《世界經濟與政治》，(2): 51-57。
- 沈大偉原著，汪亮譯，2003，〈美中關係新穩定：原因與結果〉，《世界經濟與政治》，(10): 44-48。
- 沈大偉原著，朱杰進譯，2004，〈中國、美國與正在演變中的亞洲秩序〉，《外交學院學報》，(4): 47-50。
- 沈大偉原著，高一中譯，2004，《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 沈大偉，2005，〈演進中的亞洲地區體系〉，《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4): 24-25。
- 沈大偉，2010，〈中國眼中的歐洲：真實的不一致還是認知不一致？〉，載於《中歐關係：觀念、政策與前景》，沈大偉、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周弘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沈大偉原著，鮑世奮、張沛校譯，2011，〈2011年的美中關係：從脆弱到實質性穩定〉，《國際展望》，(6): 91-126。
- 沈大偉原著，呂增奎、王新穎譯，2012，《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 馬博元，2004，〈外交政策評估研究-美國智庫與我國對美外交〉，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許少民，2013，〈全球參與者、身分困境與全球性大國—評《中國走向全球：羽翼未豐的大國》〉，《國際政治研究》，(3): 176-184。

- 郝衛東，2013，〈走向世界的中國〉，《國外理論動態》，(4): 104-105。
- 鍾宜錚，2013，〈一個所謂紅隊學者,藍普頓的中國認識〉，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
- 謝淑麗 原著，溫洽溢譯，2008，《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台北：遠流出版。

外文書目

- Cole, Bernard D.. 2003. "Review: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y David Shambaugh."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7(3): 1004-1006.
- Dittmer, Lowell. 1994. "Review: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57(3): 624-625.
- Fewsmith, Joseph. 2008. "Revie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a Quarterly* (195): 691-692.
- Finkelstein, David M.. 2003. "Review: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y David Shambaug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4): 1230-1232.
- Garson, Robert. 1992. "Review: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68(4): 717.
- Klein, Donald W.. 1992. "Review: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Pacific Affairs* 65(3): 401-402.
- Lanteigne, Marc. 2008. "Revie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84(5): 691-692.
- Mertha, Andrew. 2009. "Revie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a Journal* (62): 174-176.
- Mulvenon, James. 2004. "Review: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y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a Quarterly* (177): 215-216.
- Munro, Ross H.. 1992.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62): 10-16.
- Pye, Lucian W.. 1992. "Review: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a Quarterly*, (129): 229-231.
- Shambaugh, David. 1988. "Anti-Americanism in Chin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97 (1): 142-156.

- Shambaugh, David. 1991. *Beautiful imperialist :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ambaugh, David. 1995.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 New Cold War ? ." *Current History* 94 (593): 241-247.
- Shambaugh, David. 1999/2000. "China's Military Views the World: Ambivalent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3): 52-79
- Shambaugh, David. 2000. *Is China Unstable?: Assessing the Factors*.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 Shambaugh, David. 2001. "China or America: Which is the Revisionist Power?."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43 (3): 25-30.
- Shambaugh, David. 2002.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Current History* 101 (656): 243-249.
- Shambaugh, David. 2004. "China and Europe: The Emerging Axis." *Current History* 103 (674): 243-248.
- Shambaugh, David. 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3): 64-99.
- Shambaugh, David.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mbaugh, David. 2013. "Assessing China's New Leadership One Year On." *Cross-Strait Developments in 2013: New Trends &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 Shambaugh, Davi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hambaugh, David. 2014.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Ten Major Reform Challeng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1-18. pp.3-5
- Shih, Cheng-Feng. 2005. "Understanding the Red While Singing the Blue : Reading David Shambaugh by the Lines." *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57-76.
- Singh, Gunjan. 2014. "Book Review: Shambaugh, Davi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Indi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0): 183-185.
- U, Eddy. 2009. "Review: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by David Shambaugh."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2): 613-614.
- Wilson, Ian. 1996. "Review: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by David Shambaugh;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by David Shambaugh." *The China Journal* (35): 189-191.

網路資源

大衛·藍普頓，2015，〈藍普頓：中美關係逼近臨界點，需“第四個聯合公報”〉，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611125684_all.html，檢

索日期：2015年8月10日。

方冰，2015，〈陸克文批沈大偉“中共崩潰論”胡說八道〉，美國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rudd-refutes-20150504/2749378.html>，檢索日期：2015年7月1日。

沈大偉，2015，〈沈大偉：從習近平訪美觀察中美關係的十大指標〉，南華早報中文網：

<http://www.nanza.com/tc/international/14ff4b37318fb11/shen-da-wei-cong-xi-jin-ping-fang-mei-guan-cha-zhong-mei-guan-xi-di-shi-da-zhi-biao>，檢索日期：2015年9月28日。

余東暉，2014，〈中評獨家專訪美國“紅軍”藍普頓〉，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33/0/8/2/103308288_2.html?coluid=93&kindid=7950&docid=103308288&mdate=0730001724，檢索日期：2015年7月10日。

余東暉，2015，〈沈大偉答中評：我跟章家敦不是一夥人〉，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3695874&sw=%E6%B2%88%E5%A4%A7%E4%BC%9F>，檢索日期：2015年6月15日。

馮兆音，2015，〈沈大偉：中國「臉皮還不夠厚」〉，世界新聞網：

<http://www.worldjournal.com/3176708/article-%E6%B2%88%E5%A4%A7%E5%81%89%E5%BC%9A%E4%B8%AD%E5%9C%8B%E3%80%8C%E8%87%89%E7%9A%AE%E9%82%84%E4%B8%8D%E5%A4%A0%E5%8E%9A%E3%80%8D/?ref=%E8%B6%85%E4%BA%BA%E6%B0%A3&npg=2>，檢索日期：2015年7月10日。

蒙克，2015，〈透視中國：中共統治會崩潰嗎？〉，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_watch/2015/03/150318_china_watch_shambaugh_china_cracking，檢索日期：2015年3月18日。

蕭功秦，2015，〈蕭功秦：如何看待沈大偉的“中國崩潰論”？〉，觀察者網站：

http://www.guancha.cn/XiaoGongQin/2015_03_26_313732.shtml，檢索日期：2015年7月1日。

儲百亮，2015，〈沈大偉：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紐約時報中文網：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317/c17shambaugh/>，檢索日期：2015年6月10日。

譚英姿 鄧章瑜，2012，〈中美關係新特點：競爭多過合作 ——專訪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中國日報網：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12mgdx/2012-10/19/content_15832258_2.htm，檢索日期：2015年4月10日。

Brown, Kerry.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by David Shambaugh.” July 4.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books/china-goes-global-the-partial-power-by-david-shambaugh/2005299.article> (September 11, 2014).

- Cameron, Fraser. 2013. "Book Review: China Goes Global – The Partial Power by David Shambaugh, OUP." March 12.
http://www.eu-asiacentre.eu/pub_details.php?pub_id=90 (September 11, 2014).
- Dingding Chen. 2015. "Sorry, America: China Is NOT Going to Collapse." March 10.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sorry-america-china-not-going-collapse-12389> (July 1, 2015).
- Kaiser, Robert G., and Mufson, Steven. 2000. "'Blue Team' Draws a Hard Line on Beijing." February 2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WPcap/2000-02/22/004r-022200-idx.html> (October 15,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2. "Will the Party Lose China?." November 7.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2/11/07china-shambaugh> (June 15,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5. "Don't lift the arms embargo on China." February 23.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5/02/23china-shambaugh> (March 12,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7. "China-Europe Relations Get Complicated." May .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7/05/china-shambaugh> (April 22,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7. "China: Let a Thousand Democracies Bloom." July 6.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7/07/06china-shambaugh> (June 10,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8. "China's New Foray into Latin America." November 17 .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8/11/17-china-shambaugh> (July 2,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9. "Early Prospect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Strategic Agenda with China." April.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09/04/china-shambaugh> (February 20,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9. "China and Russia: When Giants Meet." June 15 .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09/06/15-china-shambaugh> (July 22,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09. "China at 60: The Road to Prosperity." September 28.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24366-2,00.html> (April 26,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0. "The Year China Showed its Claws." February 16.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0/02/16-china-shambaugh> (February 15,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1.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 90." June 30.

-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1/06/30-china-communism-shambaugh> (June 25,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2. "Are Chin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ally Multinational?." July 10.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2/07/10-china-multinationals-shambaugh> (June 26,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2. "Ten Questions for China's Heir Presumptive." February 10.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2/10-10-questions-shambaugh> (June 25,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2. "Don't Expect Reform from China's New Leaders." November 15.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2/02/10-10-questions-shambaugh> (June 7,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3. "Prospect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March 07.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 (April 21,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3. "Breaking Down China's Reform Plan." December 2.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3/12/02-breaking-down-china-reform-plan-shambaugh> (June 7,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5.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March 6.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June 12, 2015).
- Shambaugh, David. 2015. "Reserving differences while finding common ground'." September 28.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5/09/28-xi-us-visit-common-ground-shambaugh> (September 30, 2015).